

目 录

春秋笔

- 1 民办教育在民国的兴衰……………李兴韵
7 龙云与民主堡垒西南联大……………黎 勤 李 凌
12 北洋军阀时期为何也有“民主”……………李庶民
16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张家康

亲历记

- 22 我随李富春访问苏联……………阎明复
28 “依法治国”发稿追忆……………王强华
30 我怎样成了小彭德怀……………宋铭赋
32 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学习班……………万炜明

求实篇

- 35 大跃进中敢于求实的县委书记古博……………陈瑞华 张广桥
40 《团泊洼的秋天》留传的故事……………刘仰东
43 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罗平汉

往事录

- 48 王韬与华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刘小清 刘晓滇
52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和《新民报》……………郑连根

争鸣篇

- 57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王人广
61 《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中
部分史实校正……………赵懋家

人物志

- 63 何思源在山东抗日……………王秉默
66 杨伯涛会战雪峰山……………蒋国经
69 关于《陈独秀往事》的一封信……………龚育之

古今谈

- 73 汉武帝与轮台罪己诏……………王也扬
75 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吴 思
79 千古奇冤陈世美……………陈远发

文配画

- 80 玩儿圣人
——精神现象零拾……………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镗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凌 云 龚育之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 (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竟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陈 渊

理 事 员: 白健钢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淞赵周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 (E-mail) 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4.80元

民办教育在民国的兴衰

● 李兴韵

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回顾民办教育在这些阶段中的起伏变化,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1912—1927年:民办教育的兴盛期

清末,朝廷推行新政,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模仿外国制度,建立全国性的现代学校系统。其中高等教育归官办,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外又建起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等高等学校。民办高校除了因日本留学生罢课回国风潮而创办的中国公学外,主要由教会创设,中国人士民间办学的力量则集中在中小学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废除了清政府只许私人兴办中等以下学校的规定,宣布开放办学权限,除高等师范学校一种外,均允许私人开办,所以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获得较快发展。公立大学在民国建立后的几年内没有增加,但同时期私立大学却发展迅速。1914年春,仅北京一地,教育部就派官员视察了私立民国大学等四所私立大学,对它们的管理和教学都表示肯定,批准它们的立案。民初私立中小学则明显处于公立学校的补充地位,从民国元年至五年,私立中学占中学总数的百分比最高是14.5%,学生数占总数的百分比最高为12.8%。小学阶段一直缺乏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因为民国政府提倡义务教育,公立小学的建立和发展一直是政府教育工作的重点,私立小学无法竞争。

1916年袁世凯去世,中央政府失去了有效控制全国的能力,非官方的办学力量因此获得了成长的空间。同时,因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

族资本主义发展迅猛,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实业界与教育界人士纷纷投资兴学,复旦大学(1917)、南开大学(1919)、中法大学(1920)等著名的私立高校都在这一时期创办。新加坡华侨陈嘉庚于1912年领导乡人捐资办集美小学堂,1918年创办集美学校师范部与中学部,1921年又创建了厦门大学,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校网,极大地改善了福建教育落后的状况。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废除了读经课程,儒学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各种不同观点在学校里得以自由传播。1915年2月,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要求中小学一律增加读经课程,大学增设经学院,半年后,教育部下令把读经重新列为小学的必修科目,这使得“学校教师和社会上的其他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对国家总统和他的追随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袁世凯去世后读经课程再次被废。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进步的教育家对制定民主教育的目的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不仅是北大的改革风向,也成为整个教育界的追求目标。民国元年,教育部颁行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1919年,北京教育调查会请教育部改教育宗旨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同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年会通过决议,要求根本废除政府的教育宗旨,指出“施教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盖无论如何宗旨,如何主义,终难免为教育之铸型,……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全国教育界的代表公开宣布,政府根本不

应该公布任何教育方针,应该让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自由地开展教育,使学生完全不受束缚地发展。

1922年民国政府颁行了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新学制,新学制吸取了五届教联会的议案,取消了教育宗旨,代之以七项标准,第一次实现了在法令中不存在政府强加的任何教育宗旨,使学术自由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当时上海私立美专开风气之先,使用裸体模特儿教学,引起了很大的风波。1926年孙传芳就模特儿之争函寄校长刘海粟,劝他不要再使用人体模特儿,刘海粟坚决不愿放弃,他在给孙传芳的复信中援引1922年学制的规定,坚持艺术专门学校列人体模特儿之绘画实习为必须课程,更坚信“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由于刘海粟的努力,使用裸体模特儿的制度坚持了下来,而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成为了私立学校的特色得以继续发展。

1922年学制还从法律上正式明确了女子同男子一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已行千年女禁的中国取得这一认同实属不易,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办学校努力的结果。1844年中国内地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是私立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经正、务本女塾也是私立的。在清政府不承认女子受教育权利时,许多私立中小学都招收女生入学。1905年,私立岭南学堂允许女生插班,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男女同校。另外,最早专门招收女子,为她们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也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大学等私立院校。

民初虽然取消了清朝对高等教育的垄断,但还是规定了中央政府对高等师范教育的控制,直到1922年学制才规定普通大学,包括私立大学的教育系可以设师范科,这是近代中国政府第一次将各类各级教育的权限完全开放,民间力量的办学范围也扩展到最广,有些私立大学开始办起了师范科。这时创办学校是非常自由的事情,上海私立大学中的“四大金刚”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就分别是由脱离震旦、清华、厦门、圣约翰四所高校的师生创办的。

教会学校是最具独立性的民办教育力量,早在19世纪后半期已大量出现,清政府对它们一

直采取放任态度。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曾颁布规程,要求教会学校在外的私立学校根据一定手续向政府教育总长申请认可。但这一规定并未真正施行。相反,为着毕业生出路、经费资助考虑,许多教会学校都在国外申请立案。因为有着不受中国政府管制的办学权,教会学校一开始选择的就西方的教育制度。教会学校首先冲破中国女子教育的禁锢,并且引进体育,冲击了中国人视文弱为美的千年传统。它们传播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使用现代学校教育的班级授课制与实验方法。在培养应用技术性人才(如医科、土木工程人才)等方面,教会学校的教育效果非常明显,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发展到20年代,教会学校办学质量已得到国人赞许,许多政界、商界人士都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读书。

因为政府放松了对教育的集中控制,同时对民办教育的发展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此一阶段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兴盛时期:各类民办学校纷纷创设,民办教育家们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各种民间教育团体也接连成立,道尔顿制等国外教育方法也在民办学校率先引进和展开实验。民办教育自由成长,也带来了教育界的蓬勃生机。20世纪初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后来蔡元培回顾1910和1920年,曾感慨地说:“当时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就是在北洋军阀承袭袁世凯压制自由思想的暴力压迫下,“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可遏制”。可是这样的自由却随着国民党政府党化教育的推行而结束。

1927—1936年:民办教育的禁锢期

党化教育开始于1924年的广州。当时国民党当局模仿苏联,在它控制的广州及周围地区推行“以党治国”的政策,在教育方面则停止了从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制止学校教育继续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实行“党化教育”,明确提出中国境内所有一切学校均以中国国民党党化为原则,如不遵照上述各项实行者就加以取缔。1926年,国民党从广东出兵北伐。党化教育从珠江流域蔓延到长江、黄河流域,所有学校都要开设宣传国民党“党义”的课程,要求举行总理纪

念周,学生被要求入党,教育变成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一份1928年的文件写道:“自本党北伐以来,三民主义教育,甚嚣尘上,在各学校,党义已列为专科。”1928年2月6日颁布了《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董事会条例》,要求私立学校向政府立案。1928年7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了灌输官方正统思想的统一标准,规定:各级学校所有课程都要融会党义精神,另外每周至少专门讲授两小时党义课,这门课程必须使用中央训练部会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编审颁行的教材。1929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一规程延续了从广东国民政府时期开始的做法,要求私立学校向政府立案,并且还增列了核查学校训育及党义教育实施情形的条例,明文规定将私立学校的立案和党化教育强行相连,以确保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能贯彻到各类民办学校中去。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在教育界树立了唯一的权威。

党化教育的推行在一些民办学校,特别是教会学校中遭到困难。面对“反对党化教育的人们就是反革命”的舆论,民办学校对于政府强制党化教育的政策不可能公开加以反对,但在实际中对党化教育的推行很不积极。如1929年10月,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

对广州各级学校党义课程及党义教师进行调查,18所受检的私立中学没有一所完全合格,8所没有聘请经检定的党义教师,不合格率达44.4%,17所不够每周两小时的教学钟点,不合格率达94.4%,其中培道中学坚持开设宗教

课,根本不开设党义课。作为中国教育中具有独立性的部分,私立学校对党化教育的态度已经清晰可见。如果让它们,特别是有着西方势力背景的教会学校保有独立地位,那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的全面推行定是一大阻碍。面对这样的境况,教育部于1930年2月11日又发布《考察教会学校应行注意各点》,要求各省教育厅对已立案和未立案的教会学校随时考察,如未严格施行党化教育即行取缔。当时,教会学校取消宗教必修课、开设党义课后,只要要求立案就会被接受,根本不需考虑其它的条件。如1931年,广东省督学视察全省教育就发现许多已立案的公私立学校在教学质量方面办理根本不合立案规程,私立中德中学就有多名教师、实验仪器、参考图书、校务管理等不符立案规程而通过立案。可见20年代末的私立学校立案重视的是政治控制而非学校的办学质量,立案是国民党政府扩充在学界控制力的一个步骤,是从维持自身专制统治而非遵循教育自身特性和规律的角度出发的。

立案后私立学校的学制、课程都要遵照政府的规定,至少在中小学阶段,公私立学校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党义课程已经列在课程表中第一项,每周举行孙中山的纪念仪式,所有中国教职员都必须进行“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的就职宣誓。其实,教育家早就对



1905年创建的复旦公学,后为复旦大学



陶行之 摄于1946年)

党化教育的危害提出了警告。1925年正是反基督教运动高涨的时期,舒新城指出“党化教育实是教育界底最重大的问题。……至于以党义为神圣,思想不能自由发展,更足阻学术之进步。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为近代人类生活之一大进步,故教会学校在学校强迫实施宗教教育,教育者反对之,而有收回教育权运动,政党欲使一切教育党化,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之义,亦当反对。然而国内教育者却少有人注意于此,而且潜向‘党化’方面走。”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教育家的敏锐。在党化教育大盛的1928年,舒新城又写道“如有人对党化教育的用意存疑而发为言论文字,反革命的罪名大概是可以博得的。”他没有再公开反对党化教育,只能做变相的指责了。

高等学府,作为传播现代文明和进行学问研究的中心,向往和追求的是“学术独立”的原则,大多数教师都倾向于特立独行、思想自由的探索精神。1929年,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指责党化教育为党八股,他为此遭到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的训诫。中训部指责胡适“近年以来,凡发言论,每

多荒谬”,提出要加以“严惩”。中训部为此通令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主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发生。”大学教师们不再能公开作出反对官方正统理论的言论,这种以政治来干预教育、限制学术自由发展的做法扼断了大学的生命之根。另外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被要求以集中和自修的方式对国民党党义“作系统的研究,求深切的认识”。针对“教育不应该拘执一端,故步自封,而当包罗万象,以见其博者”的主张,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明确强调:“我们必不能让所谓‘包罗万象’动摇我们已定的教育宗旨!今后我们在惟一主义的民族,惟一主义的国家,惟一主义的政治下,必不许教育独异于此惟一的主义而有所兼容。”

国民党要建立的是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文化教育制度,所以对于“有异”的私立学校,采取的是严加取缔的措施。1929年,上海华南大学、大陆大学、建华中学就是被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理由封闭。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是以生活教育运动来推动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示范学校,校长陶行知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张‘兼容并包’,我主张我们学校成为‘自由园地’,你们不同的观点可以自由竞争,可以讲道理,但不能告密。因此晓庄师范学校成为江南各省进步学生求学的理想场所。1930年,由于陶行知拒绝蒋介石交出学校共产党员名单,开除游行学生的要求,蒋介石就下令教育部关闭晓庄师范学校,在陶行知散发《护校宣言》,痛斥“革命的教育摧残于所谓革命的政府之手”后,晓庄师范被南京警备司令部查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缉,学校被逮捕了30多人,最后10名学生被杀害。”

面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只有少数外国人还起作用的教会大学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如燕京大学。1936年12月《燕大周刊》发表了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突破了国民政府的文化封锁,在国内中文报刊中首次公开展示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是当时其它报刊做不到的。高校教师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坚持,如果公立高校教师不满政府干涉过甚,还可以到私立高校继续教学和研究,所以在高等

院校数目中占半数左右的私立高校成为了国民政府意欲控制的对象。

正如袁征的研究指出的,党化教育的推行是中国现代教育史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它结束了晚清以来教育上的自由和开放趋势,改变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将党化教育的施行和私立学校的立案联系在一起,所以党化教育从公立学校扩展到私立学校,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遭到极大侵害。此一阶段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禁锢时期,从晚清开始民办教育逐渐兴盛的势头也被窒息了。

1937—1949年:民办教育的衰落期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抗战期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蓄意破坏,私立学校同公立学校一样受损惨重,这是中国教育最为困难的时期,如私立中等学校由1936年的1200所锐减到1938年的618所,减少42%。私立高校如复旦、南开等财产损失惨重,师生也大量散失,损失达到无法统计的程度。就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还是有许多民办学校的师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学业与研究,广东的爱国人士还创办了两所新的私立高校,为失学青年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沦陷区内,燕京、辅仁、圣约翰等教会大学利用自己特殊的背景,竭力抵制日本军的奴化教育,为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提供求学的环境。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宁愿关校也不接受敌伪对学校的干涉,坚决抵制了敌伪政权对学校的并吞意图。在颠沛流离的岁月,民办教育依然弦歌不辍,反映了民办教育家执著的信念。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了一些正确的措施,如救济学生、增设学校、充实设施等,对保护和发展中国教育起了积极作用,但也趁战时私立学校受损过于严重,陷入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将残存私立高校国有化。私立南开大学即为一例。南开大学是在1904年创办的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1919年正式成为大学,此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发展为闻名全国的私立学府。抗战中,南开和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战争结束时,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1945年8月致函蒋介石,提出南开原有的校舍和设备已被日军完全破坏,因而请政府资助学校的重建和发展。蒋介石却要求南开同意改为国立。这是乘人之危,以拒绝资助相要挟。张伯苓致函答复蒋介石,大大降低了请求帮助的资金数额,但明确表示:“愿仍以人民社团立场,继续努力”,依旧居于私立地位”,可是蒋介石坚持要南开改为国立。张伯苓考虑到抗日战争刚结束,到处都遭到破坏,难以筹款,只好同意。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文件。张伯苓提出以十年为期,十年后恢复私立。但不到十年,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被推翻。

北伐以后,虽然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削弱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力量,私立高校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势力。1937年,中国有高等院校91所,其中私立的有47所,占51.6%。由于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私立院校收归国有、创办全国性的国立师范学院系统和把日伪学校改为国立高校,到抗战结束后,官办高校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私立高校。1946年,全国有高等院校185所,其中私立的为64



南开校园的张伯苓像

所,只占34.6%。更由于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一流私立院校都变成了国立学校,在教学和研究水平上,公立高等教育的力量增长和私立高等教育力量的衰减就更加明显,最后除了少数教会大学之外,中国所有一流大学全部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事业。现代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都给教育机构(包括私立学校)以财政帮助。在学校遇到经济困难,特别是由于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学校难以生存时,中央政府组织学校脱离险区,以人民提供的资金帮助学校生存和重建,实属天经地义。”国民政府趁火打劫,将这些声誉卓著,经过民间教育家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私立院校据为己有,实属一种强盗行为。

在抗战结束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把国家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但是,他改变国民党一党垄断教育的希望很快就完全破灭了。战后,国民政府宣布对收复区学生进行“甄审”,在遭到广大学生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后,教育部公布的修正办法规定国文、英文可免试,而对于“呈读三民主义报告及标点批注《中国之命运》”不但没有修改取消,反而增加了“三民主义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任用的条件。所谓“甄审”其实是对收复区的广大青年进行“党化教育”,以达思想控制的目的。而1947年1月起,南京政府又规定专科以上学校专门成立训育委员会,对高校实行进一步的钳制,翦伯赞教授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授,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所,各非其非。这样教育才能达到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任务。”这是广大师生捍卫人格尊严和教育自由的呼声。同时,公立学校制度本身的“垄断”及“官僚”风气也造成了公立学校的低质量、低效率和脱离实际。抗日战争之后的内战,更使教育陷入破产境地。

抗战中,大多数的民办学校都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国民政府却趁机削弱民办教育的力量,并坚持文化专制的政策,严密监视学校,对

师生进行政治迫害。这一阶段,是中国民办教育的衰落期,由于日本的侵略,更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民办学校的吞并,到抗战结束时,存留的民办学校在数量上和教育质量上已经根本无法与政府学校抗衡。国民党政府的思想专制导致人心尽失,最后,公私立高校绝大多数著名的教授都不愿跟国民党走,拒绝前往台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高等院校有223所,属于私立性质的有93所,经过1951、1952年全国实施院系调整,合并重组全部变为政府所有,私立中小学也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也一律收归国有,教育由政府全部包办下来。至此,晚清以来在中国维持近一个世纪的现代民办学校告一段落。

余论

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私学兴起,其后一直与官办学校并存,绵延不断。两千余年里,私学几经起落。新中国建立前,每当政府的专制统治加强时,私学就衰微;一得到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私学就发展。

清末,中国建立了现代民办学校系统。1906年,国人创办的第一所私立高校——中国公学干事姚宏业因办学陷于困境,自杀殉校,临终前指出:“考各国学术之进步,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夫能驾耶鲁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但可惜晚清开始的教育自由化的发展结束于国民党政府的党化教育,民国最终没能形成多元化的教育体制,中国民办教育中也一直没出现耶鲁、早稻田大学那样优秀的私立高校。英国思想家密尔指出:“在广泛思想钳制的环境里,过去出现过,将来也可能出现个别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没有出现过,将来也绝不会出现一个智力上积极进取的民族。”出现个别优秀学者是一回事,成为一个有卓越智慧的民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智力杰出的民族,中国教育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民就应当记取民国时期民办教育发展留下的教训。(责任编辑 吴思)

龙云与民主堡垒西南联大

● 黎 勤 李 凌

(一)

1946年5月4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宣告结束,由冯友兰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几句话把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的特点作了精确的表述。

西南联大所以被称为民主堡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梅贻琦为首的学校当局和教授们坚持蔡元培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三校都有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三校的教师许多都参加过五四和一二·九运动;三校教师中许多人都曾在欧美留学,受到过民主自由的政治熏陶;中共地下组织、中共党员以及广大同学的共同努力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但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客观有利条件,这就是联大地处云南昆明,而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对爱国民主运动持比较开明的态度,他自己也于1944年秘密加入民主同盟。有人说:如果西南联大在四川或其它蒋介石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西南联大就不可能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民主堡垒。这句话是符合实际的。

(二)

龙云,祖籍四川凉山,1884年出生于云南昭通,彝族人,1912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因颇有胆识,善于武功,曾在擂台上打败法国大力士,引起云南将军唐继尧的注意,后被唐任命为炊飞军

大队长(即警卫部队大队长),龙云从此发迹,在十多年的地方军阀混战中,几经起伏,在其表弟卢汉等人的支持下,取得胜利,实际上统一了云南,于1928年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先后又兼任十三路军总司令、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等职。为了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曾大规模镇压云南的中共地下组织,直到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中共地下组织才得到恢复。

为了巩固自己在云南的地盘,加强实力,龙



龙云(摄于1952年)

云曾致力于整顿军队和财政,强化经济和交通建设,颇有成效,客观上为以后支援抗日战争打下基础。抗战初期,在全省人民大力支持下,龙云动员大量财力、物力,以9个月的时间修通959公里的滇缅公路,在太平洋事变以前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大量抗战所需要的物资从此运进,为支援抗战立下了功劳。

1934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长征,经过贵州和云南。蒋介石派追剿总司令薛岳等以追剿红军为名,派大军进入贵州,以收买等手段,瓦解并兼并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黔军,使王成了光杆司令,被逼离黔。蒋介石自以为得计,但却使龙云和滇军高级军官们寒了心,因此,当蒋介石命令滇军堵截、追剿过境的红军时,龙云等害怕蒋趁此机会使滇军和红军恶斗,互相削弱,蒋军从中渔利,因此滇军对红军作战不力,一般采取追而不堵的方针,所谓“追剿”,也往往只是尾随红军,总隔一二日行程,既可以避免和红军“直接作战”,又可以此为理由,尽量阻止蒋军入滇,龙云这种作法,客观上对红军当然是有利的。

1936年西安事变,龙云发电谴责张杨,向蒋介石表示忠心。事变在周恩来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龙云对中共不计前嫌,以抗日大局为重,表示钦佩。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中共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的气氛感召下,龙云萌发了爱国精神,支持中共在云南的地下组织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云南日报》经常刊登新华社的消息,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还转载过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彭德怀的文章。

1937年8月8日,龙云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机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龙云和朱、叶都是云南讲武堂先后同学,龙要求派滇军军事干部到中共领导的部队学习游击战术,还主动提出要 and 中共建立无线电联系。朱德送给龙云一本密码。这本密码在后来起到重要的作用。

回昆明后,龙云立即组织抗日部队,并派出卢汉率领的第60军(共四万多人)出师抗日,在台儿庄与日寇血战,给敌军以重大打击。1938年8月,朱德给龙云写了一封信,对龙云和云南人

民积极抗战给予热情肯定,信中还说:“抗战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团结无论如何,必须巩固扩大;全国同胞抛却过去旧嫌宿怨,合亿万人之心为一心,本抗日高于一切之原则,努力做去,则胜利自然在危难险阻中获得……”中共的这些统战工作,对龙云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

七七事变后,原地处平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后日军继续侵犯,武汉危急,联大又奉命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开学。

西南联大为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学原则,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控制学校自由的措施,采取抵制或消极对付的态度。如教育部规定国民党党义为必修课,西南联大采取大课堂讲座形式,后干脆改用学生交读书报告方法代替。实际上大多数同学从未听课,也未交读书报告,但成绩单上这门课程一律及格。教育部曾颁布大学文学院共同必修课目表,之后又陆续颁布各系必修课程、部门教材等,这种硬性规定激起了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反感,1940年4月在西南联大教务会议上全体教授通过一封致教育部的公函,有理有力地对教育部这种规定予以驳斥,在实际教学中许多课程由教授们自选自编教材,自由讲授。教育部鞭长莫及,只能默认。

西南联大实行“民主治校”和“教授治校”,学校的大政方针都由教授会议和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的校务会议决定。学校也有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姚从吾)和三青团分团部(主任陈雪屏),但姚和陈只能以一般教授身份参加会议,并无特权,因此学校的工作未受他们的牵制和影响。教育部颁布《专科以上学校训导处的组织》规定,各校的训导处要承担党、团委委托的任务,西南联大的训导处也没有认真执行。

西南联大由三校联合组成,三校的校长(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共同组成常委管理学校,但因蒋、张二位在重庆任公职,日常校务由梅一人负责,梅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



1945年5月,西南联大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实行民主,废除独裁

对大师十分尊重。三校都是名校,大师云集。在西南联大,尽管三校历史、传统不同,教师之间学术派别各异,政治见解也不尽相同,但都受到学校当局尊重,得以自由研究,自由讲授。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记:“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生辉,相得益彰,八音和奏,终和且平。”

曾长期担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奚若教授多年负责讲“西洋政治思想史”。他详细讲授欧洲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关于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讲以权力制衡权力的必要。他推崇卢梭为“革命教主”、“自由之神”,并说他们的思想虽然产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西欧,但这些思想是属于全世界和属于全人类的。根据这些思想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保持政局长期稳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权得到伸张。他还举出大量中外事例来说明,不管任何形式的一党专政,必然带来独裁和腐败(反对一党专政正是当时中共提出来的)。他的威信很高,国民党聘他为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但当他发现这个参政会有名无实,不过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装点门面的时候,他就拒不参加了,并把政府寄来的让他到重庆开会的经费退回,在电报上写道:“无政可参,经费退回。”当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一律要填表加入国民党,他带头拒不填表,影响一些系主任也不

填表,教育部也无可奈何,此事就不了了之。

政治系教授钱端升讲授他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详细地介绍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并比较它们的优、劣点,使学生对西方各国多党政治、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了解。经济学教授陈岱孙讲凯恩斯学说,赵迺抃教授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

这些课程不但吸引了大批联大学生,而且昆明市其它大学的学生和市民也闻风旁听,有的站在窗外听,其影响广泛深远。

(四)

三校的学生在抗战前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在长沙临大的时候,他们就展开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到了西南联大,在中共领导下的群社尤其活跃,他们请进步记者范长江、陆诒讲华北战场和八路军抗日的情况,他们办壁报和三青团宣扬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谬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还和三青团分子进行学生自治会竞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蒋介石集团宣称新四军是“叛军”,将新四军军长叶挺“革职”,交付“军法审判”。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被国民党检查

机关扣留,开了“天窗”,临时由周恩来书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在头版“开天窗”处刊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群社的《群声》壁报刊出“终刊号”,贴出了《新华日报》的剪报资料,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影响巨大。

国民党当局对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早就不满,对西南联大学生组织群社的种种活动更十分恼怒。1941年3月上旬,蒋介石派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到昆明,要抓进步学生,遭到龙云抵制,康泽未能得逞,悻悻而去。

在白色恐怖阴霾下,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同学一百多人疏散到云南农村各地,隐蔽起来,同时散布民主的种子,西南联大校园暂时一片沉寂。

1942年1月发生的倒孔游行,使西南联大民主的声名,又一次远播。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不久日军攻占香港,当时滞留在港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以及联大教授陈寅恪等都无法及时撤离,原因是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垄断了中航公司的飞机,专门运他们的私人财物家具,孔家甚至把洋狗也用飞机运到重庆。重庆《大公报》揭露此事,引起西南联大师生极大愤慨,吴晗教授在讲历史课时,联系时局,对此予以抨击。1942年1月7日,西南联大学生发起讨孔游行,各校同学参加的两三千人。地处四川和贵州的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

同学也以不同方式热烈声援。在整个大后方引起震动,也引起蒋介石震惊,蒋一再密令龙云“负责取缔,严予禁止”。接着又派康泽来昆明抓人,龙云又一次以“等因奉此”的公文旅行来应付,不采取实际行动,康泽又一次悻悻而去。

(五)

龙云为什么能够一再阻止蒋介石来昆明抓人?原来,龙云主滇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被蒋介石并吞,因此他多次以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的名义发布命令,不许蒋系军警进入昆明,龙云的军、警、宪兵以很大力量来对付蒋的军警特务,蒋介石和龙云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日益加剧。在军事方面,蒋以抗战需要为借口,调大量中央军进入云南境内,计有杜聿明、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等率领的几个集团军共约50多万人,而滇军只有十二三万。为什么蒋介石不马上动手解决龙云呢?原因是:云南是当时大后方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从中国各地撤退到云南的军队、机关、学校等数以百万计的人员的粮食、给养全由云南负担。云南又是当时唯一国际交通要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大量美军和新闻记者驻在云南各地,蒋介石如果对龙云动手,马上就会被认为“妨碍与盟军配合作战”,会受到美国的谴责,因此蒋介石只好暂时忍耐。

另一方面,龙云也感到蒋的沉重压力。因此,他主动向联大教授罗隆基提出,要和周恩来见面。获此讯息后,周恩来,董必武决定派南方局宣



西南联大的“民主墙”

传部长、《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岗为中共代表，于1943年赴昆明和龙云谈判，取得了很大成功。龙云同意在他所主持的滇黔绥靖公署内（后又搬迁多次）设立秘密电台和中共联系，用的正是朱德送给他的密码；龙云还同意在昆明设立《新华日报》营业处，日销《新华日报》3000多份，这对当时只有30万人口的昆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中共办的《群众》杂志和其他进步刊物也很畅销，中共影响日益扩大。

华岗到昆明，公开身份是云南大学教授，化名为林少侯，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团结西南联大、云大等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创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每两周开会一次，地点有时泛舟滇池，有时在唐家花园（唐继尧的儿子唐筱蓂的住宅）的竹林里，参加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楚图南、周新民、李文宜、唐筱蓂、冯素陶、李公朴等。在会上，政治和时事报告由华岗负责，他介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八路军、解放区的情况；教授们则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通过学习，这些教授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后来都成为民主同盟的领导骨干，他们写文章、发表讲演、带头游行，在西南联大、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

1944年春，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从河南向南进犯，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几个月之内，日军连陷湖南、广西重镇，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大后方的重庆、昆明都在敌军俯视之下。人心震动，大家关心战局，关心政治。中共指出，战事之所以失利，主要是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军队腐败，因此必须结束一党专政，组成联合政府，发扬民主，才能取得胜利。中共的主张切中要害，深受各方面欢迎，也促使大后方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涨。西南联大学生组成各种社团和民盟以及其他团体一起，利用各种时机，开展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双十节讲演会、纪念鲁迅大会、要求实行宪政的各种会议、纪念云南护国运动29周年大会等等。进行这些活动时，龙云派军警保护。1945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大举行的五四纪念活动可以说是民主力量的大检阅。从4月30日到5

月5日，天天都有大型的丰富多彩的活动，由曾昭抡、李继侗、闻一多、吴晗、李广田、卞之琳、楚图南、张光年（光未然）等主持，或讲演，或朗诵诗，或指挥大合唱。每次活动都有昆明的大中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以至近万人参加，大家沐浴在节日的气氛中，如醉如痴。五四那天，在云大操场开完会后，一万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奋勇前进。

（七）

由于华岗、民盟等对龙云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也由于形势的发展，龙云的思想也日益进步。蒋介石先后派康泽、刘健群、何应钦等来昆，开出黑名单，要他抓人，要他镇压学生运动。他开始时口头答应，实际上不采取行动。后来他思想更加明确，他说：“学生都是好学爱国的，借事生端的是极少数，他们闹事，是因为政府有些事未办好，他们有意见，只要政府改善，他们会听话的，有些人无事找事，学生说几句话就要追究，教授讲学也干涉，结果越压越闹。”龙云还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实多。有些人不听我的话乱来，以后闹出事来，我就不管。”几句话传出来，特务们就不敢动手。由于龙云对特务的控制，也由于中共地下组织严密，特务们对于中共情况不了解，也无从动手。据曾任军统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回忆，在他任内，始终没有找到中共地下党的线索，他的前两任也没有找到。所以，在抗战八年期间，除文山地区一个不大的党支部遭到破坏之外，全省的中共地下组织都没有遭到破坏。

1944年底，龙云宴请楚图南、闻一多、冯素陶等人，并举行了秘密的参加民盟仪式。入盟后，他不参加民盟的公开活动，但在政治上支持民盟，经济上给予援助，并明令保护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允许游行示威，等等。

解放后，龙云回忆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尤其是西南联大的教授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谈论国家大事，所见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大家都深恶痛绝。”

（责任编辑 吴 思）

北洋军阀时期为何也有『民主』

● 李庶民

一、一个矛盾的问题

从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1927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这十几年的时间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亦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期间,当政者频繁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军阀统治的本质未曾改变。因此,在人们长期的印象中,这一时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特别是政治方面,腐败、专制、独裁几乎是这一阶段的代名词。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近代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也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壮大,等等。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发生了那么多活跃的社会运动,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答案在于,北京政府时期,在种种因素作用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为上述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二、北洋军阀时期民主政治发展的表现

民国北京政府在它存续的十几年中,被动地逐渐形成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虽然很不完善,但是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权利。

(一)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受到制约。北京政府时期的宪法,除《中华民国约法》外,均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以这一时期产生法律效力时间最长的《临时约法》为例,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决议”;“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公使得参议院同意”。其他诸如宣战、缔约、媾和及宣告大赦等权力均受到参议院的严格限制。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法律,忠于职守,否则,将受参议院弹劾,并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天坛宪法》中,对总统的权力作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在肯定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的同时,又在事实上“合法”的剥夺总统的这项权力。这样,从《临时约法》发展到《天坛宪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在法律条文上逐渐完善。

三权分立政权机构是民主共和国的标志,在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面对段祺瑞内阁的专权,国会内进步党和国民党摒除党见,联合起来,维护权力制衡的原则,对段祺瑞的权力形成有力牵制,这一点,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1917年5月,段祺瑞提出参战

案,国会拒绝合作,形成了政治僵局。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适得其反,国会于5月19日作出决定,先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这就表明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态度。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从而引起政府危机,使段祺瑞的参战计划严重受挫。我们可以看出,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一些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二)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的尊重和保障。北京政府时期的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赋予人民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新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新约法”第五条到第十条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该时期的宪法已从立法角度确定个人权利并提供保障,并包含平等原则和保障权利观等内容。法律上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并没有在实践中全部落实,但是,即使是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司法独立体制得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法官独立审判,无

论何人,不得干涉之”;“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特别是最后这一条对法官自身权益的保护,更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1920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的形式对法官的自身公正作了补充规定:“法官不得列名党籍。”“无论何种结合,凡具有政党性质”,“法官”盖不得列名,“其以列名党籍者,即行宣告脱离”。这一点最具现代法治精神,使司法审判不会因一党私利而有失公正。

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仅写在宪法中,而且,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20年代围绕“金佛朗案”的争执,能够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中司法独立的特征。早在1923年5月,直系政府曾做出决定,按照法国的要求解决“金佛朗案”,但为国会所否决。同年12月,曹锟基于“执政在野,亦反对甚力”而再次拒绝各国的要求。1925年4月11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这件事情导致司法机关的介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10月2日,翁敬棠写出8000字报告,确认“金佛朗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认为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已触犯刑律第108条,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建议“飭令主办公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10月12日翁敬棠又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金佛朗案”从犯。翁敬棠以一个地方检察官的身份侦察此案,搜集证据,侦察活动历时6



黎元洪



段祺瑞

个月,整个过程依法进行,当时的中央政府至少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样的调查,与当今美国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以及英国法官对布莱尔政府“凯利事件”的独立司法调查亦有一定可比性,可它却发生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这说明,北洋军阀时期的司法独立并非全是虚伪的。

(四)言论自由得到一定的保障,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旧中国的政治历来基本上是由少数上层统治者操作,严禁民众议政。北洋军阀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东方杂志》、《民国时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先后创刊,人们利用舆论阵地对政府作合法监督。早在1913年4月27日,因北京政府涉嫌“宋案”,上海民众就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涉及二公,望总统携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庭之审判。”这在当时震动很大。巴黎和会期间,国内舆论的活动表明现代舆论开始成熟。1919年2月5日《民国时报》披露,中国作为战胜国,按国际惯例,有权向和会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蛮横干涉。消息传出,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北洋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没有向日本做出让步。《民国时报》在《本社专电》、《特约》等专栏上披露和会的发展情况,在巴黎的梁启超也利用《晨报》为舆论工具,不断报道有关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利用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舆论方面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此外,如果当时没有允许民间办报、言论相对宽松这样的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三、北洋军阀时期政治民主发展的原因

北洋军阀政府在民主政治方面的上述进步与发展,其原因当然不是军阀统治阶层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而主动推动的,相反,动因主要来自统治阶层以外的力量。

(一)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

原因。辛亥革命虽然夭折了,但是它已经构筑了一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运行的基本框架,并在多方面进行了实践。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定的三权分立政体,再到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民主政治理念、原则和制度。辛亥革命的果实虽被窃取,但毕竟国号未曾改变,每一派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后,为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都不得不在形式上保留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以及其他许多制度,这就使革命派或其他派别的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国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政府的某些方针政策,使政府无法独断专行,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条件。此外,辛亥革命的政权虽被军阀窃取,但这场革命给民众带来的民主共和观念却没有被窃取,实际上也无法窃取。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民众头脑中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观念(有的只是“为民做主”的企盼),而辛亥革命则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洗脑”,从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广大民众不能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恢复封建专制制度(袁世凯的下场就是说明),这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

(二)军阀割据的“乱世”状态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历史上,凡是动荡、混乱的时期,政治环境往往宽松,思想言论趋于活跃,如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因为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各种力量比较均衡,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进行严密的专制统治,于是就留出了一定民主的空间。北洋军阀时期,政权虽一直由北洋各军阀把持,但军阀内部又分为直系、皖系、奉系等各派,各派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冲突,他们相互竞争,实力又相对均衡,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没有任何一派拥有压倒性优势足以实行严密的专制统治,而是都被其他各派所制衡;另一方面,各派也都愿意利用议会、报刊等作为自己参与政权、宣传观点、笼络人心的手段,于是,民主政治相对得以发展。

(三)革命党人的不懈斗争,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观条件。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并未放弃斗争。在北洋军阀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

法运动等多次斗争,反对军阀的专制与独裁,要求维护共和制度,维护国会,维护《临时约法》。面对这样强大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在许多方面继续维持和发展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政治。

(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民主政治的经济根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在北洋军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更是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民族工业的更快发展需要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且,经过辛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也有了提高,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北洋军阀虽然主要依仗军事实力把持政权,但其统治的稳固也离不开日益壮大的民族实业家阶层的支持,因此,北洋政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族资本家的这种民主诉求,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四、对当今的启示

北洋时期的民主政治实践对当今至少有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没有哪一派军阀真的想赋予人民权利,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也没有哪一部真的是为保护人民的自由,然而,那时的现实却是,人民的确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原因何在?就在于权力的制衡。正如上文所提到,当时政府的权力受到议会和司法机构的制约,便不能再为所欲为。制度永远比人重要,我们看到,即使是封建军阀那样的统治者当政,只要存在哪怕是很不完善的一些权力制约机制,那么,当政者滥用权力都已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对于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说,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无疑是最关键的一环。



曾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徐世昌

第二,辛亥革命前后,民间办报之风兴起,到北洋政府时期,全国已是报刊林立,那时,言论环境比较宽松,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批评政府的文章司空见惯,以言获罪的情况比较少见。因此,虽然当政者依然昏庸,但人们利用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利用现代舆论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使政府不可能一意孤行。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改善我们的新闻工作,一方面有利于反腐败和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这种改善本身也是民主政治的体现。

回顾整个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北洋政府时期在民主政治方面的确是一个亮点——20世纪前十年,中国还处于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而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又长期以“剿共”的借口压制舆论、维护个人独裁;到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又发生严重曲折,以致最终发生“文革”那样的大倒退,直到世纪之末,才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走出迷途。不得不说,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在20世纪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史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中国人的一次民主政治试验。(责任编辑 吴思)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 张家康

抑孙袒陈

1922年5月7日,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他放言政治,纵论时事的园地。他的“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的主张,便是由《努力周报》传播出去的。五四运动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对安福系,支持学生运动。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又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其虚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识分子的青睐,胡适更是尤为突出者,认为只要吴佩孚不放弃努力,就能实现南北统一,产生一个“好人政府”,那么,他所企盼和推行的渐进式的和平改革,便有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和蔡元培甚至致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战争,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胡适确实太离谱,也难怪国民党人“气愤填胸”,张难先便致信胡适等兴师问罪:

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再无宁日矣。

恰在此时,孙中山亲手培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国民党内外,全国上下齐声声讨和唾骂陈炯明。可是,胡适却唱起反调,在《努力周报》上作起声援的文章: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

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呵斥之声。《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适是满脑袋瓜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能认同上述的观念,反而认为持有如此观念的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他坚持认为,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讨厌诸如“悖主”、“叛逆”、“犯上”等封建思想作祟。他辩解说:“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动,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后,便以北大同人、朋友的身份致信胡适,希望《努力周报》改变对孙中山的态度,信中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战争,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地方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李大钊的话,似乎提醒了他,他也开始反思起来,论争的调子有了些微变化,开始说孙陈之争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这种貌似公正的话语,其实质还是偏袒陈炯明,他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当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说:“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时,胡适又不高兴了,立即出面指责:“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的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

再图广东的糜烂。”

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筹北伐革命,《民国日报》刊载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同版《响影录》专栏刊出胡适短文《少谈主义》。孙中山看后,心中尤为不快,并就原报亲批下文: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这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经上海赴北京,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期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建设。可是,段祺瑞又在积极“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邀请“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善后会议”,胡适当然在邀请之列。胡适再清楚不过地知道,所谓“善后会议”,说穿了则是军阀、政客的分赃会议。但是,胡适又认为这毕竟是“和平会议”,“至少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他也愿意试他一试。

“国民大会”和“善后会议”本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胡适为“善后会议”凑热闹,自然难免为段祺瑞捧场之嫌。有文章批评胡适,受皖系军阀宠招,“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已经牺牲掉‘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在国民的叫骂声中,“善后会议”无果而终,胡适也知趣识相,借机辞去善后委员的职务。

胡适是个从不服输的角色。他固守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致《京报》记者邵飘萍的信中,他说:“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我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人权约法

1929年3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提交《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说:“凡经省党部或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

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唯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那么,何谓反革命分子呢?陈德征将之定性为:“包括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

这样的政治界定太骇人听闻了,胡适按捺不住,立即给司法部部长王宠惠写信,批评这个提案:“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的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写这封信给先生。也许此信到时,此案早已通过三全大会了。司法院也大可以早点预备关门了。我们还说什么呢?”

胡适还将信稿寄给国闻通讯社,不多日,国闻通讯社函告胡适,信稿转送各报时,被检查者扣留。胡适没想到,当权的新闻检查机构如此蛮横不讲理,他也要摆开架势,与当权者理论是非。于是,他的《人权与约法》便在《新月》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所允诺的保障人权表示失望,因为,凡此侵害



1935年,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

人民自由及财产的行为，都被冠以种种政府及党部机关的名义。中华民国政府和党部行事无法可依，人民的权利已被剥夺的所剩无几。

胡适列举出这样的事例，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受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未称“主席”，便被以“治学不严”而拘禁，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胡适说：“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唐山的商人杨某被驻军152旅拘禁，并被严刑拷打，商会代表只能去求情，而不能依照法律去控诉。胡适由此得出结论，此类事件，唯有“法治”可以规范。“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他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的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如果有侵犯人权者，“无论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人权与约法》发表后，立即引发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他的朋友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积极予以舆论支持。罗隆基紧步胡适的后尘，发表《专家政治》一文，指出：“中国的行政，目前是在这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一）武人政治；（二）分赃政治。”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要实行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梁实秋发表《论思想统一》一文，文章说：“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王造时也在罗、梁之后，给胡适以舆论声援。

他们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舆论造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蔡元培致信表示敬佩，说《人权与约法》乃“振聋发聩”之作。许多人致书《新月》，积极支持这场讨论，表示：“胡先生这篇文章应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了。”胡适太高兴了，兴之所至，文思泉涌，又连连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

胡适认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只讲“军政”、“训政”，而不相信民众参政的能力。他说，宪法可以与训政并重相容，“宪法之下可以做训

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中国几十年政治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法治；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这一点根本成见使他不能明白民国十几年来的政治历史。”在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时，他说，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结果有两大危险”：

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知难。于是打倒知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这是很自然的，既然行易，何必问知难呢？

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拥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知难既有先总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国大同志任之，舆论自然可以取消了。

这些文章写出来后，胡适的一些朋友看了，纷纷咋舌，都劝他还是不要发表，以免惹上更大的麻烦。可是，胡适却吃了豹子胆，非得要向国民党叫板，向孙中山质疑，他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这点自由主义的呼喊，很快得到知识界、思想界的回应，人们致信称赞其有胆有识。有人称颂曰：“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兄拟上胡先生谥号，称之为‘龙胆公’，取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义。”

胡适在叫板质疑时，还将国民党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数落了一番。他说：“如今中国这几十万官吏，从最高的院长、部长，一直到守门的门房，扫地的差役，”都是“靠推荐、援引、夤缘、苟且的方法来产生，”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他触犯了众怒，成了千夫所指的人物，国民党的大小官吏也就必然鸣鼓而攻之，对他进行口诛笔伐的“文化围剿”。

口诛笔伐

还是那个陈德征“高擎‘卫道’的旗帜，向胡

适发起挑战。陈德征“卫道”有功,除担任党国其他职务外,又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在《民国日报星期评论》上他写道:

在以中国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博士来胡说的。……乱道的,是革命的罪人,是主义的蠹贼,真是人人得而诛之的!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没处发表,陈德征的反响却登出来了。”一时间《民国日报》、《光报》、《时事新报》、《大公报》、《觉悟》、《星期评论》等,争先恐后地刊文批评胡适,讥讽斥骂,人身攻击。《光报》发表的《关于胡适之最近之胡说》,言辞尤为尖刻:

胡以不党之学者自居,而社会亦以是称之。故“胡说”一出,遂大得社会之同情,尤其知识阶级,大为称快。国内外之刊物,皆纷纷为之介绍。……况胡于陈炯明背叛孙先生之际,段祺瑞开善后会议之时,似尝与眉来眼去,结成露水姻缘。则今之坠欢重拾,亦属人之常情,是胡之不党云者,恐不过一时掩眼法,而背后之老板,固甚面目狰狞。

《民国日报》还发表署名无任的文章《有宪法才能训政吗》,宣扬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硬是要把胡适与帝国主义军阀划到一起,文章说:

现在的时期,中国国民党统一了中国,紊乱的中国政治渐次入了轨道,已在国民革命实行训政的时期了。同样的,在一般士大夫阶级封建余孽和新兴的资产阶级都高呼着,中国国民党独裁,中国国民党专政。他们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意义和帝国主义是一样的。

最近胡适发表他的文章,反对中国国民党的理论,颇值得我们注意的,不用说胡先生有他的立场。他的观念,是代表现在中国一班士大夫阶级来反对中国国民党的。

在一边倒的批胡大合唱中,间或也传出一些不和谐声。老友张元济适时来信宽慰,以古人“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相劝告,希望胡适暂时沉默,他说:现在街上有一群疯狗在哪里乱咬人,避的避,逃的逃,忽然间有个人出来打这些狗,哪有个不赞成他呢!但是要防着,不要没有打死疯狗反被他咬了一口,岂不是将来反少了一个打狗的人。

除了张元济,也还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有人写文章说,胡适具有真挚的心灵,渊博的学问,和大无畏的精神,并本着这种心灵、学问和精神,处处站在领导青年的地位,代表我们四万万小民来说话,即如他的《人权与约法》一文所说的话,是何等重要。他所提出的要求可说是我们四万万人心灵上所共具有的,不过想说而说不出或说得出而举不出那样有条理有根据的理论罢了。”还有的文章干脆批评国民党,是在“钳制中国说真话的人。”这些朋友的道义上的理解和支持,使胡适深受感动。

胡适对那些讨伐之作并不十分在意,相反倒担心骂人者走火入魔,损了自己做人的原则,他给杨杏佛去信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所谓口诛笔伐,终究是笔墨官司,执政者要对胡适量体裁衣,科以罪名。1929年8月13日,上海市三区第三次全区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呈请市执委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12天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委召开常委会,同意三区党部决议,“转呈中央咨国府令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接着,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的国民党机关和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先后表态,一致要求惩办胡适。10月4日,教育部发来训令说,胡适“以头脑之顽固,迷惑青年”。在中国公学校长任内,“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

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组织文人,集中撰写讨伐胡适的大批判文章,这些千篇一律的文章,由光明书局编辑出版,书名为《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刚刚出版不久的《人权论集》,也遭同样厄运。各种报刊相互攀比竞赛,对胡适的挞伐、诋毁日益升级,许多明显带有低级趣味的谩骂,如满天星雨,令人眩目,什么

“丧行文人”、“无耻文人”、“胡说博士”、“竖儒”，甚至还有更唬人的罪名，如“反革命”、“叛国者”等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胡适自我解嘲，他以鸚鵡以小小的翅膀，入水濡羽而洒之，扑救集陀山大火的故事自喻：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这是胡适的良苦用心，可是，国民党不领此情，仍是不依不饶，非要赶尽杀绝，在泰山压顶般的政治压力下，胡适不得不鸣金收兵，落荒而逃。

万山不许一溪奔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排山倒海之势。胡适在大厦将倾之际，检讨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上的错误，认为，今后“与共产党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唯一的出发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唯一的归宿处。”说穿了，他要重蹈20年前的覆辙，再擎自由主义的旗帜，给国民党当“宗师”、“诤友”，推行所谓政治改革，引领国民党走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之路。这时，集聚在他周围的“第三势力”的朋友们，一致拥戴他“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振起舆论”。于是，名为《自由中国》的刊物，便在台湾创刊了。他给《自由中国》拟订的主要宗旨是，“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胡适远在美国，只能兼得“发行人”的头衔，《自由中国》的实际主持者为雷震。胡适虽是挂名，也要忙里偷闲，给《自由中国》寄文稿。1951年6月《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批评政府机关和治安军警为谋得破案奖金，而预先设计圈套诱民入罪的骗局。此文捅了马蜂窝，台湾军政当局挑毛拣刺，求全责备，《自由中国》承受巨大的压力。可是，胡适却认为，这篇社论“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认真，”“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然而，胡适高兴的太早了，迫于如磐般的重压，《自由中国》也怯弱了，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向最高当局赔罪道歉。看了这样软弱的文字后，胡适大失所望，立即给雷

震去信说：

《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这封信刚刚刊出，便传来《新月》被查禁的消息（不多日又开放），胡适思前想后，好不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屡次说，倘使国民党肯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同陈独秀享受一样的待遇，只消三年，我的几部书都可以写完了！

胡适由纽约飞台湾讲学期间，与《自由中国》的联系更密切了，公开号召留美的文法科学生“替雷震写写文章”。

1953年1月16日，胡适拜会蒋介石时，直言不讳地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緝（国民党特务头子，笔者注）。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蒋介石为标榜政治民主，对于这些逆耳之言，并不反驳，而是“居然容受了。”

次年9月，胡适为给《自由中国》壮壮门面，撰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文章说：“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1956年10月，蒋介石将逢70大寿，《自由中国》认为建言的时机到了，便出祝寿专号。胡适别出心裁，写的文章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故事一是，艾森豪（即艾森豪威尔，笔者注）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取消接见数十位分院院长和联合学部主任的计划，因为，二战期间，他任盟军统帅时，也只接见3位受他直接指挥的将领。故事二是，艾森豪当总统后，遇到难以决断的文件时，他会在同意和否决的两份批件上签名，然后让副总统尼克松替他挑选。胡适由此引发议论说：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

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而无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听了这些话，国民党的那班御用文人，个个是捋袖挥拳，横眉怒目。《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官办报刊，联手出击，形成合力挞伐之势。他们说，胡适的文章是在“诬蔑毁谤”，“攻击革命领袖”，以“煽惑军民，分化群众”。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以极为机密的《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这个部还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为胡适的“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他的“三无”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是“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

胡适在给赵元任信中说：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如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甚至于我在1952年—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

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还是鼓吹自由主义，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组织一个在野党。他还表彰雷震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可是，1960年9月，当所谓新党正在筹组时，雷震便被逮捕，接着又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的罪名，判以十年徒刑。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得到这一消息后，他在接见记者时拍着桌子说：“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

胡适由此产生了深深的歉疚之情，“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雷震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1961年7月26日，身陷大狱的雷震逢65岁生日，以什么来慰藉困顿寂寥的老友呢？百无聊赖以诗鸣，他只好抄录南宋诗人杨万里《桂源铺》为老友祝寿：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

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是借古喻今，“民主自由的‘溪声’虽被‘万山’所拦阻，但是，到头来终归要涌至‘山脚尽’，从而潺潺涓涓流出前村”。

11月6日，在台湾举行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他又作了25分钟英文讲演，他说：“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人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此论一出，顿时掀起巨澜狂波，港台的一些知名报刊，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中华杂志》和《文星》等，连连发表文章，或褒或贬，或讴歌或批判。批胡者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所发“狂悖的言论”是在“向西方人卖俏”。他们甚至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等旧账，也全算到胡适的身上，似乎是“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了。当然，也有微弱的颂歌声，称道他是“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酒会，席间，当有人提及他的那篇英文讲演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酸疼便发作了，他尽量抑制愤懑的情绪说：“我去年说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也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他的话越来越多，后来更是颠来倒去、语无伦次地说着“民主”、“自由”等，说着说着，便面色苍白，身体倒地，虽经尽力抢救，却因心脏病猝发而长眠不醒，享年72岁。

胡适去世后，后人给他镌刻的碑文是：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我随李富春访问苏联



1956年10月5日,苏联援建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李富春为开工典礼剪彩

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

● 阎明复

1956年6月19日—9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国代表团大概有五十多人,富春同志是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是副团长,团员中有好多工业部的部长,我记得的有赵尔陆、王鹤寿、柴树藩、黄敬等等。国家计委、各工业部都有由专家、专业翻译组成的工作组,同苏联有关部委的代表进行对口谈判。

不知道经过谁的推荐,计委的同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我去给富春同志当翻译。我赶到计委见到富春办公室主任吴俊扬,老吴简单地交待了任务,要我抓紧时间做些准备,过两天就走。

6月19日,富春同志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专机离京赴苏,抵达莫斯科时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等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中国代表团下榻苏维埃旅馆,这是一座新建的接待政府客人的现代化的宾馆。

1955年夏,毛主席曾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大反“右倾保守”,使原来稳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超高速发展。几个月工夫全国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整个农业与农村发展目标都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在这种气氛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也猛烈地加快了。到了1956年1月底,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宣布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种急于求成之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以及各个经济领域,严重地冲击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

制。在这样的“反右倾保守”的重压下,各地、各部门都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超高的指标。作为全国计委主任的李富春,深切地认识到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同志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压缩过高指标的指示精神,李富春主持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订工作。这次访苏他就带着拟就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以及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草案来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

整个谈判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组会谈,一个组谈计划,另一个组谈项目。会谈方式一般先由中国方面说明情况,再由苏联方面提出问题,然后由苏方在小组中提出意见,经双方交谈后报告综合组,由综合组进行总的平衡和研究。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提出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初步意见和对中国方面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初步答复。

每天,计委和各部的同志都是上午去会谈,下午回来总结同苏方谈判的情况。然后由各部部长向富春同志汇报。我不懂业务,插不上手,所有的分组会谈,都由计委或各部的同志翻译。

两位苏联总顾问

这次我们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总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来看望富春同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觉得他很友好,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才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阿尔希波夫是斯大林于1950年亲自选派到中国来担任经济总顾问的,一直工作到1958年。他本人是冶炼专家,长期在工厂工作,到中国后仍兼任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的副部长。在中国工作期间,他做了大量工作。初期,苏联有些工业部门没有按期提供设备,影响了援华项目的进度,在他一再催促仍无结果的情况下,他专程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撤销了有关工业部的部长、副部长的职务,下令按期生产援华项目所需的设备,不得延误。从此,保证了这些项目的建设和按期投产。在

中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方面,他主动帮助我们考虑,聘请什么领域、什么专业的人才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最为需要。在物色援华的专家、顾问方面,他也是想方设法保证来华的专家都有真才实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作中他十分尊重中国同志,也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事,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60年代,苏共领导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对中国大施压力,肆意破坏苏中关系。阿尔希波夫在成都会见陈云同志时,陈云忧心忡忡地对他说,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阿尔希波夫密电赫鲁晓夫,要求当面汇报,但遭拒绝。苏中关系恶化期间,据我所知阿尔希波夫没有讲过不利于中国的话,没有做过不利于中国的事。他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洛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议,应采取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80年代初,阿尔希波夫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陈云、彭真、薄一波等老朋友的亲切会见,并同他的老朋友,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签署了中苏两国的贸易协定,为改善中苏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80年代末,受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委托,阿尔希波夫主持苏联的专家、学者研究苏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指出赫鲁晓夫及其大国主义政策是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以至于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根源。列举了大量有关事实,并提出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建议,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就恢复两国关系进行会谈做了准备。苏联解体后,阿尔希波夫又以国家杜马代表团成员和民间团体领导人的身份多次访华,受到中国同志们亲人般的欢迎和接待。为表彰他五十多年始终如一致力于维护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感谢他对中国的建设所做的贡献,在庆祝他八十华诞的时刻,中国对外友协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节”的荣誉称号。阿老亲眼见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无比欣慰,他感慨地说:“我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在介绍阿尔希波夫时,还想谈谈阿老的前任、苏联顾问团的第一任团长科瓦廖夫。科瓦廖



1984年12月24日,陈云(左一)在北京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右一),左二为薄一波

夫原来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苏方负责人。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会见毛主席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时,科瓦廖夫曾作为随员一同前来。之前他在东北解放区帮助修复铁路。3月下旬,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后,科瓦廖夫就从东北来到北平,因为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国民党政府到广州去了,科瓦廖夫就成为在北平的苏联政府官员中职务最高的代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接见他,介绍当前的局势,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特点等等。同年7月初,刘少奇秘密访苏,科瓦廖夫也一路陪同。应中国同志的请求,斯大林同意派一批专家来中国,帮助恢复经济,并研究新建项目,科瓦廖夫被任命为苏联顾问团的团长,这样他就成为第一任的苏联总顾问。

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时,科瓦廖夫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陪同前往。在莫斯科期间,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反映他所获悉的中共的情况。

关于科瓦廖夫和他的信,我第一次是听毛主席讲的。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四九年冬我去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坐冷板凳。好多天不见我,我发了脾气,大骂了一通,说

难道我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吃饭、拉屎、睡觉吗?”毛主席接着说:“有个总顾问,叫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后来,斯大林要见我了,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了。”毛主席在谈到四八、四九年期间斯大林对中共、对他本人有疑心,认为他是“半个铁托”时,也提到科瓦廖夫和他的信,说直到派志愿军去朝鲜参战,斯大林才完全相信中共。

师哲同志在他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曾经写到这一段经历。书中说,科瓦廖夫和使馆的参赞、中文翻

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科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就是上面讲到的那几句发脾气的话。其目的是让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反映毛主席的不高兴。

师哲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科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科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我向主席解释说:科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么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就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科瓦廖夫将采取什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得等等看。

不出所料,科瓦廖夫回去之后写了一封对中国很不友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立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

后来,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问题。毛主席提出是否可把科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科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于是,斯大林特意为中国选派了一位 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阿尔希波夫。实践证明,斯大林没有看错人。

那么,科瓦廖夫的这一封信的内容究竟如何?毛主席又是怎样处置的呢?

科瓦廖夫写的对中国不友好的信主要是反映据称是高岗同他的谈话内容。科瓦廖夫本人谈到有关情况时说:“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开始准备送给斯大林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中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就在毛泽东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我听说斯大林把我的这份报告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关于中共中央的秘密电报送给了毛泽东。更重要的是,斯大林还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卷给了毛泽东……我感觉到,高岗这下子彻底完蛋了。(见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 1992 年第一至第二期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访问。译者潘琪)

80 年代末,我曾就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的情况向杨尚昆同志请教。杨老说:“科瓦廖夫在东北工作过,高岗对他讲了一些离间同志的话,说什么中共中央有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他高岗是亲苏派,信中都是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科瓦廖夫在信中还说,解放军大部分是俘虏兵,军纪差,一打仗就开小差;中共党员和广大干部是农民出身,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文化低。总之,把中共说得乌七八糟。”杨老说:“主席回国后叫中办把科瓦廖夫的信印发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同志,指明不要给高岗。”一直到 1954 年中央开会批判“高饶联盟”时,高岗 1948—49 年在科瓦廖夫面前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的一些话,成了他的一项错误证据。

在苏联的活动和参观

7 月 22 日,富春同志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说明”。苏联政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

柯夫及有关的工业部门的部长和专家。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了。富春同志做了即席讲话。他说,我们在计划工作中,一直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过去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讨论制定的,实施得很顺利。今年中共即将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向大会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由大会代表审议。这次我们带来的“二五”计划草案,就是征求我们的老师、苏联同志的意见的,希望你们帮助我们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好。他的这一番即席讲话是由我当场翻译的。富春同志的说明有中文文本,事先已译成俄文。在会场上富春同志没有宣读。

报告会以后,代表团的同志继续同苏联同志分组谈判。每天下午、晚上向富春同志汇报。一天早上,富春同志的秘书对我说,富春两手手背和手腕上皮肤发痒,起了一些小红疙瘩。我马上找到阿尔希波夫,他请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皮肤科专家给富春同志看病,又陪他去医院诊断。经专家诊断,说是湿疹,看来休息不好、饮食不习惯有关。医院每天派护士给富春治疗,后来,阿尔希波夫建议富春同志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去休养一段,富春同志同意了。这样,我和富春同志的秘书陪同他搬到了郊区的别墅。

别墅坐落在一片茂密的白桦林中,是一座古典式的洋房,听说斯大林曾经在这里住过。别墅周围的森林望不到边,林间小道笔直,两旁花红草绿,空气新鲜,环境寂静,适于疗养。管理局派来的厨师长会做中餐,清淡可口,富春同志很满意。克里姆林宫医院继续派医生、护士每天到别墅来给富春同志检查、换药。苏联政府还派来卫生部长,他们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对富春同志照顾无微不至。每过一两天,代表团同志就来向富春同志汇报工作。在这里,富春同志生活很有规律,病也就慢慢痊愈了。

7 月下旬莫斯科的气候闷热,阿尔希波夫建议富春同志到列宁格勒一边参观,一边休息。代表团的张玺、王鹤寿、赵尔陆等同志一同前往。列宁格勒市是 1703 年彼得大帝主持建设的一个海滨城市,原名彼得格勒,它位于涅瓦河两岸。城市是建在一百多个岛屿上的,由六百多座桥相连接,河渠纵横、岛屿错落,风光秀丽。城市中心地区保留了古都的原貌,街道宽阔,整齐划一,两旁

的古典建筑,如冬宫、海军大厦、喀山大教堂、博物馆、众多的广场、塑像,成为昔日辉煌的见证。

在阿尔希波夫陪同下,富春同志一行乘火车抵达列宁格勒,下榻在涅瓦大街附近的阿斯托利亚饭店。它建于20世纪初,古色古香,同邻近的老街区融成一体。

在列宁格勒,富春怀着对列宁的崇敬,参观了列宁为摆脱临时政府的追捕而藏身的拉兹里夫草屋和布尔什维克总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里的列宁办公室,又登上了“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列主义”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围困长达900天中英勇牺牲的80万列宁格勒市民的纪念碑献了花圈。

位于冬宫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大量的艺术品也引起了富春同志的极大的兴趣。这里陈列的达芬奇、拉斐尔、伦勃朗等等巨匠的稀世珍品,更吸引了他,使他久久不愿离去。冬宫装饰豪华,精美的屋顶壁画,千姿百态的雕像,巨型的吊灯,高大的大理石石柱,回廊通道连接一间间金碧辉煌的殿厅,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还游览了位于芬兰湾南岸森林中的彼得宫,也称夏宫,是历代沙皇的避暑山庄。在被称为大瀑布的阶梯形的喷泉群前,富春同志与陪同参观的阿尔希波夫、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合影留念,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们到列宁格勒后,富春同志叫我找到在这里学习的于绿林和聂莉。绿林是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的妹妹,在列宁格勒大学教育学院上学,攻读幼儿教育。聂莉是聂荣臻同志女儿,在列宁格勒工学院光学系上学。如今在异国他乡她们见到富春同志,如同见到家人一般,格外亲切。

在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听说富春同志来了,纷纷找到中国领事馆要求富春同志接见他们。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留学生极想听到中央的声音。富春同志同学生们的会见是在一座大礼堂里举行,他首先向学生们介绍了祖国顺利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介绍了苏联在“一五”期间对中国的巨大的经济援助,这次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对斯大林功过是非的看法,以及我们党历来反

对个人崇拜的观点。最后,富春同志希望大家珍惜在苏联学习的大好机会,埋头认真学习,掌握本领,以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富春同志的讲话,针对性强,观点明确,亲切诚恳,感人肺腑,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对列宁格勒的短暂访问结束了,正逢暑假,绿林、聂莉也同我们一起回莫斯科。

三次探望

在莫斯科期间,富春同志受中央委托,专门去看望了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王明夫妇住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很有名的疗养院,叫巴尔维哈,是苏联中央领导人疗养的地区。他住在一栋小楼里。他说事前已有苏联同志通知他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和夫人都在客厅里等候。富春同志同王明夫妇握手问候,然后说,中央委托他来征求王明同志的意见,希望他能回国参加中央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王明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看样子回去参加八大的可能性不太大,后来明确表示,他不能回国参加八大。王明还问起我父亲阎宝航的情况,说他们过去在重庆时就很熟悉,并让我转达他的问候。陪同我们去见王明的是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他对富春同志说,王明同志的病,是他自己说的,但是我看他身体还是不错。

当时蔡畅大姐也在苏联疗养。我还陪同富春同志去看望蔡大姐。她也住在巴尔维哈疗养院,但同王明夫妇不在一个小区。蔡大姐听说富春同志要来看望她,很早就站在院中等候。富春同志下车后,同大姐握手、拥抱、互相吻面。我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中央领导人和夫人见面时用欧式的礼节,感到很新鲜。

那时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富春同志也去看望了她。因为她不懂俄文,所以配了翻译来照顾她。总工会翻译室主任林莉就给她当过一段翻译,因为江青很挑剔,林莉工作了一段就不愿意再干下去了,这样就得罪了江青。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林莉抓了起来,投入秦城监狱。林莉走后,北京医院的张亚男来接替她的工作,张亚男是李公朴先生的女儿,说起江青,愤慨万分,说这个人真难伺候。那时谁敢议论江青呢?“很难伺候”的

言外之意,大家都心照不宣了。

降低计划指标

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计委等部门的会谈也告一段落了。苏联同志对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对我国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提出了初步的答复。苏联同志认为,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道路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的“二五”时期的积累率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比例表示疑问。认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这么快,会造成很大困难,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也很困难;物资平衡方面有很大缺口,基本建设增加的比例太大。所以提出了一系列减少基本建设的投资,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的建议。关于我国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的方案,经双方磋商,由原来提出的二百三十六个项目调整为二百一十七个。

总之,对苏方的意见,富春同志认为是合理的,他们所提出问题和我们前一段已经发现的问题是一致的或相似的,如: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我们已在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我们更切合实际地制定“二五”计划是有益处的。特别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经验提请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发作用。

富春同志认为,除了个别问题外,我们都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他说,我们的轮廓草案是必须修改的,而修改的结果则是要降低,要少定指标,就是为了使我们的不致于陷于被动。看来,富春同志对这次同苏联计委和各部交换意见的结果是满意的。这些意见有益于使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富春同志怀着满意的心情启程回国了。

9月3日,富春同志一行乘坐苏联政府派的专机启程回国。令富春同志格外高兴的,就是他的外孙安德列同机回国了。富春同志和蔡大姐的独生女儿特特,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同一位苏联同学结婚,生了孩子叫安德列,这次富春同志回国



1957年,阎明复(二排中)随同毛泽东访问苏联,拜谒列宁墓

就把他带上。安德列的中国名字叫李勇,一路上安德列很活泼,我问他,你是哪国人呢?他说,我是俄罗斯中国人,“俄中人”。安德列回国后住在姥爷和姥姥家里,在中南海。他学习成绩很好,有一段时间,住在中南海的领导人的孩子们都学习解放军,在大门口站岗,安德列也参加了军训锻炼的行列,接受战士的熏陶。我当时已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上下班骑自行车路过大门口时,安德列给我敬礼。他说:“阎叔叔,我就记住你这双大鞋啦,你这双大鞋成了中南海的出门证了。”有一段时间,李勇给紫阳同志当过秘书,后来调到天津开发区,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工作很有成绩。

这样,我陪同富春同志到莫斯科,去商谈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的工作就结束了。前后两个半月,对我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令我永生难忘。

(阎明复,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 方 徨)

“以法治国”发稿追忆

● 王强华

一个重大提法(口号)的变化,往往能体现历史前进的步伐。

在经济方面,从解放初期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到而后的“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40年,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工作认识的深化。

政治从来比经济复杂、敏感。拿“法”来说,刚刚解放曾出现过“以法治国”的口号。从1956年党的“八大”董必武提出“依法办事”,到十年“文革”中事实上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真经,再到现在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肯定——否定——肯定”,历史仿佛走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圈子。人们对“法”的认识升华了,整整花了半个世纪的光阴。

被郑重载入庄严宪法的“依法治国”(注:“以法治国”和“依法办事”本质上不应有区别。“依”,即依靠、按照的意思。而“以”即使用的意思;作为介词,它又能解释为按照、依照。可见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一致的。参见1987年《法学》第10期第14页),今天已成大家的共识,人们对这一口号习以为常、耳熟能详了。

可是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也许不会知道,正是“以法治国”这一口号在20多年前还是一个“禁区”,不仅一般百姓不愿意“碰”它,就连某些专业工作者对它也不理解,讳莫如深。这里我介绍一件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当时我正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分管法制宣传。

1982年我国颁发了新宪法。为了宣传新宪法,《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首都知名学者举行

座谈会的新闻。文中写道:

座谈会认为……新宪法的实施将进一步开拓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它将标志着由“人治”到“法治”的进一步转变。有的同志发言指出,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或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是“法治”,就是我们“以法治国”的根据。大家认为,依法办事,不仅指政治机关的活动,而且指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活动,举国上下加强法制教育,才能开创依法办事的新局面。

新闻发表的当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座谈会主办方一位负责人打来的,声称有两位有关方面高级别的负责人读了这条新闻,想就其中个别提法与我“交换意见”,让我现在就到他们办公室去。

这条新闻是《光明日报》一位“专跑”政法的女记者现场采写的,由我编发。记者写稿和我编发时,字斟句酌,如反映与会专家意见时,有三种提法:“座谈会认为”、“大家认为”、“有的同志发言指出”。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语言雷同,主要是加以区别,举凡大家常说的,就用“座谈会认为”、“大家认为”,而像“法治”尤其是“以法治国”这样敏感的鲜见提法,则冠以“有的同志”定语,表明持该意见的只是个别人,既不是座谈会的主流观点,更非主办方的“官方”意见。

但即使这样,仍然引来了召见的电话。我立刻意识到“以法治国”的提法可能出了“问题”,也知道需尽快前去聆听意见。但我胸有成竹,一是知道座谈会上的确有的学者提出“以法治

国”，记者如实写入新闻，不是“客里空”；二是知道要我去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为人谦和、讲道理，不会无缘无故给报社和我上“纲”、“上线”；三是最主要的，我过去对“依法治国”口号进行过思考，也搜集了有关资料。1981年，我就写了篇《试论依法治国》的文章，论证了这一提法，发表在1981年《法学杂志》（北京市法学会主办）第3期上。在这以后，在

《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新闻之前，我曾听说彭真在会见一家权威的中央大报主要负责人时，就说过我们要实行“依法治国”，还听说叶剑英在一个什么地方谈过“依法治国”的问题。而在当时的法学界中更有不少人反对“人治”，主张“法治”，有人率先提出了“依法治国”。最有力的是在本报这条新闻以前《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发表过一篇短文，也提到过“依法治国”。

由于我掌握了这些情况，特别是知道叶剑英、彭真都说过“依法治国”，我接到电话以后倒也不紧张。我把当时保存的资料带上，行前又打电话到中央某大报找到有关负责人核对了彭真的意见，就赶紧找了辆车前去。听到的意见果然如我所料（大意是）现在中央对“法”的提法是“依法办事”，没有提“依法治国”。《光明日报》的新闻提了“依法治国”，把“法”的作用上升到“治国”的高度，那么“政治”将被放到什么位子上，而“党的领导”又怎样得到体现？

面对几位老同志，面对这个敏感话题，我能说什么呢？争辩没有用处，反而会伤和气。我一方面真诚表示，我一定把老同志的意见，原原本本汇报给报社编委会，如果报社认为确实新闻有错，想办法补救一下；另一方面，又像传播“小道消息”那样，把我掌握的上述情况，特别是彭真的那次谈话内容，报告给他们。还告知《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某年某月某日刊登的短文，也有同一提法。意思不言而喻。《大地》上的文章，白纸黑字，发表的时间比《光明日报》早，《人民日报》比《光明日报》重要，造成的后果当然更加严重。

中国法学会举行学习宣传新宪法座谈会 加强法制教育开创依法办事新局面

本报讯 十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中国法学会连续举行学习、宣传新宪法座谈会，法学家们畅谈新宪法的性质、意义、特点和优越性，表示要为新宪法的实施做出应有贡献。

座谈会认为，新宪法体现了大思精，经纬万端，它

强调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了五四宪法中关于统一战线性质、任务和作用的规定，进一步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明确地载入了宪法。把关怀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入宪，不仅在我国是第一次，其他国家也不曾有。

座谈会还认为，党和国家在健全法制方面，早就概括地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新宪法的实施将进一步开拓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进程，它将标志着由“人治”到“法治”的进一步转变。有的同志发言

指出，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是“法治”的根据。大家认为，依法办事，不仅指政法机关的活动，而且指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活动，举国上下加强法制教育，才能开创依法办事的新局面。

座谈会由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杨秀峰主持。到会的有法学专家、教授和法律工作者三十多人。

我平心静气地说了这一番话以后，很快得到老同志们的理解，他们说请你来本来就是沟通一下，你提供的情况很好，以后再研究吧！

以后再也没人提及此事，一场短暂的误会消除了。

五年以后，1987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原题是《再论依法治国》（发表时被编辑改为《“依法治国”的口号没有错》），刊登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主办的《法学》1987年第10期上。该文先从语意和逻辑上分析“依法办事”与“依法治国”的异同，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不能说“依法办事”正确，“依法治国”错误；后面着重论证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本质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观点。

这也可以算作对1982年《光明日报》上那条新闻的解说吧。

现在已是2005年。时隔20多年，我之所以重提此事，是为了说明一个重要的提法，特别是新的提法，出现以后往往会经历不同认识的碰撞、观念的更新，才能逐步地被众人所理解、接受，而历史也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前推进。

今天，还有哪些重要的提法（如新闻方面的“舆论监督”），需要人们深入审视，正确对待呢？（责任编辑 致中）

我怎样成了小彭德怀

● 宋铭赋

1959年我32岁,在浙江省中共金华地委农工部秘书科任职,做的虽然是机关工作,但也经常下乡。因此,对金华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兵团作战”所带来的祸害,见到的不少,听到的则更多。每当夜深人静之际,那“三面红旗”运动的景象,一幕幕映现在眼前,农民对人民公社的怨言,余音在耳。我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发生了疑虑:这样下去能把生产搞好吗?

1959年春夏,党中央郑州会议后,金华地区人民公社的体制已从大公社(区级)为基本核算单位退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成为公社(区)、管理区(乡)、大队三级所有。然而,大队规模多数在百户以上,甚至有数百户的,小的有几十户之多。大队既是经营单位又是生产单位,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劳动力在一起劳动,“大呼隆”生产、“大锅饭”分配的弊端依然严重存在。面对这种情况,各级农村工作干部和广大社员,都在寻求克服的办法。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金华地委决定:1959年9月,由地委农工部负责召开一次全地区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8月,地委农工部紧张地进行着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

大会筹备工作之一,是要总结一批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典型,以便在大会上交流。为此,地委农工部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分头奔赴各县农村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农工部领导委派我带一个调查组到东阳县安文公社去摸摸情况。我们一行三人到了安文,首先听取了公社书记李世祥同志的介绍。他介绍了全公社的工作情况后,又专门讲了云山管理区上马石大队的经营管理新办法,并以征询的口气对我们说:“他们(指上马石大队)的办法不知道行不行,请你

们去看看,怎么样?”好呀,就去看看吧。”我答应说。

第二天,我们翻山越岭来到了云山管理区上马石大队。这里属半山区,有田有地有山,是有名的“云山芍药”产区。上马石大队是管理区机关所在地,有一百几十家农户。我们进入上马石大队辖区后,就对它产生了良好的印象。社员们三三两两、老老小小都在玉米田里忙碌着,玉米苗已有一尺来高,茁壮地生长着。微风吹来,绿油油的叶儿随风摇摆,似乎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在这里,看不到“一条龙、一窝蜂、大呼隆”的人群,只有分散劳动的、由家庭成员组成的劳作组织。

一连几天,我们分别召开了管理区、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的座谈会,又上门访问了一些农户。他们详尽地向我们介绍了上马石大队为克服“一大二公”所带来的各种弊端而建立的生产责任制的具体做法和良好的效果。他们把土地固定到户,把一年到头的农活除收种之外都包到户去完成,年终实行奖罚。他们说:“我们这里土地零星,小丘分散,一百几十个劳动力集中在一块土地上是不好劳动的,生产也是搞不好的,所以想出这个办法来了。”我把他们实行的办法取了一个名称,叫:“按劳分田,包工到户”。干部、社员对这个办法从心底里感到满意。他们高兴地说:“有了这个办法,出工不用催,干活有劲头,担子大家挑,生产节节高。”在被“一大二公”搞得晕头转向的日子里,我们对这个能把生产搞好的管理办法,给予极高的评价。在调查报告中肯定了“这是管理工作上的创举,是先进经验”,并指出“这办法的产生,有它的客观基础和必然性”,“集体经济不仅有集体责任制,还必须要有人责任制,没有个人责任制,责任制缺乏基础,生产

是搞不好的”，主张把经营管理权下放到户。我们以满怀喜悦的心情把调查报告送到领导的手中，建议给予推广。

领导看了我们的报告之后，表示不能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上马石大队的办法犯有政治方向性的错误。对此我想不通。

1959年9月，金华地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兰溪县上华公社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县的农工部部长、干事和分管农业的公社副书记等数百人。会上，我仍坚持要推广上马石大队的经验，领导仍不同意。为了统一认识，领导专门召集到会的县农工部部长进行讨论，领导说：“上马石大队的办法是单干，是政治方向问题。”我说：“土地、耕牛、大农具均属公有，收益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不能说是单干。”各县农工部部长们听了我们的争论，均默默不语，仅说了句“这种办法我们那里也有。”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最后领导以“先发下去让大家讨论讨论再讲”的变通办法，暂时结束了这场争论。

时隔不久，“彭德怀事件”发生了。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金华地委对“按劳分田、包工到户”的办法也有了正式结论：“属单干性质，反

对社会主义（是方向道路性）的错误”。省委农工部也在工作简报上点了名《金华大众报》还发表了评论。我理所当然地也成了“小彭德怀”，无休止的大会批、小会帮，不断的低头认错。地委终于决定给我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上报浙江省委审批。不幸中的大幸是省委批复：“属思想认识问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同意戴帽子。最后，我受撤职降级处分，下放农场劳动锻炼。

个人得失终究是小事，遗憾的是，刚刚萌芽的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个人责任制被宣告为非法，禁止再搞，搞起来的也被限期纠正。至此，表面上看起来问题似乎得到解决，然而，“按劳分田、包工到户”像不散的幽灵，并未因“禁止再搞”而绝迹，不少地方明纠暗保，或改头换面，或隐姓埋名，或在“地下活动”……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包干（产）到户”的责任制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

对我个人的处分，在“七千人大会”后，作了初步的纠正，在三中全会后的1981年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责任编辑 吴思）

大型诗集《胜利之歌》有奖征稿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歌颂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丰功伟绩，弘扬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不朽功勋，以期在新的世纪里，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大型诗词集《胜利之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诗词征文活动，并在征稿结束后进行评奖，同时结集出版。

一、征稿对象：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诗词爱好者及社会各界人士。

二、征文题材为新诗和古体诗词，作品均要求立意明确、格调健康、感情真挚，有较深厚的诗意。新诗要求不超过100行，古体诗词应大体合乎诗词格律，不超过三首，并附个人简历（限

200字以内）。

三、自本启事起至2005年5月31日为有效征稿时间（以当地邮戳为准）。

四、本次征稿活动设特等奖一名，奖金5000元；一等奖三名，奖金各1000元；二等奖十名，奖金各500元；三等奖50名，奖金各100元；设优秀奖若干名。凡获奖作品均颁发荣誉证书，并将在全国报纸副刊上陆续刊登。

五、出版时间及首发式：获奖作品集拟在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前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届时在北京举办首发式及颁奖活动。

六、本次活动由原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贺敬之任总顾问，由当代著名的文化界专家学者组成阵容强大的编委会。

七、来稿请寄（邮编：100023）北京2304信箱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胜利之歌》编委会收。

联系电话：010-87379153、87366254（传真）

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学习班

● 万炜明

1969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办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学习班。一是人数多,竟将自治区及盟市机关干部的大多数,计七八千人同时送进了这个学习班;二是时间长,从1969年底到1971年6月,共计十七个月有余,全体学员在学习班里度过了两个春节;三是办班地点的选择,虽说要解决的是内蒙地区的问题,却要全部挪到千里之外的河北省唐山市一带去办班。据说这是为了加强隔离封锁,防止学习班内外走漏风声,串通一气。其事态之严峻,即此可见一斑。

当时,文革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康生和四人帮的指使和纵容下,内蒙地区大搞什么“挖肃”运动,凭空捏造了一个所谓的“新内人党”,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经周总理发现后加以制止。一些人仗着当初有康生等人的撑腰,一面不得不承认搞了“扩大化”,一面又说要反对平反“一风吹”,继续压制无辜受害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的平反昭雪的强烈要求。自治区革委会陷于瘫痪,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了分区全面军管。

上述这个“史无前例”的学习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办起来的。这样一来,这个学习班还得增添一个特点,这个名为中央办的内蒙学习班,是在军管下办起来的。学员们按原有单位编成连队,排以上的管理人员全都来自部队。

“三不准”

这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各自带上行李和日常用具,浩浩荡荡开赴唐山地区,由于人数庞大,不可能全集中在一起。我们所属的第三大队由自治区宣教卫生部门的机关干部组成,约有两三千人,就进驻了郊外一个叫各庄地方的一座刚被腾空的部队营房。当初曾郑重地宣布过一条规定:有资格

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学员,只限于人民内部的范畴。那些在机关里被打成“走资派”或“牛鬼蛇神”的,都不能恭逢这个盛会。因之,我们这些学员刚一抵达,还口口声声被称作中央请来的尊敬客人。可是进驻不久,就对“尊敬客人”宣布了一条“三不准”的纪律。

头一个就是不准走出营房。这本来就是一个兵营,一排排的平房,栉比鳞次。平房内除了空出的过道,是一张紧挨一张的上下两层的单人床。院内操场、食堂以至小供销社一应俱全。大院围以高墙,门口站有岗哨。如果不被允许,谁也休想走出去。

第二个就是不准与外面通讯联络。学员们家里都有老有少,来的时候又走得仓促,怎能一下子就断了音信!

第三个就是如果外面有人得知你就在这里学习,要来找你,也一律不准会客。

文化大革命到了这份儿上,一般人早感到厌倦和嫌恶。而对于“挖肃”这一码事,更是战战兢兢,有如惊弓之鸟,唯恐“挖肃”一个晴天霹雳,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对于其中内情,局外人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如今不由分说,都弄到学习班来,实在是万分无奈。怎么到了这个学习班,还要受到“三不准”的禁锢呢!

毕竟是个学员七八千之众的学习班。尽管在这样严峻而沉重的气氛下,仍然有人提出:这“三不准”禁令,不是违反宪法了吗!

这个问题立时引起学习班本部高层的极大重视。不多几日,我们所在的第三大队在操场上召开全体学员大会,本大队的领导亲自出面,郑重其事地答复这个问题。解答的关键词,只有这么一句话:

有学员提出“三不准”违反宪法。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伯达同志批示的。难道伯达同志还没你懂

宪法吗!

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正是如日中天,权倾一时。那末,谁还能比“伯达同志”更懂宪法呢?在这个“三不准”的禁锢下,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只限这座大院的围墙之内。唯一的例外,是我们这些学员每月有一天列队步行到十多里外的开滦煤矿,下矿井劳动。

在学习班的漫长日子中,周恩来总理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干人,两次接见过学习班的学员,是全体学员乘火车赶赴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受此接见的,以示对学员们的关怀。接见中,中央首长依次讲话,讲了些什么已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唯独这位“伯达同志”仍有惊人之语至今令人难忘。一次是他的闽南腔的普通话噜噜嗦嗦的,实在难以听懂他在说什么。只是有一句看来大家是听明白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先是台上继而台下席卷了一阵哄笑。还有一次讲话却出奇地低调。他讲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要干什么,说他要回到家乡去练习写大字!大家都纳闷这回何以讲得如此谦逊,联系到这位权势熏天的“伯达同志”不时把自己比作“小小老百姓”,并常以此作为口头禅,似乎也不足为奇。不过同那个飞扬跋扈、霸气十足的“三不准”批示,却形成了何等尖锐的反差!

“时间服从质量”

启程去这个学习班之初,并没有宣布学习的期限。虽说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到唐山市参观访问一回那么轻松,但眼见春节将至,总得让大家回家过节吧?没想到春节过了,春暖花开了,学习班还是寒凝大地,似乎才刚刚开了个头。学员们只好透过班部要家人寄来换季的衣物。光阴荏苒,经春历夏,挨过了秋凉,怎么也该在第二个春节到来之前收摊吧?不承想过了这个春节还是音信杳然。学习班何时结束?成了每个学员的一块心病。可是



文革中陈伯达

天机不可泄露,提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种禁忌。可还是有人按捺不住,学习班何时结束?问题一再被提出来,而上面的答复,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一句话:

时间服从质量——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质量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保证的,可是,时间反过来是质量的一个要素。如果毫无节制地虚耗以至践踏人生如此宝贵的时间,弄得人心涣散,怨声四起,哪会有什么质量可言?空喊几个“不要急”就能解决了吗?

这个质量何以如此高不可攀,怎样才算达到要求?大家都感

到茫然不解。

我们是解决内蒙问题的学习班,自然要结合内蒙的实际了。当时的动乱缘起于“挖肃”扩大化以及所谓的平反“一风吹”。但学习班却要追根溯源去批判乌兰夫。远远地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就在内蒙地区实行的“稳、宽、长”和“三不两利”政策方针。所谓“稳、宽、长”,即步子要稳、政策要宽、时间要长;“三不两利”即是在蒙古族聚居的牧业地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对牧主牧工都有利。这本来是一套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尤其是牧业经济所具有的脆弱性特点制订出来的一套政策方针,不仅为当时中央所肯定,而且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民族团结、发展经济行之有效的政策方针。但是,文革一开始就闹着要把这个“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不顾实际,无限上纲,说成是“民族分裂”、“反党叛国”,什么肮脏污秽都往这上面扣。而这一套所谓的大批判,在内蒙本来早已是耳熟能详、尽人皆知,学习班还要翻出来从头再来一次,更要反反复复,揭深批透。而在四人帮一伙垮台以后,乌兰夫不仅重上天安门,还当上了国家副主席,他回到内蒙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回想学习班长达十七个多月贯彻始终的这场大揭批,无异是坠入了一个黑色梦魇的无底深渊。

至于“挖肃”的扩大化,上面是康生、四人帮一伙的纵容和支持,谁能动一根毫毛!至于下面,

那是在单位掌权的一些派头头策划于密室的勾当,局外人除了整日提心吊胆,唯恐祸从天降,哪里晓得其中的玄机?

在进入学习班的初期阶段,大家确实紧张过一阵。但也无非照着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囫囵吞下,照本宣科。因为早已没有提出质疑和异议的可能。你要揭批什么人人都依样划葫芦说一通。至于上纲上线,那是没问题的,只会愈上愈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包括痛骂自己路线觉悟不高,如此等等。这同上面的部署和要求早已经没有什么距离了。可是这个“质量”还是海市蜃楼那样遥不可及。大家于是在困惑中继续每日的揭批,由于那一套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人人口若悬河,车轱辘话说了一遍又一遍。俗语说:话说三遍淡如水。如今却成了在嘴边的老生常谈,大家也都变“油”了。而所谓揭批就变成了一个滚圆的球,任由大家轮流把它踢来踢去。虚应了一回故事,也就草草收场。

于是,厌倦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着。有些人显然承受不了这种长期的心理压力,开始出现学员自杀的事件。在三大队我们的这个连,两个患有精神病前科的人此时也旧病复发。其中一位姓张的是我们单位的中层干部,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过什么冲击,说来算是十分侥幸的。忽地半夜里起来亮了电灯,睡在一排排双层床上的人们都被闹醒了。只见他走到双层床跟前,挨个下跪叩头,口中还叨念着要给自己请罪,祈求对他的宽大处理。把一屋子的人都弄得啼笑皆非。

也就在这时,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已频频出现先兆,几次发生了烈度较轻的小地震。有一次在冬天的夜半发生,人们从房屋的晃动中惊醒,慌张地在宿舍的狭窄出口争相拥挤、践踏。有一位睡在双层床上铺的学员,梦中惊醒后从床上陡然直立,头部猛撞在天花板的一根横梁上,当即晕倒并从双层床上铺直扑水泥地上,重伤不治死亡。

学员们的厌倦情绪,加上事故的接二连三发生,学习班的管理也跟着松弛下来。学习班规定每两周可以有一天的休整,但不准走出营房院外,这时可以到附近镇集走走了。有些人就趁机三五成群外出喝酒解闷,回来后为避免在宿舍内酒气熏人,索性戴上口罩挺在床上,或者大白天里倒头便睡,管理人员也只是嘲之为“傻吃闷睡”。一些人

就这样在“傻吃闷睡”中打发日子。

学习的怠懈和纪律的松弛,凸显了学员们的归心似箭和学习班的人心涣散。凡此种种,对于所谓“时间服从质量”,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不过这样一来,好像倒是达到了“质量”的标准了,长达十七个月的学习班,就此在1971年6月间收场。

“上头发烧 下头吃药”

回到了内蒙,才搞清楚原来那位“伯达同志”已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被揪了出来。他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仅仅过了一年又四个月。他在我们这个学习班开学之初规定了“三不准”,没想到学习班还未结束,他便垮台了。真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至于学习班被这样耽搁下来,是不是也与这个风云变幻有关,那就留待学员们去感受和推想了。

学习班结束之际,出人意外地宣布了一个结业分配名单,学员们并没有就此回原单位,被挑选回原单位的寥寥无几。有的跟着要去内蒙地区的“五·七干校继续锻炼、深造”,有的调到了其它单位或下放基层,仍然有一小部分人留在学习班处理遗留问题。那末,内蒙的问题是不是就这样解决了呢?内蒙地区此时仍实行军管,原单位的人员当然也包括那些派头头被七除八拆,各散东西,局面一时相对平静下来。其后又听到了林彪叛逃在蒙古折戟沉沙的消息。但是,主要还是小平同志复出,以及一批老干部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局面才确实稳定了下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都逐渐走上了轨道。可是曾几何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的妖风一吹,单位里新一茬的派头和派性立时应声而起,到处又在抓“还乡团分队长”,重又陷入了新的动乱局面。

人们回顾这个长达十七个月的学习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种说法似乎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上头发烧,下头吃药。上头发烧犯病,靠下头吃药是解决不了的,不管怎么个吃法,至多也不过见点皮毛的功夫,治标不治本,能维持得几时!只有四人帮覆灭了,十年动乱最后结束,才会有真正的安定和振兴。

(责任编辑 吴思)

大跃进中敢于求实的县委书记古博

● 陈瑞华 张广桥

古博同志,1957年10月调任湖北黄陂县委第一书记。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我们是古博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现在已是七旬老人了。

在放“高产卫星”面前

1958年1月中央召开南宁会议后,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运动。湖北省也提出层层加码的农业大跃进的高指标。从夏收开始,宣传襄樊的小麦亩产3215斤;早稻登场,宣传麻城亩产36956斤,红安的直立花生亩产万斤。在这些“高产卫星”面前,古博同志感到不可理解,思想上产生疑虑,一亩田产3万多斤有可能吗?把一亩田当晒场,三万斤稻谷要把这一亩田场地铺很厚的一层,这不是太离谱了吗?

黄陂是武汉市的北大门,省里的领导去麻城县、红安县、大悟县和新洲县,黄陂是必经之路。一次,省委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带领任爱生、张华等一行人去麻城县查看粮食高产卫星。路过黄陂作了短暂的停留,古博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并简单地汇报了黄陂农业跃进规划和办高产试点的措施……交谈了几句后,王书记说:“麻城早稻亩产3万多斤,红安的直立花生亩产万斤,黄陂早稻产量上不去,已成‘盆地’,我们过往的车辆不愿在黄陂停留,不是路不好走,是黄陂落后。你去麻城参观一下,换一换脑筋。”还说:“你亲自做一个牌子,立在同新洲搭界的地方,有一个界线,让人知道黄陂落后……”

省委领导的批评给黄陂县委、县人委领导敲了警钟,古博同志被这高压形势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一方面立即召开县委书记处会议,针对全县农业跃进计划和粮食高产试点的工作,讨论研究夺粮食高产的措施修改跃进计划;一方面赶在孝感地委召开应城长江埠会议前进行认真调查。县委高产试验点和水稻生产好的一些农业合作社有三种情况。一是蔡店区县委的试验点,放了一个所谓亩产5000斤的“卫星”,结果是假的,是将几亩成熟的早稻移菀到一丘田里,按并菀一亩田有多少穗,每穗有多少粒算出来的;二是群光试验点,由掌握种试验田的县农业局农艺师黄继武、任传泉亲自收割试打,10亩田平均亩产820斤,超过了历史;三是罗汉区的“五一”乡高级农业社早稻大面积长势好,密植合理,种良、穗大、粒多,按实际收打的产量,平均亩产700斤。一位社长说:“这是我们这里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产量。”

古博同志在掌握了这些实际情况后说:“我们这个亩产5000斤的所谓‘卫星’是假的,麻城县亩产3.6万斤,是真的吗?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说假话,是个思想品德问题。”根据这些实际情况,他同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的县委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怡如同志商量,统一上报产量的口径,试验田报820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视察湖北大冶铁矿

斤,全县平均亩产报600斤。

在赴应城县开会时,古博同志不坐车,边走边调查。沿途看到孝感未收割的中稻不如黄陂的好,他对邻县的水稻生产情况又有底了。

到应城开会的第一天,各县报粮食产量,孝感县全县平均亩产2000斤。古博同志坐在会议室的一个“么四角”里算账:“孝感南部田地好,北部丘陵山地多。我又亲眼察看水稻生长比黄陂差,黄陂最好收成的队平均亩产700斤,而孝感全县平均亩产有2000斤,这真奇怪?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应实事求是说真话,宁可挨批评,坐‘么四角’,也不能随风跑。”他壮着胆子填报,黄陂全县平均亩产600斤,比较各县报的数字,黄陂县亩产最低。结果在孝感地区落个“右倾保守”的名誉。他只好承受着“委屈”回了黄陂。

粮食放“高产卫星”,而大办钢铁也要放“高产卫星”。这年7月下旬,黄陂组织了大办钢铁运动,在蔡店区成立大办钢铁指挥部。全县投入劳动力12万人(包括后勤人员),建小高炉1012个,动员大批劳力和学校师生到姚蔡河、溇水河淘铁砂,淘的所谓铁砂一直炼不出铁来,小高炉炼铁放“高产卫星”就更谈不上了。古博同志心急如焚,反复分析黄陂办钢铁的现实条件:黄陂没有铁矿,小高炉炼铁,大多数是收群众家

里的废旧铁熔化的,城关镇连“西寺庙”挂的一个大铁钟也被打碎化了铁,这能大办钢铁吗?现在人已上了马,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8月的一天,省委秘书长王良同志到大悟县视察工作,路过黄陂长轩岭区,古博同志在区里同区委书记陈文卿接待了他,并如实地汇报了黄陂大办钢铁,小高炉炼铁出铁难的情况,请示王秘书长:“我们县钢铁卫星放不上天,怎么办?看来,我们是难以完成这项任务了。”王良同志很坦诚地说:“你们从实际

情况出发,能炼出多少铁是多少……”古博同志听了这话,身上感到一阵轻松,送走了王秘书长后,他迅速赶到蔡店区炼铁基地,继续研究炼铁措施,争取出一点铁是一点铁。到年底全县终于凑合达到1200吨,尽管铁质差,总算为大办钢铁出了力。

在“调八万劳力支援武昌县”面前

黄陂粮食亩产难放“高产卫星”一波的余波未尽,省里令黄陂调八万劳力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的波涛又起。1958年8月湖北全省掀起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省委在武昌县山坡建起钢铁基地,并分配黄陂县调八万民工支援武昌县,到山坡、马鞍山等处挖铁矿。

黄陂县1958年全县总人口73万多人,青壮劳动力22万余人。这年7月,开始了大办钢铁,逐步已上12万多人,修“京广复线”上了1.7万人,动工新建院基寺水库,上了2万余人,本县已安排了15万劳力,哪里再有那么多劳力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更何况8万民工,远征百余里外的武昌县,一个民工需要二个人搞后勤,灶里不断火,路上不断人,得16万人才能保障8万人的供给,按照黄陂劳力的实际,根本办不到。但是为

了顾全大局，县委书记处研究确定丢己助邻，挤出四至五千人上武昌县的山坡炼铁基地。正在上人的过程中，省、地委的批评接踵而来。孝感地委副书记韩国治打电话批评说：“武昌县告了你古博的状，他们炼铁任务上不去，就是黄陂的民工上少了，挖铁矿石供不上，你们要派得力领导上去，赶快把劳力上齐，地委责成你要写出书面检讨。”古博同志说不出话来。同在县委书记处办公室电话边的县委常委张怡如接过电话说：“黄陂县十分重视调劳动力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的事，只是劳动力不够用正在调济，请老红军、县委书记处书记王世亮出马，加强领导，劳力以军事建制，成连成营的陆续在上，请地委放心。”这样，才使上下级间的紧张气氛暂缓下来。

紧接着，省委在全省大办钢铁电话会上，又点名批评黄陂古博书记。最后，古博敞开胸怀向省、地委实事求是汇报了黄陂农村劳动力的情况，全县22万青壮劳动力，上8万劳动力去武昌县，加上搞后勤需要的人，就是丢下黄陂所有的事不干，全县所有的劳力支援武昌县还不够，只有捏泥巴人”。“我们丢着秋收不收，挤出四五千人上去，这就了不起了。”他坚定地说：“请省委和孝感地委派人来黄陂调查，如有不实，撤我的职，处分我，心甘情愿。”古博同志的坦诚打动了省、地委领导，确定黄陂的劳动力能上多少算多少……这才使古博同志从精神压力下解脱了出来。

事实上，黄陂的实际工作已蒙受了损失。全县大批劳动力上了本县大办钢铁工地并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正值秋收秋种紧要关头，留在家里的老弱病人和儿童学生，无力抢收，造成一批粮食、棉花、花生烂在田里，到手的粮食和油

料大量浪费。

在《调粮 加急电报》》面前

真实地讲，1958年黄陂县农业生产是个好收成，由于“大跃进”、“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办公共食堂”、提倡“供给制”，吃饭不要钱，造成粮食紧缺，出现了1959年春天的饥荒。

1959年春节，黄陂县委和县人委的领导，放弃春节休假，正忙着计划安排新一年的工作和春耕生产，研究安排群众生活的措施，以度春荒。正在这个时候，县委办公室机要室接到孝感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家吉、行署专员樊作楷为武汉市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连续三天发来“加急电报”：

古博：请立即组织调粮指挥部，你亲自担任指挥长，务必在三天内，调18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市。

王家吉 樊作楷

秘书张广桥一天向古博同志送一次电报。他陷于沉思，只是说：“我知道了。”这个电报，他只告知了县长高起才，对外绝对保密。

紧接着，地委召开粮食工作电话会，王家吉



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机关干部炼钢

书记又强调要迅速调粮到武汉市,说:“武汉市缺粮,我们农村可以采野菜、野果吃,搞瓜菜代;武汉连草都没有挖的,我们有责任调粮支援武汉……”

另一方面,由于饥荒,黄陂农村劳动力外流的问题也出现了。农历正月十五日,省委书记王任重亲自打电话给张怡如同志说:“黄陂县六指地区约有万余人外流到武汉,你们县委要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力量,把这些人动员回家。县委一定要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把农村社员的生活安排好,不准出任何问题……”

地委的《加急电报》、王家吉书记电话会上的讲话、六指地区劳动力外流武汉,这些事交织在一起,像一磅重锤锤在古博同志的心上,既要救灾,又要调粮支援武汉,如何应对?他在县委书记处办公室里闷着三天没有下楼;县长高起才也闷在心里不做声。古博同志对当时全县粮食紧缺的情况心中有数,全县国库存粮约2000万斤;县城国家机关部门、学校,每人每月供应粮食26市斤,吃“双蒸饭”,找代食品度日;工厂工人,一月每人供粮30斤;农村“公共食堂”,粮食紧张,有不少生产队自动停办;已动工兴建的“巴山砦水库”和“院基寺水库”工地,以工代赈,一个民工一天只能吃一斤半粮,有的人已患有“水肿病”等等。黄陂的人民群众,都处在饥饿线上,把国库仅有的2000万斤粮食,调1800万斤支援武汉市行吗?黄陂会不会发生饿死人的问题?如果饿死了人,是谁的责任?不可推掉的是我这个书记的责任。是唯上按“调粮急电”调粮?还是留下粮食,暂保黄陂人民群众生活?再说,“我这个共产党的书记,是人民的服务员,不顾人民群众的疾苦和死活,够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县委书记的资格吗?不调粮,又违背了孝感地委的‘调粮指示’,又是个严肃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问题,也许我会丢官罢职,解甲归田。”这两者如何抉择?

1959年春天黄陂人民的饥荒,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事实,而调粮“加急电报”是脱离黄陂实际的,宁可自己受处分,不能唯上调粮。古博把自己的意见,同县长高起才、县委书记处书记武永胜、县委常委张怡如等同志通了气,取得共识。有县委这些主要领导的支持,他的胆量就更大了,

按组织原则,理直气壮地向孝感地委和武汉市委报告,讲明黄陂人民群众处在饥荒线上的实情,争取领导的理解和谅解,万一得不到谅解,准备罢官,也不调粮。古博同志的坦诚,终于得到孝感地委的支持,并迅速地向武汉市委报告了黄陂缺粮的问题。这就引起了武汉市委、市人委领导人的重视,派市人委党组书记薛朴若,亲临黄陂实地调查。

薛书记来黄陂后,古博同志和县长高起才,认真汇报了黄陂县粮食紧张闹春荒的实际情况,又陪同薛书记到县东北部王家河、长堰、塔耳岗、姚家集和西南部的祁家湾等五个公社进行了三天的调查,调查结果证实,黄陂县委向孝感地委和武汉市委的报告,完全是真实的,同时还发现县直机关干部、工厂的工人、学校师生以及农村社员中,不少男的患浮肿病、肝炎病;不少女的妇科“吊茄子”;育龄妇女怀孕少等问题,一致认识调18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黄陂将会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各级党委就要承担不可饶恕的责任。

粮食不外调的问题得到解决,鼓舞了黄陂各级干部搞救灾度春荒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切实做好生产救灾工作,古博书记主持召开了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做好救灾工作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千方百计地安排好群众生活,度过春荒,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不准出现非正常死人的问题,哪里发生了非正常死人的事,由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写专题报告,送县委办公室秘书张广桥(古博同志的警卫员)秘密保管,再调查处理。我们的责任重大,只准做好,不出问题。”

从此,全县上下投入到安排群众生活上来,本着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瓜菜代的精神,采取多种措施,安排好群众生活:一是成立县委救灾办公室,负责群众救灾工作。二是用好国库储存的2000万斤粮食。由县长高起才召开全县安排群众生活会议,分配粮食供应指标,有计划的定量供应到户,并明确县机关下乡工作队、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工作责任,哪一级没有落实好,就追哪一级的责任。三是农村公共食堂,采取常年、季节、临时等多种形式办,无力办的停止办;坚持办的队,取消工分粮制度。四是经地委同意,停止“巴山砦水库”、“院基寺水库”的施工,

民工回队搞生产自救。五是借适度的土地面积到户,种菜种杂粮,自种自收自用。六是寻找代食品,搞瓜菜代。动员群众下湖挖野藕、上山采野果、野菜。七是组织医疗队到各公社为社员群众治病。

这些措施,得到群众欢迎,调动了抗灾的积极性,把众多的人从饥饿线上挽救了回来。这样,黄陵县才避免了非正常死人现象发生,保护了大批农村劳动力,恢复了农业生产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这年夺得了早稻生产的好收成。

在“第二次调粮支援武汉市的问题”面前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主席给全国人民的一封信《党内通讯》,调动了广大干部和公社社员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黄陂全县早稻获得好收成。

7月下旬初,有的队开始收割早熟的早稻。正在这时,孝感行署专员樊作楷派地区财办副主任陈迹来黄陂,同县委、县人委的领导,协商调粮支援武汉市的问题,说:“武汉市粮食空虚,从外地调粮又不应急,黄陂是武汉市近郊,早稻收成

好,从黄陂调12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市越快越好,以解粮食供应的燃眉之急。”紧接着地区粮食局副局长祝庆惠也为此事赶来黄陂。

古博同志认为,这次调粮支援武汉市比第一次调粮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春天安排群众生活的措施和社员生产自救的措施得力,度过了饥荒,早稻有了好收成,农村社员群众生活相对稳定,有条件外调粮食。经县委书记处研究决定,调12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市。

从全县各公社的早稻生产情况看,横店公社的条件较好。张怡如同志到横店,立即成立了临时调粮指挥部,他亲自坐镇指挥,收割早稻,边割边捆边脱粒,边晒边装袋。各大队天天向公社指挥部报进度。连续三天,各大队把晒干的粮食送到“汉黄公路”边。从8月2日起,武汉市来运粮的车队由“汉黄公路”边的乔店摆到淝口的长江民生大堤,像车水抱子一样运粮进武汉市,很快顺利地完成了1200万斤的调粮任务。

由于黄陂县调粮应急,一时缓解了武汉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形势,受到了武汉市领导和广大市民的赞扬。为表示对黄陂县社员群众的谢意,市长刘惠农在1960年的春节,亲自到横店公社的淝口管理区民生大队拜年。(责任编辑 吴思)

按需出版 征稿

在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下属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引进全新数码印刷设备,为广大作者提供最新式的出版服务——“按需出版”。

按需出版三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适用范围:

- 各类论文; ● 影视剧本; ● 丛书、少量印制的宣传画;
- 个人自传、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
- 单位自用、专业性强、由于量少而用传统印刷无法解决的或市场无法大量销售的图书;
- 已经出版的需要少量重印的图书。

资金投入:自费。收取标准:32开内文每一面黑白页0.125元(70克胶版纸),彩色页2元(128克进口铜版纸);封面彩色每个6元(157克进口铜版纸),黑白每个1.5元。装订费:胶订一本10元,骑马订一本2.5元。版式设计、审稿费500元(一次性)。50本以下加收20%。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能出版。分为有书号 and 没有书号两种,没有书号的不能销售,也就没有定价,可以作为留世或赠送。有书号的在费用上增加6000元(一次性,包括CIP数据和编辑、三审费等等)。费用的文字基数是20万字,每增加1万字加收100元编辑费。

印制质量:上乘,完全可以放心。

要求:需要作者提供齐、清、定的稿样和光盘或软盘一份(包括内文和封面设计,录入排版采用的软件基本没有限制,凡国内现行的均可,封面设计需有书脊和封底)。如是手写稿则另外收取录入排版费,一般每一面4元(32开)校对费每千字每校次1元(负责3个校次)。封面设计如委托我方负责,设计费为800元/个。

作为一种新的出版形式,按需出版主要解决印数在1000册以下的图书出版的困难,超

过1000册的还是应该按传统出版运作。我公司也可为作者联系其他出版社以传统出版方式出版著述。比如为企业、各级机关政府部门及负责人在新华、华龄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小区北一楼5-203A,邮编:100088,热线:010-62359410(传真同),联系人:张三杰。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欢迎来电来函联系。本广告一年有效。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团泊洼的秋天》留传的故事

● 刘仰东

1975年9月,郭小川在天津静海五七干校写了诗歌《团泊洼的秋天》。第二年11月,距诗人离世不到一个月,这首诗在《诗刊》发表,随即引起广泛而热烈的社会反响。近三十年过去了,当中的一些诗句甚至整个诗篇,许多人一定还能背出来,但是,这首诗歌富于戏剧性的来龙去脉,则几乎不为人知。

2004年10月18日,是郭小川二十八周年的祭日。这天上午《团泊洼的秋天》的第一个读者,也是诗歌创作过程的惟一见证人刘小珊女士和诗人的女儿郭晓惠女士一同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1974年底,郭小川从刚解散的湖北咸宁干校转赴天津静海干校。此前,他被怀疑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瓜葛,一直在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同行者都可以在转车时回家看看,只有郭小川不准回家,在丰台停留时也有人看管,一路直接押送到团泊洼。

这时的郭小川,心绪之坏,大概达到了平生之最的地步。郭小川是诗人,由诗及人,他在生活格调上的“积极”、“热情”、“有朝气”,是不难推想的,这是他在历次自我鉴定中常用的字句。此前的政治运动中,他也被审查过不止一次,并留下了几十万言的检查交代材料。政治上的蒙冤容易把人引向两种心境。一类为气节至上,可杀不可辱,不惜以生命作代价来捍卫自己的清白。解放初期和郭小川同用“马铁丁”的笔名写杂谈的陈笑雨;“文革”中仅被拉去陪斗了一次,就投河自尽,走的即是这条路。另一类合乎“大起大落”的逻辑,思想上从“朱门”入“空门”。你斗你的,我活我的,即所谓“看破红尘”。这是根源于避世哲学而体现出来的旷达和明白。显然,用这两种心态标准去衡量郭小川,都不合尺度。把他的交代材料和同期作品对照着一看就清楚,郭小川那些很具政治震撼力和感染力的诗句中,有不少都出自自身尚为政治压力所困扰的背景下。他经常是一面以忧心写交代,一面以激情作诗歌。这种看似矛盾的创作心态的交替,恰恰表明了郭小川性格中的韧劲和政治信念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这一次,他

真有些心灰意冷了,天天以烟酒度日,身心极度交瘁。1975年2月,家属终于获准去探望,女儿郭晓惠来干校陪父亲过年,她还记得,团泊洼干校那片没有围墙的红砖房中,只剩下郭小川和几个“陪同”他的人。西北风阵阵袭来,一派荒冷而凄寂的寥落景象。郭小川见到女儿自然有几分高兴。晓惠在团泊洼呆了五六天,别时的依依之情是可以想见的。郭小川对女儿说:我以后再也不写东西了。这句话让女儿觉出父亲内心的沉重。她深感让父亲放弃笔,比放弃生命还要痛苦。

时隔不久,形势有了转机。1975年入夏以后,也就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时期,郭小川的情绪随着团泊洼干校和整个社会气候的宽松,日渐舒朗起来。恰在这个当口,原在《人民文学》杂志作编辑的刘小珊作为中国作协待分配的工作人员,被轮派到团泊洼干校“值班”,同去的,还有张光年等十来个人。他们和郭小川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

团泊洼干校处在一个令“五七战士”们感到“尴尬”的位置。它的两边,一边是劳改农场,一边是右派劳动农场。刘小珊说,有时干校学员和劳改犯发生争执,对方常回以这样有力的反击:“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也清楚。”从干校所在的位置,大致也反映出在这里接受锻炼的人们的处境。在刘小珊看来,郭小川那段日子过得还算自在,闲适,充实。他几乎每晚都和朱康平、钟灵等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冒着蚊子的袭扰打桥牌至深夜两三点;白天则读《红楼梦》,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他还自告奋勇地给“校友”们上政治经济学课;上午,他就带着来干校过暑假的一帮半大孩子去独流减河游泳。平时大家相处也都还随意,互无戒备,谈笑风生。

刘小珊回忆说,晚饭后,是散步的时间,她和郭小川常到独流减河的大堤上漫步、闲谈,这种交流套用一个外交辞令,是“广泛而深入”的。他们谈创作,谈《红楼梦》,郭小川也间或讲些当年采访中国乒乓球队时的趣闻。惟有涉及政治问题时,双方都比较谨慎。其间,郭

小川反复问过刘小珊：“我还能不能写诗？”前后问了五六遍。刘小珊说，这个问题他也一定问过别人。他问别人，实际也是在问自己。他渴望得到肯定的反馈，渴望重新拿起笔。8月份，在干校连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令人振奋的批示后，终于有一天，郭小川告诉刘小珊，他准备写诗了！刘小珊在替他兴奋之余，向诗人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写一首战斗的诗歌送给自己，郭小川慨然答允。说到这里，郭晓惠从旁解释道：“小珊阿姨多年当文学编辑，还在鲁迅文学院作写作辅导，与父亲在文学上的交流很深。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中能够相互信任，无话不谈。正是这种交流，使父亲在时隔多年以后，又拾起了过去的创作感觉，写了两首真正意义上的诗（另一首是《秋歌》）。”刘小珊认为，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气候下，同志间的信任和保护异常珍贵，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更易形成。

张光年获得“解放”，正是在这个时期，这让郭小川看到了自己问题解决的希望。刘小珊还记得，张光年离开干校时，有车开来接他，张上车前与郭小川相拥而别，他对郭小川说：“你也快了。”

9月初，刘小珊结束了一个月的干校生活。回到北京后，她和郭小川时有书信往来。她在信中经常透露一些北京的“消息”，介绍处于封闭环境中的郭小川了解不到的情况，给了他不小的鼓励和安慰，而郭的信件，则是一篇篇充满激情、富有思想，客观冷静、逻辑清晰的漂亮文章。9月间，郭小川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点意见书，同时另抄一个副本，寄给刘小珊。这些意见主要是针对江青一伙的。有些人认为郭小川是一个天才的诗人，政治智慧上则略显天真。刘小珊并不认同这个评价。在她看来，郭小川性格中固然有所谓“天真”的一面，但他有思想，善于思考，富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写的意见书，绝非一时冲动，而是他充分认识到文艺工作和社会全局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这是需要以对政治、政策等做多方面的深入思考为前提的。当然，他有时对形势的估计也会过于乐观。刘小珊受到郭小川这些文字的安装，在一封回信中写道：



郭小川 1959 年参加国庆活动

“我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它不仅有着洁净的高高的蓝天，而且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惟其接近严冬，因此更富有生命力，但不知团泊洼的秋天怎样？”郭回信说，你的信给我送来了一首诗歌的主题。这等于回答了刘小珊在干校时向他提出的要求。

9月底，郭小川寄来了一封信，里面就是这首后来打动了不知多少读者的《团泊洼的秋天》。刘小珊说，这实际上是一封诗信，因为它没有写在稿纸而是写在信纸上，信封里也没有别的附加文字。只是在诗的末尾，诗人写了这样一句话：“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这首诗是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寄出的，但刘小珊强调说，诗中的内容，代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和憧憬，实际上是一个关心国运的诗人以诗歌的形式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时间会印证这首诗的历史价值。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郭小川敢于用诗歌来表达对“四人帮”的鄙视和憎恨，需要足够的勇气。那年夏天的“小道消息”纷纷，无数人只是在私下议论而已，惟有郭小川以极大的道义勇气和牺牲精神，做出了行动。这也体现了渗透在诗人骨子里的激情和活力。郭晓惠说，父亲在团泊洼写的这首诗，与他在整个“文革”时期写作的其他诗篇相比，是最无发表意识的，完全是内心话语的真情流露。

果然如张光年所料，郭小川在这年10月被中央专案组宣布“解放”，结论未留尾巴。他很快回到北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那些日子，他经常和冯牧、贺敬之等人长谈，刘小珊曾听他说，有一回三人谈了一宿。来看望他的朋友络绎不绝，他也常进中南海。然而，好景不长，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0月下旬，他被当时的副总理纪登奎告知，到河南林县搞调查，实际是让他外出避避风头。郭小川行前来到刘小珊家，请她拿出《团泊洼的秋天》的诗稿，把原稿中“大雁还没有北来”一句更正为“大雁还没有南去”。这一走，郭小川再也没有回来。

郭小川到林县后，两人之间的通信并未间断，彼此依然保持着无话不谈的信任，只是形势看紧，有

些信只能通过亲友传递。郭小川寄来了他悼念周恩来的长诗,刘小珊曾去信详述“天安门事件”的经过。1976年7月,文化部派两个人到郭小川所在的林县农村追查情况,诗人感到了形势的险恶,写信给刘小珊,要她把写的所有书信烧掉。此时,刘小珊已把郭小川的来信转移到郭的女儿的一个朋友家里。正游移间,郭小川又来信催促说:“你如果不准备揭发我的话,请把我给你的所有信件销毁。”话说到这个地步,刘小珊不得不把信件取回,忍痛付之一炬,惟独留下了《团泊洼的秋天》,她实在不忍销毁这首佳作。她把那三张信纸叠好,用塑料薄膜严密封装,然后用四枚图钉钉在大衣柜的底部。这个衣柜至今还放在她家的一间卧室里。说到这里,刘小珊带我们参观了那个已从深色刷成白色的衣柜。她一边用手示意藏诗的位置,一边说,这是一个死沉的花梨木衣柜,除非把它翻倒,是发现不了这份诗稿的。

1976年夏天,刘小珊的日子也日见难过起来。于会泳把持的文化部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文化部分配办公室,将文联和作协的三百多名待分配干部集中到朝内大街203号院内,进行面对面和背靠背的“追查、查谣、追查反革命”的大清查。刘小珊也在当中。她回忆说,先是追查“天安门事件”和“红都女皇事件”的“涉案”人员。她咬住“没去天安门”不松口,其实至今她还保存着两次从天安门广场亲笔抄来的诗歌。后来,作协的清查转入郭小川与“右倾翻案风”的关系问题,首当其冲的冯牧被连整带吓,病在了家里。刘小珊也成了重点“关照”对象,追查的核心是针对“五点意见书”,要她揭发郭小川。有人在会上质问她:“郭小川的‘五点意见书’是不是寄给你了?有人揭发说:他有一回给你寄了很厚的信嘛。在刘小珊面临如此压力的时候,原《文艺报》编辑汤浩却站出来为她‘证明’:‘郭小川的信我看了,写的就是干校生活,秋天的景色。什么问题也没有。’”刘小珊回家把情况告诉丈夫、八一厂编剧史超。史超的主意是,这件事绝对不能说出去,万一有什么不测,你也只好牺牲自己了。这更坚定了刘小珊“不说”的决心。那些日子,她只能利用上厕所的机会给知情者写条子,订立“攻守同盟”。有一次,她在厕所里给呆在家中的冯牧写了封长信,详细介绍追查情况,后来利用冯牧来开会的机会,当众若无其事地递给他,说:“某某让我带给你一封信,你看看吧。”刘小珊说,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

因为追查不下去,刘小珊终于被“隔离审查”,不

许回家。有一次,工作组把她找去,逼他揭发郭小川,她一言不发,双方僵持了半个多小时。组长发话说:“总要讲一点吧。刘小珊就说了些郭小川和她谈到过的诸如有关‘反右’、《红楼梦》研究之类不疼不痒的问题,想应付过去。尽管刘小珊态度坚定,但毕竟承受了五十多天巨大的精神压力,内心的紧张和恐惧在所难免,身体也在度日如年的煎熬中渐渐支撑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刻,情况发生了巨变。”

10月初的一天,原音协秘书长曹兰通知刘小珊,史超打来电话,有事找她。中午,刘小珊避开众人,到朝内菜市场的电话间给丈夫史超回电话。史超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现在不是你写材料的时候了,该轮到他们写材料了。”刘小珊马上明白,“他们”指的是谁,有“大事”发生了。回来的路上,她的心情难以平静,竟致浑身颤抖起来,午饭也没心思吃。时过近三十年,刘小珊谈起那段经历,仍颇多感慨。她再三说,这场磨难对她而言,不仅是一次非常的考验,也是一生中一次人格上的提升,同时也让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史超人格上的可贵。

“四人帮”粉碎了,但诗人郭小川却在这正当放歌的日子里离开了大家,所幸刘小珊为他留下了那首《团泊洼的秋天》。刘小珊被解除审查回到家中后,马上从大衣柜底下取出诗稿,交给了冯牧,文学评论家冯牧看后眼睛一亮,连连说:“诗写得很好,哪来的?”他当即决定,在第一时间发表这首诗。

1976年11月《诗刊》发表了《团泊洼的秋天》。不久,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文艺晚会上,演员瞿弦和朗诵了这首诗,全场轰动;又过了不久,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一次“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大型诗歌朗诵会”上,诗朗诵《团泊洼的秋天》再次引发全场轰动,万余人掀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第二年《团泊洼的秋天》被编入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全市的中学课堂上,不时响起那洋溢着锋芒、真情的美丽诗句。郭晓惠就曾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中学生背诵其中的诗句。

当年,刘小珊舍着政治生命保存了这首不朽的诗篇,这是一个事实。但近三十年来,她始终没有公开这个“秘密”。《团泊洼的秋天》的读者们自然不明底细。对此,刘小珊在采访结束时作了这样的“解释”:“《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激情的迸发,心血的结晶。没有必要让人知道,这首诗和我有什么关联。”

(责任编辑 致中)

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

● 罗平汉

“三年暂时困难”对于今天的年青人来说，已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了，而对于经历了那段日子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本文试图以南方的一所普通高校为个案，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作一点描述，借此希望我们每个人倍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一、“投机倒把”的教授

1958年到1960年三年的“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倒退。到196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人所共见的严重困难，广大人民感受最直接的，是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严重不足。为此，国家一再压低粮食供应标准。196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农村口粮标准必须降低，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

应该说，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1960年7月，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份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建议对高级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二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两斤。这分别是部级和厅局级干部享受的待遇。中共中央还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今天看来，这样的照顾

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则几乎是倾其所能了。

然而，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毕竟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这里记录的南方一所普通高校的情况，便可充分体现知识分子的处境。

这个学校的党委宣传部，编印了一份供校领导参考的《内部情况》。在1960年12月的一期《内部情况》上，有一份《中文系教师思想状况》，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方某某：一艰苦就留恋香港生活，胃病一来，就想快些回家，一上街见吃的东西就买，对市场供应有意见，粮、饼国家抬高物价，国家不对，心中不痛快。自己想，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结束！这样的日子短时间还可以，长期以来，实在受不了。

梁某某：怎么搞的，为什么市场供应越来越糟了呢？58年以前多么好，那时工作学习起来精力很充沛。现在工作提不起劲，主要是没有油水。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是“一穷二白”，要恢复过来难啊！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前途渺茫。目前市场上啥也见不到，天气冷了，想给小孩买双棉鞋，找了几家铺子也没有买到，只得将自己的棉鞋前面放点棉花给他穿。把人民生活压得这样低，这样时局，几时才能好转啊！

周某某：我的肚子一饿就怀念过去的自由市场好，觉得今不如昔。我有病也不想去看，心想有病更好，可以减少吃的。每天上街东找西望，想找东西吃。羡慕别人有很多票，心想这种日子早日过去吧！希望一、二年后有好转，但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前途渺茫。

胡某某：粮食定量太低了，肚子老是饿，所以我现在常在食堂买双份菜和米豆腐吃，吃完

饭也不离开食堂,转来转回想找门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肚子饿就借别人的外汇证去买来煮。但这个门也不行了。所以我现在对以后生活没有希望。就是有也渺茫得很。何时何月才好?

看到档案中记录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这时所思考的,不是如何地搞好教学,也不是如何地搞好科研,而是如何地填饱肚子。当然,此时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填不饱肚子,可以说全国人民都是如此。

更使人感到悲戚的是,即使在这肚子空空如也的时节,也仍然没有放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警惕。

过了两个月后,又一份反映中文系教师思想动态的材料摆到了党委领导的桌子上。材料中说,中文系的67个教师中,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属于第一类的,即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政治立场坚定,能积极贯彻党的政策的有16人,占教师人数的23.88%。属于第二类的,即对“三面红旗”及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对当前形势认识模糊,立场动摇,干劲不足,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的有37人,占教师人数的44.27%。属于第三类的,即对“三面红旗”、党的方针政策有抵触不满情绪,表现消极怠工,悲观失望的15人,占教师人数的29.85%。

材料中还特地提到了一些第三类人的典型:

青年助教杨某,公开反对“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喊不出口举不起手”,认为当前城乡萧条得很,漆黑一团,感到前途渺茫。自从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他几乎天天中午都到市场,不惜高价买回各种鱼菜食品,吃后大发牢骚,说“一个月的工资买几斤鱼又完了”。

教授、系主任冯某,对市场物资供应不满,对食堂意见最大,动辄发火骂人。材料也承认,冯教授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以前待人态度很柔和,而现在却变了。至于变的原因,材料中没有说,但将冯列入对“三面红旗”有抵触的这类人中似乎已说明了问题。整理材料者不知想到没有,连学校最知名的教授也吃不饱肚子,脾气能

好吗?

据材料反映,这位冯教授,不但态度变了,而且不愿意参加政治学习,产生了强烈的退休思想。他家人还常到自由市场上去买东西,冯教授自己还卖过三只鸡。之所以卖鸡,据教授自己说是因为粮食少,卖了鸡换回些粮食,但材料提供者断定,他是想高价卖鸡后买回兔子和鲜鱼,感到这样比较划算。

该校中文系教授在自由市场买卖东西的,并不止冯教授一人。这份材料说: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自由市场最感兴趣,常常议论,高价出卖自己的东西,中文系的几个知名的副教授和讲师,均在自由市场上买过鸡和兔。

在各个党支部写给党委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一点食物,教师中有拿自己的物品去自由市场换食品的,有在食堂买两三份菜的,还有冒领别人饭菜的,可谓各种情况都有。知识分子们早已放下了架子,不顾脸皮,去掉斯文,为的是如何使空空荡荡的腹中,稍微多填充进一点东西。

笔者还抄录了一份该校化学系1961年元旦教工会餐的伙食安排:

主食:干饭。

菜:(一)烧罐头(红烧牛肉等七种合成,每三人一罐)(二)盐鱼(每人2两)(三)芋头丸子(每人4两)(四)苞菜(五)萝卜(每人8两)(六)兔肉(七)味、杂锦香汤(鱿鱼、海参、黄花菜、紫菜合成)

这份菜谱,是化学系党支部向党委汇报中的元旦会餐计划,其用意本想在于显示本系的生活安排是不错的。至于这份菜谱到时是否能兑现,就很难说了。

二、代食品与浮肿病

在大饥荒的日子里,适逢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如同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吃喝在公共食堂一样,这所学校不但学生吃喝在食堂,连教师也在食堂吃饭了。随着粮食供应量的一再降低,尽管提出“政治进食堂,书记进伙房”,但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过,真还有“巧媳妇”降临了。在该校的《内部情况》的“校外消息”栏中,

就有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文曰:

清华大学全党全校抓食堂工作。党委书记挂帅,成立食堂工作组,抽调大批干部深入食堂第一线,他们把抓好群众生活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他们抓食堂的关键,试验过碗饭、盒饭、双蒸饭、烂饭等方法,而以烂饭量多且香。烂饭法的操作规程: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

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饭重量虽不及双蒸法(按所谓双蒸法,就是饭蒸好后,再加水第二次蒸),但体积大。煮粥法:20斤米下锅,加水370斤,出粥320斤。先以大火烧开,等到米已经煮得像饭粒那样以后,再用小火慢慢煮,共要2—2时半,粥多且又稠又香。

各种各样的“增饭法”,其实不过是多加水而已。按说,北京是首善之区,供应情况还是好的,但清华的师生还得为粮米不够而绞尽脑汁。如果不是供应不足,堂堂清华怎么会有如此“先进经验”呢?

可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封闭已久的自由市场已经开放,但市场上常常是空空如也,并无什么东西可买,而且,多少年来积攒下来的一点积蓄,也很快花光。为了生存,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加入到了寻找“代食品”的行列。

“代食品”对于没有经历过那场饥荒的人来说,自然有些弄不懂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食品。而经历了那艰难岁月的人们,一提起这个名词,就有点心有余悸。说白了,所谓代食品,就是除



1961年底,刘少奇在广州温泉附近山上的树林里拣毛栗子、橡子和苦桔子,寻求解决渡荒的代食品问题

了食品之外,一切可以替代食品作为肚子填充物的东西。这里头,有植物叶子,有玉米、小麦的根须,还有其他可进肚的物品。

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承担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研究课题,而到了1960年,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则改为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了研究“代食品”的任务。

1960年月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报告一开头就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在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稍有基础,研究工作进展是比较快的。目前已有几种代用品试验成功。这几种代用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

中科院党组在报告中说,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应抢时间推广下去。科学家们估计,全国带壳橡子一年约有80亿斤,橡子仁中一般含有43%—60%的淀粉,每百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30至50斤,如果以全国橡



“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住一位小姑娘。这是大跃进时发表的照片

子产量 20% 来提取淀粉,即可得淀粉 6、7 亿斤。建议中又说,玉米根、小麦根,洗净、磨碎,碾成粉后,也可食用,而且色香味都有点像炒面。科学家推算,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 50 斤以上,如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 20% 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

这份建议还说,叶蛋白(其实就是新鲜草叶、农作物叶子和树叶晒干磨成的粉)营养好,资源广,只要采集、加工有所安排,就可以大搞;食用微生物、浮游生物,繁殖快,只要学会一定的管理技术,准备必要的简单设备,积极而有步骤地推广,就会有很大的收益。

前面提到的这所高校,虽地处中等城市,但学校不远处即是山区,山上长着一种当地称为野红薯,或叫山薯的野生植物。在大搞代食品的运动当中,为了裹腹,师生纷纷上山挖回野红

薯。应该说,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之初,该校党委就注意到了防止中毒的问题。当师生将野红薯挖回之后,即要求科研科和化学系对野红薯进行化验,同时要求师生不要随便食用。化验的结果,发现野红薯含有一种有毒的皂素,院党委随即让学校生活委员会和科研科连续发了两道紧急通知,要求暂停食用。可是此时,饥不择食的师生们已有人食用野红薯了。因为野红薯的中毒反应比较慢,一般要在一个星期,甚至十天之后才有反应,以至吃了野红薯的师生有 1600 余人。

元旦刚过,传来邻近的矿冶学院几个学生吃了野红薯中毒死亡的消息,该校顿时紧张起来。此时,学校食用过野红薯的人也开始不断出现中毒反应。学校党委赶紧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采取紧急措施,成立防治疾病指挥部,停课进行检查,中毒严重的 100 多人被送到医院治疗,将中毒相对轻一点的,集中学校观察。据调查,全校或多或少吃过野红薯的师生中有中毒症状的有近 500 人。这一中毒事件幸亏发现及时,没有导致人员死亡,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营养的严重不足,致使许多人不瘦即肿。由于食物摄入量过低,饥饿难受,只得喝水充饥,以致浮肿病普遍发生。据一份资料统计,该校师生连同家属共 4056 人,病号数(主要是浮肿病)714 人,占全校人数的 17.6%;其中教工病号数 257 人,占教工人数的 23.44%。但据经历了这次大饥荒的亲历者回忆,实际数字远远要超过此数。此外,全校还有众多的女教师和女学生患有妇科病,仅历史系就有 80% 的女生患月经病。

浮肿病的发生,原因就在于食品的极度缺乏。该校的一期《内部情况》在谈到如何防治这种病时,无意中承认了这一点。文章说:营养性水肿病是由于身体所吸收的养分不能维持其生活、劳动消耗所造成的,一个正常人如果每天吃入食物中的养分(包括蛋白质、热量、维生素)仅占其需要量的 50% 以下,在一个月内即可发生水肿,如果不足 30% 时,也可以在几天内发生。一向在社会群体中生活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如此贫困的状态之中;三年暂时

困难”之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三、灵丹妙药小球藻

在众多的师生大受浮肿病之苦之际，一种既是药品，又是美味佳饌的东西便格外被看好。这就是小球藻。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推广小球藻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可以保证至少不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二是减少乱采代食品引起的中毒事件；三是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因粮食不足而降低。毛泽东对这个建议很重视，将胡的信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要他们研究推广。

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有一份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材料，其中特地提到了小球藻的作用：云南省大理市郊区用小球藻给人治肿病，90%以上的病人都治好了。一般是三四天消肿，六七天出院。在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试治了25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78%，症状减轻的占百分之17%，无效的只占5%，没有副作用。更神的是，有个人眼睛看不见已有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小球藻洗眼，很快就初步复明。不但如此，云南省粮食厅还进行了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的试验。每人每天吃一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可少吃一两大米，十天之后，参加试验的八个人，有五个人的体重分别增加了两公两到两公斤。参加试验的人反映：未吃小球藻时，到开饭时感觉很饿。吃了小球藻节约了粮食，到开饭时，虽然也感到有点饿，但比过去好多了。

自从师生吃野红薯中毒之后，上面提到的这所学校也就对小球藻的培植格外积极。化学系在给党委的一份汇报中说，党支部认真贯彻党委的指示：“大抓代食品的培养、加工工作，拨出有机化学实验预备室及实验室所有的大小玻璃瓶作培养人造肉、小球藻之用，做到重病号每天吃一次，全系师生每周吃一次。”* 做好病号饭：每人每天吃一次人造肉汤或小球藻汤，每人每天加油半钱，主粮中加入玉米、高粱等富有营养的杂粮，对全体师生，每天煮姜汤，每席发

上一碗，多吃玉米、高粱粥等。”由此看来，连小球藻当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用。

到1961年4月，学校的小球藻生产终于初具规模，共生产出了小球藻浓缩液3287斤，原液21400斤。用于小球藻生产的瓶、罐达622个。3月中旬以来，学校的小球藻开始大面积生产，投入生产的水池达24个，面积有50平方米，能容水194吨，还有十几个池子正在改、扩建。届时，每人每天能保证吃上小球藻浓缩液4两，原液3斤。

这所学校的情况，也许在全国有知识分子的地方并不是最严重的。

据一份题为《部分地区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材料介绍，武汉大学在1961年上学期开学以后第一次检查时，发现全校有浮肿病患者405人，占全校人数的6.4%，到第二次检查时增加到443人，占全校人数的7%。武汉医学院1960年12月有肝炎患者1094人，到1961年3月增加到1130人。湖南医学院的情况更为严重，该校患肝炎的人数，讲师中占90%，助教则为100%。

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

这次共调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至等33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人。调查的结果是这些人的健康状况都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多。这123人，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较正常的有3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49人，占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离不开尚在勉强工作的7人，共占32%。

这些人都是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应属于生活条件较好的一群人，他们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识分子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局面，直到1962年才有较大的改变。

（责任编辑 吴 思）

王韬与华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

● 刘小清 刘晓滇

(一)

1874年2月4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由华人自己独立创办的《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它的面世对中国报业的发展具有首创之功,因而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特殊价值。

《循环日报》的创办人王韬是一名饱学之士。他出生于江南古镇甫里一个衰落的“宦宦之家”,年轻时的王韬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倘佯于《四书》、《五经》,闭门关舍,厚积待发。1846年,数年一次的江南乡试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贡院举行。王韬踌躇满志,志在必得。未料想六朝金粉之地的金陵,商女云集,灯红酒绿,十里秦淮更是青楼相接,歌笙达旦。置身于如此环境,王韬实在难以抵御粉香熏染、风月诱惑,苦读之志顷刻荡然无存。他情不自禁地穿梭于花街柳巷,乐不思蜀。最终,当他不得已收拢散落的书籍走向考场时,结果可想而知。

南京乡试的失败成为王韬一生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对仕途产生倦意。他去了上海,看望在上海“设馆授徒的父亲”,同时寻找人生新的驿站。当时上海福州路一带有个地方叫麦家圈,其主人为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麦都思曾在伦敦接受印刷术训练。当他抵达中国时,其携带之物不仅有一本必备的《圣经》,而且还有一部较为先进的书版印刷机。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译述西书的机构——墨海书馆。由于墨海书馆的建立,在麦家圈附近的四马路、福州路一带逐步形成书局林立、文化用品店铺聚集的局面。这便是延续至今的上海福州路文化街的由来。

墨海书馆诱发了青年王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前往拜访,参观了书馆的印书过程。其后,

王韬记之为“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1849年9月,徘徊于上海滩的王韬进入墨海书馆,被聘为“秉笔华士”,即现在的编辑。从此,他即与麦都思朝夕相伴,“谬厕讲席,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

麦都思作为在华传教士,有一番宏大计划,即将《圣经》的《新约全书》、《旧约全书》翻译成通俗易懂、平实流畅的中文,以便于其传播。但他囿于中文水平,所译文字不免“拘文牵义”、“诘牙聱口”。王韬的到来正好弥补了麦都思的不足。助麦都思译书以及对所译文字的润色成为王韬在墨海书馆的主要工作。这种宗教文字的翻译工作竟然持续了六年之久,这也是王韬自己始料未及的。王韬深厚的中文造诣,为宗教文字翻译增色颇多,以至后人誉其译本“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王韬在墨海书馆参与翻译的《新约全书》,以后被英国圣经会正式采纳为规范精译本而予以推广并且在中国广泛流传。

(二)

1862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言战事而受到清廷的追缉。他被迫避难于香港。

其时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正踌躇满志地计划将中国的经典文化作品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经典》。《中国经典》的翻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理雅各虽有留美学生黄胜等人助译,但仍感力不从心。理雅各原与上海麦都思多有联系,当他得知王韬抵港后,异常高兴。

此前,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所表现出的经学功底,令理雅各心仪已久。他立刻修书聘王韬来

书院参与翻译《中国经典》,并且“特为位置”,“优礼有加”。

自入英华书院,王韬便“杜门削迹,一意治经”。王韬的加入无疑加快了《中国经典》这一浩大工程的进展。但毕竟中国经典文词古奥晦涩,历史记述真伪参半,加之后人注疏汗牛充栋,十分庞杂。王韬不得不广征博引,详加考订,仔细辨析,同时“采择先哲之成言,纂集近儒之绪语,折衷诸家,务求其是”。仅《尚书》译述即达三年。继之《诗经》、《春秋》、《左传》译本又相继推出。王韬、理雅各鼎力合作,积数年之功,终于完成洋洋大观的多卷本《中国经典》的翻译出版工作。此举引起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以及出版界的轰动。理雅各也因此得到极大荣誉并被英国爱丁堡大学授予汉学奖和荣誉博士称号。当然,理雅各并未忘记王韬对此的巨大贡献。他在出版前言中称:“译者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中国典籍矣。”他还称王韬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至少在香港未有能与之匹敌者。

1867年初,理雅各因事回国。他时常念及王韬,专门邀请王韬作欧洲之游。这年底,王韬搭乘普鲁士轮船离开香港,开始了对他一生有着深刻影响的欧洲之行。此后,他“纵横十万里,历经数十国”,足迹遍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槟榔屿、锡兰、埃及、意大利、法国、英国,眼界为之大开。王韬自己称,一路之行“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观其兵力之强弱”。

王韬在英国逗留时间较长,有两年之久。他全方位地考察了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风俗民情以及各类新鲜事物,特别对于电报、铁路、纺织、文化教育以及城市公用事业都有较详细了解 and 记载。王韬的这些观感,以后被其累辑成《漫游随录》而刊行于世。

其时,王韬因翻译《中国经典》在英国已享有盛名,英国众多大学、教会、团体竞相邀请他前往讲学。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是王韬十分仰慕的学府,他在理雅各陪同下专程前往参观,并应邀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登上牛津大学的讲演台。他侃侃而谈,从孔孟之道的仁爱礼教直到中西文化的异同,口若悬河,一堂听者

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之震”。

王韬在英国的社会活动产生强烈影响,好多图书馆请他题词,爱丁堡大学请他主持考试,伦敦照相馆专门为他摄像并作为世界名人像挂出,当地报纸追踪报道……王韬不无得意地用四个字予以概括:“吾道其西”,意即中国文化开始逐步深入西方。

欧洲之行,令王韬眼界大开,也增加其对西方世界研究的兴趣。之后,王韬即有《美利坚志》、《俄志》、《法国志略》、《西古史》、《西学原始考》、《普法战纪》等系列介绍西方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的专著相继问世,打开了国人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口。

(三)

走出国门的王韬,呼吸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气息。他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典籍制度固然折服,但对其信息灵通、舆论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神往。王韬意识到西方国家制造之精、制



王韬的报刊政论文集

度之美、民风之好,是与社会的舆论公开、信息开放以及报刊传媒的发达互为因果的。他曾用羡慕的口气介绍:“西国日报之设所关甚巨。主笔者得持清议于朝纲国政,颇得参以政权。阅之,足以知民情之向背,习尚之好恶,风俗之浇醇,国计之盈虚,时局之盛衰,兵力之强弱。”王韬对西方报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由此触发了办报的念头。

1872年,王韬从欧洲返回香港不久即加盟《德臣西报》译员陈蔼廷创办的《华字日报》,之后担任主笔。《申报》专门载文评价王韬“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当时,《华字日报》对西报依赖较大,不仅内容多译自英文报刊,而且印刷发行工作亦由《德臣西报》担任。这是王韬颇为遗憾的。他下决心要摆脱这种局面,终于两年后创办了一份完全由中国人主宰的报纸,这便是《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完全由华人出资和经营。王韬对当时香港、上海等地中文报纸受制于西方人的状况颇有不满,他在《倡设日报小引》中称这些报纸“主笔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弊,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为此,他不无自豪地宣称:“本局倡议《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由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报馆可比。”

王韬所言的“本局”,即此前他与黄胜等人购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而成立的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办《循环日报》除得到黄胜支持外,协助办报者还有留英学习法律、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庭芳,香港著名人士何启以及广东秀才洪士伟等。原上海《申报》馆职员钱征奉命考察香港报业,滞留香港,亦成为王韬办报的有力协助者。王韬是一位很有思想的香港早期报人,他提出办《循环日报》是“以中国人论中国事”“凡时事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他认为“日报有裨于时政,报中所登之事,无非独抒管见,以备当事者采择而已。”由此可见,王韬办报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近代舆论意识。他要利用报纸议论国家大事,纵谈时事利弊和中外机宜,希冀以此影响国家当权者,影响时政。这种办报的指导思想使得《循环日报》具有不同于此前的中文报纸的一种鲜

明特点。该报设有《中外新闻》栏目,几乎每天都发有时评文章,而文章绝大部分为王韬亲自撰写。仅1874年至1884年的十年间,此类文章即有900篇以上。以后王韬精选其中180余篇,编成《弢园文录外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中国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对《循环日报》如是说:“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中适合我国者,借以讽刺清朝的改革。《弢园文录外编》即为集该报论文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与匹。”

王韬在《本馆日报略论》中曾明确表示,《循环日报》不仅要“将国内外要事消息汇于一纸,而且要毫不隐讳地表述报社看法和主张。”也就是说,王韬借《循环日报》一方面是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的闭塞状态;另一方面是借题发挥,阐述己见,引导舆论。当时王韬在《循环日报》上主要就内政和外交两大类阐明其主张。内政方面以《变法》、《变法自强》、《重民》、《除弊》、《兴利》等为题,系统宣传了变法自强的政治改良主张。在外交方面,则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日、俄、法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并提出废除治外法权、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王韬糅议论于消息之中,积极针砭现实、干预生活的办报原则于《循环日报》得到充分体现。

《循环日报》的报名,曾引得后代学者推测不已,各抒己见。戈公振认为“循环”即指“革命”,系喻太平天国的革命虽然失败,但可借报纸传播其种子,以致循环。中国古代《易经》中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衰相继”、“刚柔相克”等循环观对王韬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之所以选择“循环”,至少应包含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否定和对中国未来发展一种“由衰及盛”的设定。

《循环日报》汇世界意识与爱国情感于一炉的“兼容性”及其“言别人所不敢言”的特点,致其在当时受到广泛的欢迎,发行量处于同一时期各报发行量之首。报纸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澳门、厦门、福州、宁波、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及海外的旧金山、悉尼、墨尔本、横滨、长崎、神户、西贡、新加坡等地“凡有华人驻足者”均设有代

销处。

王韬是一位走出了传统的维新派报人。他创立了近代舆论意识十分强烈的新闻理论,这种理论同样也是他变法图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于新闻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成为开拓这一领域的首创之举。难怪有人称从王韬始,中国新闻学才算正式诞生。著名作家林语堂称王韬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1884年,经李鸿章默许,王韬终于结束了二十三年的旅居香港生活,重回上海。他在上海创办了“弢园书局”,出版了许多科技文化书籍,促

进中西文化交流。不久,他又出任格致书院院长。格致书院是我国最早教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学校。

1894年,弃医从政的青年孙中山来到上海,在《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寓所中邂逅他仰慕已久的王韬。正是这次见面,孙中山托王韬转呈其近万字的《上李鸿章书》。王韬从孙中山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身影,遂欣然为其润色,并托李鸿章幕僚罗丰禄为其转呈。

1897年,王韬在其上海寓所西草堂溘然长逝。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全套四册	67.20	8.00
之一 我的回忆	孙中山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5.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5.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邓小平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76.00	8.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 群	21.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	28.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5.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5.00
红色第一家族	马社香	30.00	5.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6.00
断桅扬帆——蒙冤 25 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 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5.00
食无禁忌	(美)巴里·西尔斯 比尔·劳伦	19.00	5.00
党史札记 (一集)	龚育之	28.00	5.00
党史札记 (二集)	龚育之	35.00	6.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周扬与冯雪峰》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领军人物,周扬与冯雪峰的名字,一直被历史反复书写着。他们两人如何从蜜月期而交恶,他们的命运如何因“两个口号”的争论而扭结在一起,并在“文革”中难逃受批判的命运,他们的手又如何再度尽劫波后紧紧相握,留下了象征他们关系的《两只锦鸡》的美丽语言……本书以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材料,从政治史意义下描述了两入曲折的人生道路,揭示了历史迷雾中的文坛恩怨。

《陈独秀风雨人生》陈独秀离开人世已经 60 多年了。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开放之际,人们自然会想起因误食此花而病发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的风雨人生。本书以 30 万字的篇幅,描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曲折人生道路,并追述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大背景。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在刚过去的 20 世纪,那些让人记忆的历史太多太多,但本丛书让亲历者来讲述,就多了一份真实和一份况味。在这里你可以与徐铸成、于光远、蔡元培、陈独秀、朱德、杨振宁、林语堂、蒋梦麟等名家相遇,体味历史,重温记忆。

《食无禁忌》本书的英文原名是《健康区》,讲的是如何搭配不同食物的比例,以达到激素平衡,从而进入“健康区”。美国斯坦福大学游泳队请本书作者制订菜谱,结果,1992 年一举夺得八枚奥运金牌。据作者说,他推荐的食谱以 1982 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防治心脏病和癌症大有益处。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和《新民报》

● 郑连根

—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中国报业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新民报》的创始人。在辉煌的时候《新民报》先后在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五地出版日报或晚报八种，号称“五社八报”，堪称跨地域的“大报业集团”。

不妨先从邓季惺说起。邓季惺，重庆人，出生于1907年，名友兰。她的母亲吴婉是一位知书识理的开通妇女，她认定女子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命运，就必须有知识。邓季惺的父亲邓孝然并不主张女儿去外面的学校上学，只要她念私塾。在她14岁这年，趁邓孝然不在，吴婉自作主张地让女儿投考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季惺考取了，从此远走高飞，开始了她一生的忙碌、操劳和求索。

1923年初，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等相约到南京，进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三年级。吴淑英的弟弟吴念椿在读金陵中学，两所学校都在鼓楼附近，暑假里，季惺和淑英经常到鼓楼茶座去乘凉，念椿也是这里的常客。季惺和念椿熟识起来。又过了一年，季惺去上海念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时，念椿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了。因着南京时的交往，二人已互生好感，便自由恋爱了。因为爱慕邓友兰（季惺），吴念椿遂改名为“吴竹似”，谓之“你与兰为友，我似竹高洁”。1925年底，邓季惺与吴竹似结秦晋之好，步入了婚姻殿堂。而这吴竹似，便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生父。

1926年，吴竹似受聘《大中华日报》编辑，一家人回到重庆。这期间，吴竹似结识了陈铭德并与之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陈铭德，四川长寿县人，出生于1897年。1924年秋，他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回到四川，先后在成都法政专科学校教新闻学、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大中华日报》主笔。1928年又被邀请去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做编辑。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不久，他便对刻板的工作方式和国民党钳制舆论的做法产生了不满。他认为国民党的新闻政策与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相去甚远，于是便产生了创办一份民间报纸的想法。他的想法得到了川籍同事刘正华、吴竹似的支持。随后，陈铭德辞去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的职务，再次回到四川，全力筹措创办新报事宜。

在四川，陈铭德得到了军阀刘湘的资助。刘湘资助他“启动资金”两千元大洋，以后按月支付津贴五百元大洋，同时还给陈铭德个人“活动经费”每月二百元大洋。有了这笔资金，再加上刘正华、吴竹似的支持，《新民报》于1929年的秋天创刊了。起名《新民报》，意思就是“作育新民”，向青年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同时也含有继承和发扬同盟会时期的《民报》精神的含义。报头上的“新民报”三个字，是由精于书法的吴竹似从孙中山先生的遗墨中摹写下来的，就连报纸选在9月9日这天创刊，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这个时期的《新民报》，社长是陈铭德，总编辑是吴竹似。到1930年1月，吴竹似和邓季惺的儿子敬琏出生了。可是很快，吴竹似就生病了，得的是肺结核。于是吴竹似和邓季惺北上求医。在照顾吴竹似的同时，邓季惺插班上了北平朝阳大学，学习法律。

1931年7月,吴竹似在北平去世。这对24岁的邓季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作为吴竹似的生前好友,陈铭德来到北平,想安慰一下好友的遗孀,同时提供一些帮助。他看到邓季惺并没有整日以泪洗面,而是坚韧顽强地生活着——她一面带着三个孩子,一面继续自己的学业。他感佩这个女人的力量,心底里除了敬,还渐渐地生出了爱来。随后,陈铭德于1931年8月和前妻离婚,两人恋爱了。

1933年1月24日,陈铭德和邓季惺在北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婚礼。这个婚礼也值得一写。婚礼采用了开会的形式,有一百多位亲友与会,陈、邓二人刻了一对石印:“海枯石烂永不相忘”。来宾们每人得到了一份新婚夫妇陈铭德、邓季惺署名的协议。这协议印在粉红色的卡片上,上面写明:各人用各人的姓——即邓季惺不冠以夫姓;邓季惺带来的三个孩子依旧姓吴;婚后家庭实行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邓季惺娘家和吴竹似家都略有家产,分别财产制可保证邓季惺母子四人的生活。当然,它的意义不只是明确家庭中的财产权利,更有象征意义:它表达了作为女性的邓季惺对封建传统的反叛和对女性解放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张扬。

二

1933年夏天,邓季惺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后又辞职,在南京和镇江当律师,业余时间里,则全身心地投入妇女解放事业。邓季惺和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王枫等人做起了“女权运动”实验,学开车、练打靶,开风气之先,号称要“群策群力为妇女界作一番日新月异的工作”。她们认为,妇女没有经济地位就很难有社会地位,而家务负担是妇女走出家庭的羁绊。因此,要为妇女解除后顾之忧,于是便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邓季惺自告奋勇当所长。她们还利用《新民报》开办了《新妇女周刊》,邓季惺发表了《妇女运动的时代性》、《妇女运动与家庭》等文章。

陈铭德了解妻子的才干,他早就邀请邓季惺和他一起办《新民报》。邓季惺起初惟恐加入《新民报》后会成为丈夫的附庸而不肯让步,何

况她单凭自己的力量已经获得了社会的承认。直到1937年,邓季惺才接受陈铭德之邀,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副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和财务。那么,这个时候《新民报》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

《新民报》在吴竹似去世后,1929年冬聘张友鸾任总编辑。在认真研究之后,陈铭德和张友鸾确定报纸以广大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并制定了具体的编辑方针,使《新民报》基本上定型。《新民报》初期设在南京洪武街上,发行量很小,只有2000多份,办公的房屋也十分简陋。随后几次搬迁、增加设备,到1936年春,报纸发行1.6万份,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50%。随后再次更新印刷设备,从日本读卖新闻社购得一部旧轮转机,并改换了新字模,报纸实现了轮印。这不仅提前了出报时间,而且大大地改善了印刷质量,使《新民报》成了南京报业中的佼佼者,发行量也跃升到两万份。

这个时候,邓季惺加盟了《新民报》。她一上任,就为报社的财务会计、发行、广告、印刷等业务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并监督执行。比如,财务对广告的控制。过去每天刊登广告没有登记,广告费的收取也没有严格的准则。邓季惺上任后,报纸每天刊登的广告一条一条地剪贴起来,做成一张报表,财务科就根据报表收钱。现金结算的,全部入账;拖欠的,记入债务,一个月下来,广告部门要把外债讨回来结账。发行也同样天天有报表,现金回笼是邓季惺每天都做的“功课”。

邓季惺在物资供应上也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纸张供应十分紧张,而报纸销路激增,她就派四五个人专门购买、储备纸张,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同时,战争使物价不稳,邓季惺及时把报社赚来的钱兑换成美元或黄金以防贬值。

1937年7月1日报社集资五万元依法成立了新民报股份公司,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邓季惺任经理。

可是,战争把一切秩序都打乱了。《新民报》坚持出刊到1937年11月27日,不得不迁往重庆。一个多月之后的1938年1月15日,重庆版《新民报》就问世了。

1941年11月1日《新民报》成功地策划出版了晚刊，后来达到4万份的发行量。重庆《新民报》的成功，为他们扩大经营积攒了实力。1943年，邓季惺带领一班人马去成都，相继推出晚报和日报。到抗战后期，两地的《新民报》最高日发行量达到10万份，成为后方报业之翘楚。

在大后方，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得到了四川企业家的支持，重庆、成都比较著名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几乎都投资于《新民报》。股东会连续做出增资决定：1944年5月增资为1200万元；1945年3月再增为2000万元；6月为准备胜利后在上海创刊，另组一重庆新闻公司，又集资3000万元。这时法币天天贬值，邓季惺使用所筹资金和报社积累买进黄金美钞以保值。在各次增资中，还给对报社有贡献的职工按年资和贡献大小赠予不同股份。

1945年9月18日，日本投降刚刚一个月，邓季惺就由重庆飞回南京，很快恢复了《新民报》的南京版，接着，她旋风一般地至上海、北平，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新民报》上海版、北平版的筹办事宜。这样《新民报》便发展壮大到了“五社八报”的规模，在中国的报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三

陈铭德和邓季惺两人各有特点。邓季惺是经营管理奇才，而陈铭德则长于“外交”，他兼容并包，政界、工商界、文化界都有大量的朋友，四川军阀刘湘、船王卢作孚、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等是陈铭德的朋友。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夏衍等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广泛的社会关系，使陈铭德和《新民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纯粹的民间报纸要做实事求是的报道和评论，免不了要得罪国民党当局。每当这类事件发生，陈铭德就开始动用他的各种“社会关系”，疏通关节，使《新民报》免于触礁沉没。为了报纸的生存和发展，陈铭德往往不得不四处作揖，委曲求全。对陈铭德的这种性格和行为方式，许多人有过误解，认为他缺乏理想色彩。对此，邓季惺有过解释。1989年，在一

次追思陈铭德的座谈会上，邓季惺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是1933年结婚的，到今天五十六年，超过了半个世纪。这五十六年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办《新民报》。我知道他的为人性格，也许可能比朋友们更多一些……我们俩人虽然志同道合，性格则不相同。铭德常说我这个人是个‘暖水瓶’，里头热，外面冷冰冰。他这个人，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都感到如坐春风，因此觉得他这个人不一定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我们共同生活几十年，我知道他是有坚定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追求民主自由，想用办报，通过新闻来推动社会进步，就是‘作育新民’，继承和贯彻中山先生的那一套主张。在解放前的二十年，那样一个社会，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他不能不在一定的限度内作适当的让步。……在报馆里，他去当‘外交部长’，为了《新民报》的生存，有时要对有权有势者磕头作揖。要让我来的话，我不会说话，磕头作揖更办不到《新民报》早就玉碎，不能瓦全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生活经历证明，在政治上，他没有拿办报去做敲门砖，解放前，他没有做过国民党的官，只是在解放后当过北京市社会福利局的副局长；在经济上，他没有借办报敛财，蓄积私产，至今两袖清风。……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直到现在其残余影响还未清除的社会里，办什么民间报，就必然是坎坷一生。在国民党时代，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半夜三更还常常来电话训斥责问，直到最后也未瓦全，南京《新民报》还是被封了门，还要逮捕我们送‘特刑庭’。这四十年环境比国民党时期好多了，但加给我们俩头上的两顶帽子也是够人受的。第一顶叫‘报业资本家’……第二顶就是五七年了（指右派），这一来就是二十多年，也是不好受的。所以，这四十年处境也是坎坷的。铭德选择了办民间报纸这个职业，注定了在坎坷中度过他的一生。”

邓季惺的话很感性，而王元化先生则将对陈铭德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评价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他们）与我所熟悉的现代思想家类型的人物毕竟有所区别。他们的特征毋宁说是民众的、实践的文化人品格。大致而论，前者所关怀的是历史文化的深层思想，而后者则直接介入社会实践。前者是力图站在现实之上去修正现实，去

影响历史发展方向,而后者则顺着现实的种种冲突去调和理想。前者是将文化作超越性的思考,而后者则将文化表现为时间变迁中的历程,落实为具体集团与群体的生活情境。前者是自由主义知识人,而后者是中产阶级知识人……陈铭德、邓季惺等人,在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脉络中,可列入本土民间市民社会实践者的先行队伍中。”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的。

陈铭德在办报之初,曾以四事与同人共勉:“一、传达正确消息;二、造成健全舆论;三、促进社会文化;四、救济智识贫乏。”同时还表示,“决不官报化、传单化”,不作空洞说教,只代表中国民间的声音——“为办报而办报,代民众以立言,超乎党争范围之外”。

当中国遭到日本侵略的时候《新民报》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坚决支持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报社第二天中午才得知事件真相,但是,大家还是赶出了一个号外。9月20日《新民报》的头版头条就是“日军昨晨炮轰沈阳城,实行占领。长春、营口同时被占领,我军毫无抵抗,完全缴械。”并发表社论《东北完全非我有,亡国无日,请对日宣战》。随后,对于军民的抗日活动《新民报》都给予了及时的、态度鲜明的报道。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会战前后的几个月里《新民报》更是热情高涨地连续发表社论,督促国民党政府放弃妥协退让的国策,领导全民抗战到底。这一时期的系列社论有:1月17日《请对日绝交》、1月18日《对日绝交与应有之准备》、1月20日《再论对日绝交》、1月24日《请中央速决大计》、1月31日《救国之最后一着》、2月3日《守城与守心》……这一系列社论代表民间的声音,督促国民党政府放弃妥协,全力抗战。

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消极抗战,另一方面则腐败成风。对于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新民报》也积极予以揭露。1943年3月3日,重庆《新民报》刊出了两条消息:一条是女公务员因为生活困难,要求增发平

价米,被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拒绝;一条是孔家大小姐飞赴美国结婚,随带大量的精美工艺品作嫁妆。编辑陈理源将两条消息编发在一起,并特意做了标题《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孔大小姐飞美结婚》。这两条新闻排在一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对前一条打上了“免登”的戳记,对后一条下令“删登”,即将孔大小姐随带的大量物品部分删去。《新民报》置之不顾,违检登出。《新民报》一时洛阳纸贵,大受欢迎。可是,陈铭德却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新民报》面临着被查封的危险。

陈铭德四处奔走,最后,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终于发话了:“只要孔副院长认为不是问题,我们就可以放行。”孔副院长当然不会认为“不是问题”。结果,先是由“官方”拟定了两个更正,交《新民报》发表。关于《孔大小姐飞美结婚》的更正以“本报讯”的形式刊出,说:孔大小姐飞美是将入彼邦大学深造,对结婚一事避而不谈。随身所带的物品,则是为蒋夫人带去的,用以赠彼邦友人以答谢其招待之谊。由中国航空公司飞机运去的东西,则是因为孔副院长和夫人与美国朝野人士颇多故旧,以女公子赴美之便,略备若干中国土产,藉作中美订平等条约之纪念品。外传系属嫁妆,实出误会。关于《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的更正则由行政院秘书处函致《新民报》,称:“贵报所载一节,词意与事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实颇有出入,恐滋误会,特函奉达,即希查照刊布,以正视听为荷。”两则“更正”刊出后,陈铭德还得再托人向孔祥熙疏通,并当面向其致歉。最后,孔祥熙表示:“我孔门以恕道传家,先父在世之日,每常以此教诲祥熙《新民报》上所载,自可不必计较。但祥熙身负党国重任,报章如有涉及,最好稍加斟酌,因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们那位编辑,既然年岁太轻,少不更事,希望陈先生和报社对他多加教导,以后不可造次。”

其实,孔大小姐飞美结婚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陈铭德“代民众以立言”的新闻理想几乎无处不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及当时黑暗的现实相抵触。作为新闻实践者,在坚硬的现实面前,陈铭德不得不一次次地与现实达成妥协,小心翼翼地周旋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如履薄冰地寻找着自己的理想与冰冷的现实之间的契合点,“顺着现实的种种冲突去调和理想”。

四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在南京版日刊的复刊词中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民间立场:“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决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我们在政治斗争极端尖锐化的情况下,精神上时时感受到一种左右不讨好的威胁。但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统一、反对分裂。”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发表了那首有名的词《沁园春·雪》,首次刊发的报纸就是《新民报》。这首词是经柳亚子、王昆仑、郁风、黄苗子之手辗转至吴祖光,由时任《新民报》编辑的吴祖光编发的。

1948年6月17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开封,国民党军队仓皇败退,溃退之际在城市纵火,随后国民党的“东海”、“黄海”、“渤海”三个机群对开封城轮番轰炸,致使开封市民死伤无数。此时正赶上立法院开会,何应钦在6月24日的秘密会议上作了检讨中原战局的报告,立法委员们群起质疑。邓季惺当即提出了临时动议:“空军

对开封盲目轰炸,人民损失惨重,责任谁负?应予追究!今后应严禁轰炸城市。”这份临时动议由三十多名立法委员联合签名,何应钦不得不再次到会接受质询,解释说:“开封兵力不足,官兵待遇低,所以不得不出动空军,轰炸中发生误伤在所难免……”

第二天,南京《新民报》就报道了立法委员们对轰炸开封的质询及何应钦对战局的检讨。此事一下子戳在了蒋介石的心上,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对南京《新民报》做出了永久停刊的决定。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版被停刊,重庆版遭严重迫害;成都版被查封,各地编辑、记者和其他从业人员相继被捕被杀和逃亡,邓季惺也不得不亡命香港。直到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之后,还是对邓季惺发布了“通缉令”。

陈铭德1989年2月病逝,享年92岁。六年以后,邓季惺辞世,享年88岁。

(责任编辑 吴思)

希望老人们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周恩来

《中华老年光彩人生》(第三卷)

继续征稿

由中国老教授协会、北京五洲华夏文化研究院等联合编纂的《中华老年光彩人生》,是一套生动记录系广大老年朋友闪光足迹的大型纪实文库,已连续出版两卷。该书以回忆录的方式深入反映各界老同志难忘的人生经历和深刻人生感悟,将作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流传给子孙后代。第三卷正全面征稿,欢迎写稿,并希望推荐亲友撰稿参与。

● 征稿范围:难忘经历、峥嵘岁月,怀念父母、献给爱人、纪念亲友、师长,创业历程、老有所为,康寿之道、人生感悟等。

● 文稿体裁:人物通讯、回忆录、散文、诗歌、略传等。

● 撰稿要求:根据征稿范围任选一项,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自拟题目,深入描写。内容事迹要求主题鲜明、真实生动,有代表性。篇幅控制在2000字左右,并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

● 截稿日期:2005年5月20日,需适当延期者请电话联系。

来稿请寄:北京西客站邮局100055—1041信箱 征文办

联系人:张先超 邮编:100055

电话:(010)66808499 51606990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 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

● 王人广

读了《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刊登的王辅一、李维民所写《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王李文》)一文,了解了有关皖南事变的一些情况,学到了不少东西。但笔者对文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说“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从大局出发,根据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也是中央一贯的方针”的观点,不敢苟同。

现提出不同看法,并请教于《王李文》作者。

1937年12月30日电报不能作为“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的根据

《王李文》提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主要根据是,1937年12月30日张闻天、康生、陈云、毛泽东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笔者仔细阅读了这封电报后认为,将这封电报的内容作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的主要根据是错误的。现将此电报全文公诸于下,供广大读者研究:

陈、周、项、博、叶同志:

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

甲、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

(一)苏浙皖赣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

(二)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商、固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

敌。

以上两区是主要的。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各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于其中。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

(三)浙南军区。攻击占领杭甬路及浙赣路之敌。

(四)鄂赣军区。准备攻击占领沿江及南浔路之敌。

(五)汉水军区。准备攻击占领平汉南段之敌。

(六)豫西军区。准备攻击平汉中段之敌。

乙、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箝制作用,须建立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并指挥鲁东游击战争。此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此区与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

以上意见,请考虑后向蒋提议。

洛、康、陈、毛 十二月三十日

十分明显,这封电报是张闻天、康生、陈云和毛泽东提出的在日军进攻武汉时,中国军队在长江南北的作战部署的意见,请陈、周、项、博、叶考虑后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专对新四军的战略部署。

从电报时间看,这时(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刚刚占领南京,尚无进攻武汉的作战行动。新四军军部刚刚在武汉成立,尚未到达南昌。分散在各省的游击队尚在原地准备集中改编。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怎么能够担负起电文中所说的那么大的战略任务呢?

电文中所提“我军”是泛指中国军队,并不

单指新四军。《王李文》中说：“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制定了‘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对我苏、浙、皖、赣边部队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将第四支队即高敬亭支队设在皖中，是根据中央的这一部署确定的。”这些阐述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这封电报不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只是洛、康、陈、毛向国民党当局的一个建议。其次，电文中的“苏浙皖赣军区，以皖南为重心”并不是对新四军的部署，而是泛指中国军队。《王李文》将此内容说成是“对我苏浙皖赣边部队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是不对的。再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是以陈部在皖南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电文中并无“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的内容与含义。

向敌后发展是中共中央一贯的对新四军战略方针的指示

1937年12月14日，毛泽东和项英（当时在延安）致电叶挺，指出：“长江以南各支队（共六个不是五个）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

这是中央对新四军战略方向最早的一个指示。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但在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1938年4月底，新四军各部大体在皖南、皖北集中完毕。4月29日，项英关于部队行动问题请示中央。5月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

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指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立。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因此，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6月2日，毛泽东再电项英，指出：“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以上各电，是中共中央对新四军战略方针的完整的指示。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决定。1939年4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了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后，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决议作出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仍遵照中央原来决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在江北组织队伍和政权。”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北新四军应猛烈向东发展的指示中，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又作出指示，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关于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致项英、

叶挺电：“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综上所述，可看出，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中共中央一贯的指示是向敌后发展，在敌后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如果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率主力一、二、三支队进入敌后，首先进入苏南，并分兵向江北发展，就不会出现后来皖南事变那种情况。而项英却将军部和第三支队留在皖南，孕育了以后惨遭损失的后果。

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日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力促皖南军部和部队转移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用所有这一切办法去巩固自己的阵地，击破大资产阶级的阴谋，争取时局好转，争取继续抗战，并准备在时局逆转时足以应付一切。”这时，新四军军部已经不是继续留驻皖南，而是如何转移离开皖南的问题了。12月23日，项英致中央及军委电报告皖南情况：“目前除政治进攻、团结中间力量外，在军事上扩大力量，坚持和充实力量十分重要了。以江南（应为皖南——笔者注）情形，受限制最大者为经济筹款极难……因江南（1）无政权，政权完全是磨擦专家，保甲长多系国民党。（2）受国民党军队包围与敌情关系，向外扩张困难，就地筹款因政权均在他手，募捐很少，一时慰劳收入不多。”江南如发生事变，江南地区不利，非转移他处不可。非战斗不能打开局面，冲破包围非有相当力量不可，否则分散游击，无论政治、军事上不能展开局面。”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在华中为新四军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皖南军部及部队是否已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4月9日，项英复电毛泽东说：“对袭击已有相当准备，可能冲出。当时混乱，但工作人员众多，损失不可

免。”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皖南部队转移苏南。23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皖南部队向苏南靠拢。皖南留一个团可作战略协同。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在局势严重恶化的时刻，中共中央认为项英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于5月4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指示》（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载《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支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问题给项英的电报指示

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项英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以后,一方面表示执行中央的指示,另一方面强调军部及皖南部队转移困难。5月28日,项英、袁国平致电中共中央,表示东移朗溪区域,与苏南打成一片;皖南仍留一个团(第五团)在铜繁地区;第一团(傅)、第三团(王)随同军部到胡溪营工作。”29日再电中央:“军部先率两团移苏南,直属队陆续移。”但在6月12日,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军部移动已停滞。如自加移动,因由皖南至苏南中间地区在两河之间,彼方军队已布置,须两日半行程方能通过。加以这段地区地方工作最差,很可能为彼方借词进攻。这一带作战极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7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等,指出:“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8月17日,项英再致电中共中央:“据上饶谈判结果,暂不可能取得合法东移。目前的布置和计划,应依目前情况,皖南部队仍坚持原有阵地,准备独立斗争。”这样,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丧失了转移时机,并使自己陷入受袭击的危险境地。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转移苏南的指示是十分明确的。《王李文》引用中共中央11月1日复电项英皖南部队两条出路的内容,说:“这个电报距皖事变只有两个月,这时中央尚未明确项英及皖南部队是否全部北移江北。”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不等于新四军军部必须设在皖南

《王李文》强调:“皖南是我党我军在南方的战略支点,是当时全国抗日斗争的前哨之一。”皖南战略地位究竟有多么重要,尚值得研

究。即使重要到如王、李强调的那样,也不等于新四军军部必须设在皖南。

关于战略支点。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10月1日关于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电中曾提到:“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10月8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对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的建议中也提到:“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应坚决保持其为战略支点,是绝对必要的。”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总部、前方各师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电报中提出:“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这是设想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前两电中作为战略支点的区域显然没有皖南(它不是红军游击区),后电中提到的是整个中国抗战的战略支点,每一点都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不是小点。皖南即便是我党我军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也不等于说新四军军部必须设在此处。正如中共中央一再指出的,新四军的战略方向是敌后,而不是皖南。按照军事作战的要求,军部应设在敌后便于指挥部队主力的地方。至于《王李文》中提到的:“同意部队向皖南集中。”新四军发展方针中规定“向南巩固”明确要坚持皖南等说法,也不能作为军部设在皖南的理由。

关于皖南的战略地位。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地和活动区域,处于繁昌、铜陵和泾县之间(不是全部皖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它北临长江,东、南、西三面均为国民党军队防区。军部设在这里,既脱离了深入敌后的主力部队,也无法在本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在此情况下,皖南作为新四军坚持抗战的一个点,留部队一部坚持斗争是可以的,而军部长期设在这里则是很不利的。《王李文》说皖南“是当时全国抗日斗争的前哨之一”。如指的是安徽省整个南部地区是可以的,而如果指的是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活动的那个地点,则是十分勉强的。即使是前哨阵地之一,新四军以一部活动在这里也足够了。

(责任编辑 吴思)

《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 中部分史实核正

● 赵懋家

刊登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上的《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的文章,追忆朱总和周总理与侯方岳同志谈论范石生的种种情况,该文中有关段落涉及先父赵薪传(字贯一)和世交马曜教授(2003年访谈时93岁,白族,原云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健在)。据我所知:有的记述是不准确的。为了澄清史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并专门拜访了马曜教授,作了核实。现将史实情况记述如下:

一、《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文章中写道:周公(指周恩来总理)又对我说:“范为何不起义呢?这不怪范公,而怪我党干部不力,未做好基层工作,如马曜等在范军活动六年,而不深入团、营、连做基层工作”。姑且不问周总理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是否会这样评价十六军的共产党员(包括牺牲的许多烈士),仅提供如下史料供剖析判断:

第一,当时广州“新滇社”的负责人之一冯素陶(原山西人大主任,现已离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各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后,我们对范有一个新的期望,利用他和蒋介石的矛盾,策动他联共反蒋。当时国民党在两广兵力薄弱,驻粤各军及桂系主力皆已进到长江流域,驻广州的李福林部是土匪队伍,没有战斗力,兵员也不足,这是一个夺取两广的有利条件。我们认为,打唐继尧是理直气壮颇得人心的事。现在形势变了,唐继尧已倒台,龙云等已改换了旗帜,并获得国民政府的任命。如再打回云南,不但师出无名,

在政治上亦处于不利地位,军事上亦无把握。劝范石生放弃打回云南的计划,联共反蒋夺取两广。当时广西右江一带有韦拔群、张云逸、邓小平等(张、邓部发展可能在稍后)领导的红色武装可以联合,广西得手后继续进广东,依靠共产党发动群众,两广形势可以大变,前途大有希望。范石生表示要好好考虑,范回部队后,新滇社把配合地下党继续策动范石生的任务交给在十六军政治部工作的赵贯一(即赵薪传,十六军新滇社负责人——引者注)。后来赵贯一到广州东山龟岗二十号新滇社地下机关向我汇报范石生对起义的态度。说范对此毫无信心,他对蒋介石虽有矛盾,对国民党尚有幻想。他胸无大志,对我们意见不能同意,但希望新滇社员继续帮助他做政治工作。

冯素陶还写道:“赵贯一是以共产党员身份找朱德同志汇报范军情况的,曾在王楷团住过,他了解这段经过。这段经过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赵贯一曾对我说过(指朱德、陈毅部队在范石生部队情况——引者注),以后长期未曾看到记述这段经过的记载。近年来才看到两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与朱总司令有关的文章,中间写了化名王楷到范军的经过,与赵贯一当年告我的内容基本相同。(详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冯素陶回忆录》)

冯素陶的上述回忆中写明了:

- 1、策动范石生起义时的形势、原因和经过。
- 2、经多次劝说范石生仍不同意起义。
- 3、当时十六军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薪传(即赵贯一)曾劝说过范石生起义。

第二,先父赵薪传策动范石生起义的一些

情况。

当我父亲赵薪传看到冯素陶写的上述回忆时,曾对我说:冯素陶所写的是事实,他还准备详细写一篇这方面的回忆,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加之父亲当时年迈(85岁)体弱多病,精力不济,未能动笔,现仅就我平时问及父亲有关范石生为何不起义的情况简述如下:

父亲赵薪传曾对我说:“他当时是范石生十六军的宣传科科长兼宣传总队队长,又是云南人,利用可随时接近范石生之便,多次向范石生劝说,分析起义的有利条件,起义成功的可能性。但范石生对他(赵薪传)说:“你是新滇社派来的,是老乡,我猜想你还是共产党。你知道我对孙中山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十六军为平定沈鸿英的背叛及陈炯明的反攻打过了许多仗,而现在(指在广西旧州平马驻军时)所余官兵四千余人,力量单薄。我感谢你们新滇社派人来十六军工作,要我打起红旗闹革命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你们新滇社继续多派人来帮助我,不要走。”(这是范石生与先父赵薪传多次谈话的大意)

我父亲说:“范石生是位很重交情讲义气的人,当朱总司令起义部队转移湘南后,曾去信向范公求援,范石生马上就派上校参谋长敬容去与朱德联系,朱总带部队到范部时约700人,着装破烂、饥寒交迫,弹尽粮绝,处境极度困难,因朱总与范石生有金兰之交,又是同窗好友,所以鼎力相助。”我父亲赵薪传是以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身份,主动与朱总取得联系,汇报情况,提供情报,为革命部队补充装备、军饷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朱总还告诉我父亲:“原想试探范石生有没有进一步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但范石生说:‘打起红旗闹革命我不能,现在你们有困难我要在力所能及处从旁给予帮助。你放心在我这里休整,休息好了,什么时候要走我不留。’”

这就是冯素陶在书中所说“四十年前赵贯一曾对我说过”的真实情况。他在《回忆录》中也是这样写的。

二、《追述》文章中还写道(第14页):“朱德回国后,他通过周恩来通知王德三(范石生部队中之中共负责人)转告范石生到上海同他见面,范见到朱德后,希望朱德到他的部队当军

长,自己退后,朱德谦辞,范又要求朱德任参谋长,朱德说:周恩来、胡汉民、蒋介石已商量决定,派我去四川万县杨森部队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劝说杨森与吴佩孚决裂,支持国民北伐军进攻湘鄂,任务艰巨,你军里周恩来、王德三已派有一批人来,不管他们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朱德还说我不在你部胜似在你部。”这段描述也是失实的。

第一,需要更正的史实是:当时十六军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是先父赵薪传而非王德三。王德三同志根本没有在过十六军。证明是:1990年2月8日,杨成武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为悼念原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朱良才上将的文章中写道:“1927年大革命后,良才同志被捕入狱,敌人给他戴镣铐,施以重刑,欲加杀害,后得我党负责人赵薪传同志营救才幸免于难。”

据我了解,此段历史是摘自朱良才将军档案记载,在《将军传》第十辑中,朱良才传记中都有同样记载,《朱德传》中亦有记载。请注意发生时间是1926年。

第二《追述》文章说:“你军里周恩来、王德三已派有一批人来,不管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

先父赵薪传生前在《国民革命第十六军建党的前后情况》文章中是这样记载的(该文发表在《云南史志》特刊2000年第四期总100期上):“在组织军党过程中,范石生驻广州代表杜韩甫与新滇社负责人王德三(当时任黄埔军校教官)通过周恩来(当时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总教官、华南领导人)及总政治部副主任孙炳文,决定派余少杰、书义光、王振甲、夏宗先、向镇弼、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胡兆祥、张镜清、罗灵、赵薪传等十二名共产党员到十六军”,这段史实证明:

1、王德三没有被派往十六军,赵薪传是当时地下党负责人,而非王德三;

2、也没有《追述》中所说“国民党左派青年”,十二名全是共产党员;

3、1926年在党内没有人通知过范石生到上海会晤朱总。

本文望能刊登,以正视听。

(责任编辑 致中)

何思源在山东抗日

● 王秉默

何思源先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前,他是山东省教育厅长,办的是求生教育、抗日教育;抗战中,他是鲁北行署主任、鲁北游击总指挥;抗日战争后期,他是山东省政府主席。

致力十年求生教育

1896年何思源出生于山东,1915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他参加了五四运动。他用7年时间先后在美国、德国、法国留学,认定教育是救国的最有效途径。

1928年何思源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随北伐军打到济南。5月16日,国民政府任命何思源为山东省教育厅长。截止到抗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在山东省教育厅长这个职位上他整整干了十年。十年中他贯彻的是求生教育。他认为,人们在任何方面的活动都是为了求生,因此,一反“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他强调“教育是为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能力,教育的目的是求生”,并以行政力量将这种理念推行到全省。他把反日爱国教育看成是山东人民的生命,上任伊始就主持制订了《学生问答手册》,要求所有的学校在每天早晨升旗后举行学生相互问答。通过问答了解日本是什么样的国家,共有多大面积,有多少人口,历来侵略中国的野蛮行为,特别是“五三”在济南的大屠杀。

八年敌后游击打得鬼子心胆寒

抗日战争来临的时候,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

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本应随政府机构一起撤到大后方,但他没有走,选择了留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身为一个军人,号令着庞大的第三集团军,本应履行守土抗战的职责,但大敌当前,他扔下山东的父老,仓皇地一退再退。

在长期的抗日准备下,何思源拥有受过十年求生教育、抗日教育的山东民众。他清楚日军在山东占据了几条铁路线上的一些城市,距铁路十几里的县城仍由中国人控制,几乎在敌后各地方都有地方部队进行抗战,这些部队势力有大有小,性质也不一样,彼此常为争夺地盘和给养发生矛盾冲突,但在民族大义上是一致的,因此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他成竹在胸。许多地方武装的领导何思源都认识,有些人就是他训练出来的学生,因此,他拥有一支坚持抗战的骨干队伍。有了这些基础,何思源只要驾驭有方,指挥得当,就可以迅速发展抗日的有生力量,坚持敌后抗战。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黄河北岸,在鹤山向济南市打炮。韩复榘下令省政府各机关撤往宁阳,孙桐萱放火烧了省政府、日本领事馆和济南的一些重要建筑。炮火声中,撤离的人群争先恐后一片混乱。坚定而沉着的何思源组织起省教育厅的干部,分组带队,沿途设站,指导和帮助逃难的老百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期间,平津的学生及文化界人士,纷纷流亡南下,何思源在潍县收容一部分青年,举办抗日骨干训练班。1938年,韩复榘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因影响士气、民心而被国民政府正法,而外表文弱的何思源以省教育厅长的资格肩负起鲁北

行署主任和鲁北游击指挥的重担。

此时,省政府所在地鲁南地区,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于学忠的两个军、吴化文和刘桂堂的两个师,而何思源管辖的4个专区27个县,一个黄河三角洲垦区,自济南直到渤海湾,完全没有正规军。何思源带着省教育厅十余名青年干部,一路收容教育局长、校长等人,然后以这些文人为骨干组织游击队,收编绿林土匪,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发展迅速,很快组成5个旅,10个团,20多个县大队。在敌后何思源建立了有力的行政系统,流通着鲁北银行的钞票,出版发行《鲁北日报》,自造武器弹药,组织培训了军政干部,甚至还开辟了邮路。这样有条不紊地发展,卓有成效地稳定了人心。

何思源对游击队干部不断进行培训,训练宗旨是:“把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的思想植根于每个人心中,我们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做到,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爱国心,就有中国的抗战力量,就有中国的政权存在。”游击队当时的口号是:今天打不着敌人,明天打;正面打不着敌人,侧面打;白天打不着敌人,夜里打。这些简明透彻的道理,灵活机动的战术,保障了鲁北抗日游击的有力展开,迫使敌人不得不多建碉堡、据点,派兵护路。

在鲁北,人们对何思源充满爱戴和尊敬。“老厅长”三个字成为人们对何思源的专称,妇孺皆知。爱屋及乌,凡是何思源手下省教育厅的

人,即使是在土匪、伪军占领的地区也可以通行无阻。日本人则恨透了何思源,曾动员山东、河北兵力几千人,几百辆汽车,分几路大举扫荡鲁北。所有日军都带着何思源的照片,恨不能很快抓住何思源,将他处死。但是处处有中国人,处处是中国心。日本人有时与何思源当面走过,也没能认出他,抓住他。几年里,何思源带领游击队东奔西跑,转战鲁北平原,经历了日寇的讨伐、扫荡、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在山东人民的保护下他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用智慧战胜敌人保护亲人

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是法国人,育有四个子女。抗战期间为支持何思源抗日,深明大义的她独自带孩子住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1942年,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抓不住何思源,竟通过意大利租界劫持何夫人和孩子做人质。这时,最小的女儿何鲁美才6岁,最大的儿子何理路也才只有12岁。他们威胁何思源:如肯投降,南京的部长,山东的省长任他选,否则就处死他的全家。更为毒辣的是他们扬言要派军队包围何思源的驻地,把他的妻儿绑赴进攻的日军之前。

得知日本人掳去妻子儿女后,何思源心急如焚、悲愤莫名。何思源是有血有肉的人,多少次在战斗的间隙中,他向战友展示孩子们的照片,述说孩子们的一颦一笑。但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决不向敌人示弱。他所掌握的知识使他异常准确地判断:此事虽是日本人所为,但意大利也参与其事。而何宜文是法国人,法国政府决不会袖手旁观,这就牵涉到中、日、意、法四国,况且国际公法有禁止用妇女、儿童作人质的规定。知识就是智慧,他决定:此事得闹大,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形成国际纠纷,让日本人有所顾忌,才不敢轻易地下毒



1928年5月8日,日军用重炮轰击济南城,图为被日军炮火击毁的顺城街

手。何思源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留给夫人何宜文的,一封是给鲁北地方武装将领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决不屈服,抗日到底的决心。目的是表明态度稳住军心民心。然后,他一面电告国民政府,要求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抗议意大利政府为虎作伥,把自己租界中的良民引渡给别国政府。一面派得力的人士分赴天津、北平、南京、重庆等地积极活动,向报馆、教会、团体、学校、慈善机构及各国领事揭露此事,广造舆论。指斥日军不顾国际公约,在战争中以妇女儿童作人质的暴行,严正声明意大利租界当局参与了这一暴行,负有严重责任。何思源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鲁北各地的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都逮捕集中在一个秘密地点软禁起来。他提出如果自己的家属被害,所扣押的意大利人也将没有人身安全保障。

他的行动很快就见效了,在天津的意大利教会曾受过何思源的帮助,他们首先埋怨意租界当局不该为虎作伥帮助日本人抓何夫人和孩子。南京方面的意大利大使也着了慌,怕何思源真地蛮干,立即去找日军总司令。有些大汉奸也批评日本人:“这一手太不高明!”重庆方面指定外交部的王宠惠与法国政府、意大利政府商量,由意大利政府出面要回人质。

日本侵略者人质在手,一面用飞机散发劝降何思源的传单,妄图涣散瓦解鲁北军民的抗日决心。一面派人送劝降信给何思源,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一身戎装日本宪兵队长小林爱男站在柔弱的何夫人和幼小的孩子们身后,犹如豺狼炫耀到手的羔羊。何思源没有拆信看,在一次为抗日阵亡的张营长举行追悼的大会上,他当着全体军民面把日军的来信举给大家看,他说:“日本鬼子想让我去当他们的省长、部长,是瞎了眼!真无耻!这封信我没拆,更不屑看。”说着就当众把信给撕得粉碎。他接着说:“大家放心,日本鬼子动不了我一根毫毛,我的家眷是日本鬼子从意大利租界抓走的,我向意大利要人!我们坚决抗战到底,如果有人胡说八道,就以汉奸治罪!”最后何思源坚定地说:“他们还送来一张照片,我留下作证,将来拿住日本宪兵,好对照治罪。”

何思源在鲁北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但地方武装服从他,人民群众拥护他,就连伪军都暗中



何思源 1896—1982)

为他工作。日本鬼子把何夫人和孩子们押到山东交一个姓丁的伪军头目负责看守。姓丁的伪军一面想方设法为何夫人和孩子们改善条件,一面随时向何思源汇报。何思源通过这个伪军,让自己的老勤务兵张宪五装成伪军前去照顾何宜文母子的生活。一次日军以何夫人为饵,押着她到何思源经常活动的地方,妄图引何思源上钩。何思源将计就计,当天晚上,让姓丁的伪军请日军去喝酒,自己与何夫人见面并谈了情况和措施,然后秘密地离开。愚蠢的敌人带着何夫人转了三天,一无所获。

人质事件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对日军卑鄙行为的指责,给日军高层造成很大压力。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给山东省日军司令土桥下令,限期在1月26日前把何夫人和孩子们送回天津原地。何思源又一次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在抗战中何思源历尽磨难,但他从不退缩。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残酷的阶段。此时,山东境内已经完全没有国民党正规军了,山东省政府撤到了阜阳。而11月何思源在重庆接受了国民政府任命,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再次只身深入山东,承担起收拾山东残局的重任。(责任编辑 吴 思)

杨伯涛会战雪峰山

● 蒋国经

杨伯涛 地道的侗家农民子弟。1909 年出生于湖南省芷江县 ,16 岁参加北伐 ,19 岁在国民革命军当排长。往后转战南北 ,英勇善战 ,战功显赫 ,尤其在著名的湘西 “雪峰山战役”中出奇制胜 ,打败横行一时的日寇 ,成为抗日名将 ,更受蒋介石的器重 ,成为蒋介石嫡系第十八军军长(少将军衔)。他正值官运亨通之时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俘 ,于 1959 年第一批获特赦 ,又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关爱和三次接见 ,并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1944 年 ,中国军队在湖南芷江开辟了一座大型机场 ,进驻中、美混合空军一个团 ,肩负着对侵略日军的战略攻击。除了对日军军事目标进行攻击轰炸外 ,尤其是远程轰炸机 B-29 ,即 “空中堡垒”的轰炸 ,致使气焰极为嚣张的日军在湘桂、粤汉两铁路线陷于瘫痪 ;导致整个长江航运不能畅通。日本侵略军深受威胁 ,视芷江飞机场为其心腹大患 ,认为必须尽快捣毁飞机场 ,方能确保东南半壁的水陆交通 ,同时企图破坏中国军队积极调整装备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日军为了夺取芷江飞机场 ,于 1945 年 5 月初发动了湘西雪峰山战役。此时 ,杨伯涛任第十八军十一师师长 ,第十八军原属第六战区战斗序列 ,担任着常德、桃源、汉寿、津澧等地的守备任务 ,不归王耀武第四方面军序列。因日军攻击至雪峰山附近 ,战况十分紧急 ,何应钦决定将第十八军调离常德地区到沅陵、辰溪集结 ,为何应钦直接指挥 ,随时投入战斗。

战前的日中双方军事态势是 :

日军方面 :日军自 1945 年 3 月起开始调集部队 ,进行会战的多种准备。这次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是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郎。所属部队计有 :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田银之助 ;第四十七师团师团长长渡边长 ;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伴健雄 ;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提三树男 ;第六十四师团一部及

独立八十六旅团。另附特种部队 ,总兵力有 20 余万人。

中国军队方面 :担任湘西沅水以南地区及芷江飞机场的全面守备是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辖第 73 军军长韩浚 ,第 74 军军长施中诚 ,第 100 军军长李天霞。

这次会战的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是何应钦 ,何应钦原驻昆明 ,由于战况紧急 ,他把前方指挥所设在安江 ,亲临前线指挥。1945 年 3 月下旬 ,日军进攻部队均按照预定部署进入位置 ,4 月向中国军队开始攻击 ,遭到中国军队大纵深既设阵地节节阻击。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代价 ,每每为争夺一个要点 ,都是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战而几易其手。致使日军前进非常迟缓 ,于 5 月下旬到达湘西雪峰山主阵地前沿 ,日寇的兵员粮弹大量消耗。此时 ,中国军队指挥部觐知日军已全部进入战场 ,攻势即将到达顶峰 ,于是采取极为灵活的部署 ,决心使用新锐兵团转移攻势以歼灭当面敌军。命令在黔桂边区汤恩伯第三方面军所属牟廷芳第四十九军 ,由城步、绥宁快速前进 ,向武冈西北与施中诚第七十四军对战之敌军的左侧背展开攻击 ,经过激战 ,该军逐步进展到武冈、瓦屋塘之线。日军受到左侧背的压力 ,迫不得已暂停对雪峰山的正面进攻。七十四军也乘机转守为攻 ,协同第九十四军围歼当面之敌 ,致使日军左侧背受到严重威胁。命令杨伯涛所属的胡璉第十八军迅速向沅陵、辰溪地区集结 ,听候授予任务。军长胡璉命令全副美械装备的杨伯涛第十一师为先头部队 ,第一一八师随后跟进 ,第十八师殿后。以日行军 40 余公里的速度进发。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与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 ,原定的作战计划是 :

拟待日军攻势顿挫时 ,将未经战斗的新锐第十八军 ,使用于雪峰山正面阵地 ,居高临下向敌转

移攻势,予敌以粉碎性的打击,一举解决整个战局。后经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及其他人建议:“日军主力部队使用在雪峰山下面,企图直驱芷江,而其两翼则是助攻掩护部队,兵力较为薄弱。这时日军下面主力部队攻势受挫,虽有损失,但基本上仍保持强大兵力。中国军队如由下面阵地出击,适攬其锋,针锋相对,难操必胜。不如向敌侧面薄弱部分出击,较有把握。”最后采纳这个作战方案,改变原定计划,决定以第十八军由溆浦、新化方面南下,向日军右侧后方之邵阳、隆回、洞口以北展开攻击,直蹙日军后方要点,斩断前线日军与邵阳的联系,形成包围态势。当时第十八军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已通过辰溪、花桥、怀化到达安江附近,计划改变,立刻掉头向溆浦前进;第一一八师向溆浦以东前进;十八师向新化前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派其参谋长邱维达进驻溆浦,与十八军联系。

杨伯涛第十一师通过溆浦后,即以战斗态势搜索前进,预定第一攻击目标,指向敌右侧交通要道山门镇。第二攻击目标,指向敌主要交通线邵阳至洞口公路线。前锋前进至山门以北之马头骨附近,即遭遇日军迎面阻击,正激战间,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团)和一个辎重联队,经山门向龙潭方向前线之敌增援补给。其步兵联队企图增援马头骨之敌。杨伯涛师乘敌运动之际,迅速肃清当面少数之敌,将锋芒转向这个联队。

经整日战斗将该联队大部歼灭,缴获山炮两门、步枪多支,生俘日军60余名,胜利结束这场激战。随杨伯涛十一师的美军官兵听到俘虏了日军,都好奇地去观看,其中一少尉军官手持卡宾枪,欲将一名俘虏枪毙以泄愤,被杨伯涛阻止。在缴获用品中有一箱装有日本国钞票,美军竟以美钞兑换,日军小太阳旗亦争抢手中,作为他们参战的光荣纪念品。

次日,该师乘胜向山门

要点进攻。山门是一隘口,当东西要道,为日军第一线补给中继站,有日军防守,和杨伯涛师打响后兵力续有增加。杨伯涛指挥部队从山门东北地形比较隐蔽方面迂回攻击,在十一师两面攻击下,敌人向南溃逃。杨伯涛即刻命副师长王元直指挥一个团追击,敌辎重部队负载臃肿,在山地行动迟滞。王副师长抓住日军这一弱点,分兵截击,又全歼敌辎重联队,缴获日产大洋马300余匹及其他武器辎重。杨伯涛十一师于5月12日克复山门要地,日军右翼侧背阵地开放一大缺口,后方交通补给顿时闭塞。日军雪峰山前线部队,立即抽集兵力反扑,企图夺回山门。杨伯涛指挥部队在山门北面高地占领侧面阵地,组织火网控制东西道路。当日军向杨伯涛师阵地进攻时,摸不着十一师主阵地所在,向山门盲目射击一阵,即贸然前进。这时,杨伯涛一声令下,枪炮齐吼,日军毫无还手之力。其先头部队被歼灭过半,后续部队只得翻山越岭,觅路逃窜。

为彻底截断日军后方交通,协同友军全歼整个日军,杨伯涛命令部队继续向南攻击前进,以实现第二个攻击目标,截断邵阳至洞口间公路。这时日军在雪峰山前线攻击部队,由于形势不利,已开始向东后撤,部队猬集唯一交通线洞口至邵阳公



1985年杨伯涛(右三)回芷江与亲友合影

路两侧,每一山头和村庄都有日军占据。杨伯涛第十一师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由于第十一师全是美械装备,火力较日军已占优势。加之中美混合团的空军,积极协同作战,美军联络官司乐中校携带的陆空联络电台,随杨伯涛身边行动,在战场呼叫飞机驾驶员,指示射击和轰炸目标,纠正驾驶员的飞行方向与角度,准确地命中目标,使敌遭受重创。而日军的飞机则雉伏不出,只拂晓时一刹那间,以单机低空飞行,从杨伯涛师阵地上一掠而过,根本不起威胁作用。

杨伯涛师这次作战和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作战在战场上同日军相遇时,都需极力隐蔽身体,秘密窥伺日军行动,如不小心隐蔽,一经日军发现,就会招致日军炮空军轰击。当杨伯涛带领师部指挥人员和美军联络官司乐中校一伙,大批人马,到第一线侦察敌情和地形时,发现小河对岸700米处,也有刚刚到来的十几个日军,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似乎也是在侦察情况。敌人发现十一师后,就钻入森林里掩蔽起来。十一师的官兵目睹窘态,都哈哈大笑起来,从从容容,部署部队向日军进攻。日军在各方面丧失优势后,主动活跃在战场的不是日军而是杨伯涛的军队。

在飞机的掩护下,杨伯涛第十一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展开向公路要点石下江市攻击。这里日军工事不甚坚固,被十一师一举攻占。占据石下江,就完全截断日军赖以补给运输的唯一交通线,形成对日军的四面包围。十一师左翼的第一一八师亦已越六都寨前进到荷香桥附近,向邵阳前进途中,被日军顽固阻击,进展特别艰难。

南面战场,第三方面军的第九十四军,经过激烈战斗,击破武冈、新宁之日军,日军向东溃退,九十四军衔尾追击,封锁了南部战场。

据守雪峰山东麓的第七十四军、第一〇〇军,不失时机全线发动反攻。将士们不顾长期苦战疲劳,奋勇咬住敌人毫不放松。日军在包围圈内越来越紧缩,濒临绝境。杨伯涛判断,第十一师占领石下江,卡住日军咽喉。日军处在严峻关头,势必竭尽全力,打开一条血路,拿出武士道精神,与十一师将士们格斗到底,同归于尽。第十一师凭着旺盛的士气和精锐的武器,自开战以来,左冲右突,进展顺利。杨伯涛清醒估计到敌军的顽固性。敌人如拼死反噬,十一师将士们也会吃苦头,甚至转

为败局。因此杨伯涛决心应付日军的突围大战,避免因胜利冲昏头脑,掉以轻心,贻误大局。决定以师主力面对由雪峰山涌来的日军,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加强封锁、迎击突围之敌;另以一个团有力一部,占领石下江市一座坚固建筑,卡住公路闭塞交通,成为阵地锁匙。该团主力以此为依托,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严阵以待。杨伯涛为此部署,是渴望能协同各方面友军,全部歼灭被围日军,以抒八年来的深仇大恨。他率领的第十一师正在秣马厉兵严阵以待最后决战之际,忽然接到军长胡璉转来上级命令:令杨伯涛将扼守石下江的一个团,全部撤离,该师集中全力向敌侧面攻击。这样就放开一点,豁出一段口子,让日军顺公路逃窜。日军一见有路可逃,就不顾一切,狼狈逃命。杨伯涛虽督军率部队向敌侧击,但斩获之数就不多了。中国各方面友军经过追击,很快收复失地,恢复了会战前态势。雪峰山战役,于6月初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日军以强弩之末,攻击受挫,势穷力竭,陷于重围。中国军队本来可全歼日军,取得更大的胜利,不料上级命令开放口子,大部分日军逃脱。大胜之局,功亏一篑。杨伯涛深感惋惜。事后了解,因重庆此时正召开国民党六中全会,全体与会人员对湘西战事十分关注。尤其当第十一师攻克山门时,战场形势顿呈有利态势。在安江指挥所的总司令何应钦及王耀武等高级官员、美军高级官员,额手相庆!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将军,立即打开香槟酒,举杯连连互庆胜利!重庆方面更为兴奋,立即发动各界组织慰劳团,携带慰劳品来到芷江犒军。在这种形势气氛下,总司令何应钦不愿战事拖延,影响六中全会情绪,踌躇再三,才决定开放石下江锁匙,给日军一条生路,从而提早结束了历时两月之久的湘西会战。

杨伯涛的第十一师在这次战役中,伤亡官兵400余人。其中不少官兵曾向他表示决心:“要帮师长保卫住家乡。”将士们在阵地前英勇杀敌,有的壮烈牺牲!将士们高尚的民族气节、爱国品质和对杨伯涛的深情厚谊,使杨伯涛深受感动,极为哀悼,耿耿于怀,永志不忘。战后,杨伯涛征得全师官兵的同意,在山门建立“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坊”一座,以慰英灵,永垂崇念。

(责任编辑 吴 思)

关于《陈独秀往事》的一封信

● 龚育之

编者按：靳树鹏先生是《陋室漫笔》一书的作者《陈独秀诗集》的编者之一。去年秋天，靳先生托友人将他的新著《陈独秀往事》的清样送给龚育之先生，请龚先生作序。龚先生回信，以对陈独秀没有深入研究为由表示辞谢，但对清样排印上的误漏提出了十数处校正，对文稿的编选提出了若干条建议，还同靳先生探讨了几个问题。靳先生表示感谢，并要求将这封信即作为《陈独秀往事》的一篇代序。盛情难却，龚先生遂对这封回信又作了补充和修改。下面发表的是改定的此信。信中几处附注，是靳先生加的。

树鹏先生：

收到来信。

《陈独秀诗集》当在复印后将原本寄回。

《陈独秀往事》清样已拜读。你用了这么大的力气，搜集陈独秀的著作和相关材料，追寻陈独秀的遗踪，访问陈独秀的旧交，写出了这样一本内容丰富多彩、文笔生动流畅的著作。你谦称自己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但在这样一个专题上，你比许多专业工作者（比如我）付出了更多的艰辛，取得了更多的成果。我为你的这本著作的将要出版而向你祝贺。

萧克老人为《陈独秀诗集》所写的序言，其实是一篇要求史学界“全面地研究”陈独秀的纲领。我觉得把它移到你这本书的前面作为代序，很合适。萧老说：“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其以前的时期，而且应该包括搞托陈取消派时期。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和外国的托派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纲领如何？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如何？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对

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如何？出狱到去世时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在研究之列。”这是从政治上研究陈独秀的主要问题。萧老还说：“对陈独秀的研究，不仅限于他在政治方面，当然还应有其他方面。”陈独秀的诗，他认为就是一个方面。他这篇主张“全面地研究陈独秀”的序言，是一顶大帽子戴在一个小头（《陈独秀诗集》）上，现在把它移到一个较大的头（《陈独秀往事》）上，不是很合适甚至更合适吗？

当然，你也没有企图在这本《陈独秀往事》中“全面地研究陈独秀”。你的笔触，集中在记述陈独秀青春年代的奔走，五四时期的英姿，晚年岁月的凄苦，他的家庭、他的婚恋、他的儿孙，他的朋友、他的同志、他的学生，他的诗篇、他的书法、他的字学……对萧老提出的“七大问题”，你或者没有涉及，或者有所涉及也是“散文式”的、“边缘性”的。那些政治方面的问题，需要详尽的论据、展开的论证、反复的斟酌，即需要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论文，才能说得比较清楚，不是“随感式”的文章可以胜任的。你不去正面论述那些问题，只侧面涉及，我看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选择。

至于你要我也写个序，在读了你的书稿之后，我更缺乏勇气了。你说：“重新研究评价陈独秀的思潮已经涌动二十多年，著作几十种，文章不可胜计。”而我呢，这些著作许多都没有读过，甚至没有见过。《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著作选》各三大册，我虽然购买了，放在我的书架上了，也只选读过若干篇，没有通读过。没有研究，我没有发言权啊。

来信希望我对你的书稿清样提意见，我一边

读一边记下一些被我发现的残留的错字,算是做个“义务校对”吧(都已采纳,此处从略——靳注)。又记下一些编辑加工方面的建议,算是做个“义务责编”吧(也已采纳,此处从略——靳注)。分散发表、汇编成集的书,重复的地方不可免,但重复过多还是不可取。来信说,你还在删削重复上下功夫,这很必要。附录这一部分,比较零乱散杂,性格不甚明确,建议加以精简,此点也已采纳——靳注)。

除此之外,这封信主要想同你讨论、请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鲁迅答托派的信。

1936年托派陈仲山(其昌)给鲁迅写信,大约是听到某些传闻,以为鲁迅同中国共产党有了矛盾,可能会支持托派的观点,才把托派的宣传品寄给他的。信里集中攻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政策,尤其是现时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攻击的谬误和狂悖,当时在托派以外的人看来已很显然,现在更是被历史所完全地证明了。鲁迅收到信,很生气,在重病中无力写信,就由刚从陕北来到上海的冯雪峰为鲁迅起草了这封答托派的信。从回信本身来看,信中只是做出了托派这种言论“有利于谁”的分析和判断,认为攻击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政策,“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信中的确说了:“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但接着就说:“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的钱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根据这些话,把诬陷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为拿日本人钱的汉奸的罪名,加到鲁迅头上,说鲁迅是始作俑者,恐怕不能算是很有根据的,就是加到冯雪峰头上,恐怕也不能算是很有根据的。

陈独秀是主张抗日的,别的不说,1934年在狱中的组诗《金粉泪》,就洋溢着强烈而深沉的爱国悲情。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8月他从狱中出来,明确表示赞成国共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1940年他写信同他从前的托派友人西流等

争论,批评有人曾把列宁1914年大战的理论及口号应用于中日战争,而忘记了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无论他唱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日本。”同鲁迅答托派的信所用的逻辑一样,陈独秀在这里也只是做出了这种言论“有利于谁”的分析和判断,而没有理由说陈独秀指控某人为日本奸细。

你引用了王观泉先生的文章《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王文的贡献,在于查出《救国时报》在1936年10月5日就鲁迅答托派的信发表过诬托陈派为日寇奸细的伍平通讯和报纸社论。比别的文章把此事追究到康生1938年初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为止,追溯得更早、更深。但是《救国时报》上那篇通讯和社论,引用了鲁迅那封信,但却不能说是严谨地遵照它的原意,而是引申了它的原意。文中说:“先生毕竟还是出语忠厚”,从而略去了鲁迅的“忠厚”之语不引,却举出据说是“中国托派”张慕陶等事例,说:“其实,这早就证明托陈派这一干人是在替日寇服务了”。这表明作者自己知道,他引用鲁迅,是加了码的,不但分寸上加了码,性质上也加了码。

我请韩钢同志帮我查了一下《救国时报》,发现确如王观泉所说,伍平通讯把给鲁迅写信的陈××误认为可能就是陈独秀。伍平又说:“即令不是陈独秀,也是一位托陈派中重要人物,反正都是一样。”但是,伍平通讯并不是《救国时报》指托陈派为汉奸的开始。在这之前(1936年2月29日、5月10日)《救国时报》就已发表过说托陈派是汉奸的文章,在这之后发表得就更是连篇累牍。《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下的报纸。1937年底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康生,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办的《解放》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连载两期的一万好几千字的洋洋大文,前一半说苏联托派为德日帝国主义当特务间谍,材料都是引用斯大林和苏联反托大审判,后一半说中国托派为日本帝国主义当特务间谍,相当一部分材料同《救国时报》上的材料相同。文中提到鲁迅那封信,只用了半句话“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有悖中国人为人的道德”),这里直指陈独秀,可能沿袭了伍平把陈××误认为陈独秀的错误。回国的王明、康生为

什么那么猛烈地发动反托陈派“汉奸”的舆论攻势？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挟苏联反托正紧之威，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国内的中共领导人曾考虑在一定原则条件下接受和联合陈独秀一事，置于被动的地位。这一点，许多研究文章已经指明。

陈独秀的汉奸罪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已经为他洗刷了。这些诬陷从何而来？源头恐怕还要从苏联方面反托的材料中去找。1988年苏联最后为诬指托洛茨基派为德日匪谍一案平了反。但在30年代，却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各国党认定的铁案。前面提到康生文章，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反托是自王明、康生回国才开始。自从陈独秀同党分裂进行托派活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托陈派当作反动派别。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把“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同盟”也列在呼吁联合的派别之中。但是，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内部指示信中又说：“陈独秀所代表的‘左倾’的托派的领导分子用尽了一切恶劣的字句，咒骂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咒骂抗日主力的红军，咒骂为党所提出的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是出卖中国的革命，他们实际上已成了日寇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且是整个被帝国主义压迫到吐不出气的中华民族的汉奸。这自然不是说被他们‘高尚理论’弄糊涂了的真正革命的分分子，相反地，我们要尽力把这些分子从反革命的泥坑中解放出来，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战线。”（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不知道这是对四月宣言的补充说明还是有所修正。

我猜想，以冯雪峰的背景来说，为鲁迅起草那封信时说那些话，应有所本，不会是独出心裁，自作主张。

又据胡风回忆，对冯起草的回信，重病中的鲁迅没有口授，只是表示同意。我相信这回忆大体是可信的。据冯雪峰回忆，鲁迅表示过对托派给他写信的恼怒，表示过同意冯起草的回信，还表示过把托派来信和鲁迅回信摆在同等地位发表是一个失算。这回忆我以为也大体是可信的。胡风回忆和冯雪峰回忆没有根本冲突。所以我认

为新编《鲁迅全集》可注明信是冯起草、鲁同意，但没有充足理由把它从鲁集中撤除。

第二个问题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见《毛泽东传》）

这“有人说”，过去一般以为是社会上有此顺口溜。读了你编的《陈独秀诗集》，才知道是陈独秀说、陈独秀编的顺口溜！这是你关于陈独秀的一大发现（这是任建树先生的发现，不敢掠美——靳注）。发现的过程，郑超麟的回忆（发表在报纸的中缝里），回忆的误差（把《上海工人》的中缝记成《布尔塞维克》的中缝），萧老的回忆（在苏区的墙上看见的标语），包括他以为作者是红军的宣传员和他自己的几句续作，这些细节很有趣味。你那篇《萧克评说陈独秀诗》讲了



龚育之与夫人合影

这些细节,何不把这些内容也编入或写入你这本《陈独秀往事》呢?

说我们这个党是“党外有党”,当然是说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各民主党派。毛说过,民主党派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但他的重点在强调宪法他们都赞成,从反对走到不反对(1956年《论十大关系》)。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毛承认党外可以有同共产党争夺执政权的反对党。毛又说过,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毛承认党内可以有形成组织的反对派。1965年《二十三条》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文件一出来,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在讨论中就提出:我们党内从来不允许有派别呀,怎么说有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但毛提出“走资派”,是把它当作社教运动要整的重点。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党内有派“是正常现象”,其实是要发动一场不正常的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克服和消灭这种现象。而毛却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正常的”运动,最初他没有想到运动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但他认为,这样的运动过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

第三个问题是反封建。

你赞同时下一一些人的意见,以为用封建半封建来描述解放前中国的社会状态,不符合中国文字中“封建”的原意。这自然也是一家言。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讲反封建,并非无的放矢。把旧中国的皇权专制和后来的军阀专制的政治制度,地主剥削压榨农民的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以前的这些制度,概括地称之为“封建”,在这个意义上“反封建”,我以为没有什么不可以,并不必拘泥于中国古代“封建”两字的原意。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是接受了这个观点,宣传了这个观点的,他的文章,如你所引用,多次讲过反封建的问题。他后来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他的判断是1927年以后中国已

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也没有以中国古代对“封建”一词的原意为论据。你这本谈陈独秀往事的书,何必把这个问题放进来?

以上三个问题,我临时抱佛脚,查了一点材料,同你商讨。我可以做“义务校对”,做“义务责编”,但不做“义务审查官”。再说一遍:这是友朋之间的意见交流,可以接受,也可以争论、反驳,仅供参考而已。此致

敬礼!

龚育之 11月12日

(12月9日补充和修改)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书屋 2005年第2期目录

刊海一叶	四十年前的一场 中西文化论战” ——《文星》杂志与一桩诉讼	范泓
书林折枝	不了解的佛教艺术 ——读《佛教艺术》 忽然,童年结束了 ——读《童年的消逝》 谈诗与隐遁 ——读李青松“归隐系列”有感 “高陶事件”启示录 ——读“高陶事件”始末	刘三平 丁国强 石天河 耿法
	变形金刚·约瑟夫·富谢 ——读《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吴蓉晖
旧作新识	偷不如偷不着 ——《红楼梦》中的性爱及其他	王森
人物春秋	玉钗思重是前生 ——吴梅村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始末 桃花庵里桃花仙 ——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前世今生 尚留微命做诗僧	戴庆华 慧远 王开林
流年碎影	百年回眸谁与功 ——记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与《大清新刑律》	陈浩 潘光哲
史海钩沉	中研院的一千零一夜”	陈仁华
围炉夜话	阳虎的恶名 鸿雁传书及其他 西书、礼品与鸦片 从“正月剃头死舅舅”谈起 进士娇娃会平康 大清:与胥吏共天下	睦达明 萧春雷 小朋 楚人 张云江
艺术长廊	身体写作与比基尼	卫泽
编读往来	“佞宋”何指?	陈福季
来稿摘登	出人头地与衣锦夜行 曾国藩家族中的女性	易小明 骆晓戈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563097 传真:0731-5790197

汉武帝与轮台罪己诏

● 王也扬

现代传媒的威力实在了得，一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播出，竟使许多人读《史记》、《汉书》，讨论起历史来了！西哲培根有言：读史可以明智。于休闲娱乐之中，了解和谈论一点历史，还是有益的。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列确有道理，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动辄诛杀夷族，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骊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

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饮之，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的结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即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诽谤罪”、“妖言罪”，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不敢说，只是嘴唇动了动，就被认为是“腹诽”

(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那么,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武帝去世前两年),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轮台罪己诏”。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罪己”,及时转弯,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而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常把“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其实执政者“罪己”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详尽地留传下来,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罪己诏”的皇帝也不算错。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往往会下一道“罪己诏”,公开检讨,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正如苏轼所言,执政者“罪己”的目的是为了“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

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试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这是常态。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屋 2004 年第 3 期目录

阡陌纵横	向学未敢忘忧国 ——续谈《边疆人文》 教育的使命与文学的使命 ——从《文学兴国策》说起	王 昊 侯咏梅
尘影斑驳	蔡元培的“决斗” 喟叹一声罗家伦	刘克敌 裴毅然 张晓唯
释疑解惑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谈《北京的莫理循》 不可救药的误读 ——谈《留东外史》	汤伏祥
话到嘴边	关于巴别尔的《骑兵军》 喧嚣文化	李兆忠 王 蒙 王天兵 刘心武
湖湘人物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万点星子齐明时 ——沈从文的大连印象 齐白石的“蔬笋气”	张宗子 周立民 冰 静 季广茂
炉边闲笔	概念的文化逻辑 亥姆霍兹与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 窃书剿说大不德 流水无弦 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自序	褚孝泉 王子今 毕可生 张新颖
得书识人	十年一觉才识梦 ——《独立评论》与二十世纪初知识界 “平生自问尚无羞” ——《翁文灏选集》读后	李 峻 黄 波
翻读古典	苏格拉底的雅典 罗马公元前43年纪事	石定乐 曹瑞涛 姜广平
白银时代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	老 圈 蒋 蓝
边走边看	吻完就擦嘴 道在尿溺间	李 锋 莫 天 桑 农
女性立场	红颜似水伴东坡 只眼看虚妄 海上花开花又落	李明月 伍 国 李明月
来稿摘登	在残忍之外 战国策派的歧路 一次次犯错 盛宣怀与哈同	承公侠

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

● 吴 思

—

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 8 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 99 年。首次平反是 1162 年 7 月，岳飞冤死 21 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率？

回家后查史书，1162 年 6 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 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我在《明史》中读过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 170 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 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 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这种时隔 150 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 16.2 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 8 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 45 年，就有一大批蒙冤 43 年的人。万历帝在位 48 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 30 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 30 多年的人。

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 300 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 270 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 2 人，处决者 25 人，充军者 11 人，徒刑者 129 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二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正义只能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退居二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碰上嘴硬的言官，拼了命也要鸣冤叫屈，他们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等等。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

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不过，纵向纠错也是纠错，我们祖先毕竟有了改正自身错误的能力。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这要看对谁而言，还要看如何折旧。现代西方讲究个人本位，横向纠错机制发达，此论自有精益求精之妙。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的公正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这么说是历史事实支持的。北宋奸相章惇对付政敌，企图将司马光曝骨鞭尸，摧残元祐党人和他们的子女。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八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八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八年？假设有五个，净亏损20%。倘若圆滑地混下来，九年考满，本来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

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儒家教育的成就。迟到的公正有助于维持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的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岳飞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推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我在史书上也没有看到为他平反的记载。如此说来，王朴之流连第二等公正也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平反。这就是第三等公正。在我的读史印象中，能够享受这等公正的人，大概有办理平反手续者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第三等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第三等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尽管被平反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比起沉冤难雪的小民来，他们仍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三

中国皇帝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有的文弱心虚，有的信仰神明，有的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1425年，朱高炽刚当皇帝，弋谦就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折子批评时政。皇上知道弋谦这人骨

鲠，也不怪罪他，可是忍不住厌恶，见了他就没好脸。众臣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联合起来攻击弋谦“卖直”，要求皇帝法办他。皇上宽宏大度，仅仅剥夺了弋谦上朝的权利。没想到，消息传开，众臣纷纷闭嘴，一个多月没人上疏言事。皇帝急了，他刚刚登基，很想做好工作，众人自我保全，默不作声，这工作如何开展？于是皇帝下诏做自我批评，让众臣直言无讳，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权利。可惜，这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关系问题的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我们无法把少见的好人好事讲下去。不过，一旦皇帝当久了，位子坐稳了，有了自信，谦虚的皇帝也难免霸道起来。这也是一种常规。朱高炽死前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他将一位劝他养病期间远离女色的大臣关入监狱，临死那天还痛骂他，要治他重罪，留下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

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又颇护己短，弄死过许多要求他平反冤案的人。这样的皇帝可能为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吗？可能。我知道有过一次。嘉靖迷信神仙，大兴土木修建大高玄殿，谁反对就把谁痛打一顿投入监狱。有三位跳出来反对，已被关押多年。又有两位跳出来营救，也被“捶死狱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皇帝上露台祈祷，火光中隐隐约约听到那三位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皇上赶紧传诏将他们释放。由此看来，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碰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上，大家就只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四

《明史》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在有名可考的记载中，清算力度不如平反力度。一正一反，同属让开权势的公正，善有善报如果还有七八成，恶有恶报似乎不足四五成。一些当时已经臭名昭彰的家伙，例如特务头子太监汪直，引导刘瑾作恶的焦芳父子，万历派下去搜刮的税监们，经常留下一笔“竟得良死”的记载，连清代史家的笔下都透出一股怨气。这是什么缘故？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操切，惩罚的力度往往大于奖励。看看这位偏爱报复的人如何清算前朝阉党，可以明白恶报弱于善报的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爌、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爌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过了一天,皇帝将这几位召入便殿,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囊,里边装了许多章疏。皇帝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颂扬魏忠贤的上疏,你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列入逆党。韩爌等人知道皇帝的决心难以挽回,就设法把此事推给别人,说:臣等的职责是起草文件,不熟悉法律条文。于是皇帝召来吏部尚书(近似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让他处理,王永光也说自己“不习刑名”。皇帝又招来刑部尚书(近似最高法院院长)乔允升、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曹于汴等人,这才开出一份包含270多人的逆党名单,并拟出了从凌迟到革职的处理意见。

一件并不复杂的事,皇帝亲自布置,亲自推动,甚至亲自提供证据材料,居然让臣下连踩五脚刹车。假如皇帝拿不出那些“黑材料”,假如皇帝不一催再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不难想见。这其中的利害计算,皇上圣明,早已一语道破:怕得罪人。史家也写得明白,“那些人不愿‘广搜树怨’”。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可以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却不能带来官职俸禄,损人不利己的事自然人人回避。平反则不然,既光明正大又有正面好处,利人利己,愿意做的人自然比较多。这一利一害之差,足以解释清算力度不及平反的现象。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利害屏障,皇帝尚且让人推来挡去,那些受迫害的当事人又能闹出什么名堂?这些前劳改犯,或者他们的文盲后代,满脸怯色一身灰土,让人家推三阻四折腾了几个月,究竟是出气呢还是找气呢?报复的心思能不衰减吗?衰减了,无人追究了,恶报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最高权势几乎是不受追究的。崇祯清算魏忠贤和阉党,却不追究他们的总后台、自己的长兄天启。嘉靖和万历皇帝是制造诸多冤案

的主犯,但他们的接班人是亲儿子,大平反只能配以小清算,弄出几只替罪羊来就算交代了。最高权势清算前任是有底线的:他们必须尊重传位的先辈,必须维护皇权独大的体制,这是他们合法统治的基础。而且,恩归自己,怨归他人,这种体制正是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既然这套报应机制的核心就是一个大漏洞,我们对整个体制的公正程度自然不能期望太高。

清算不足和平反不足并非小事。在时间和力度方面的利害计算对当事人的选择大有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右佥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助理)刘志选,曾经挺身抗议万历皇帝钳制言论,为忠臣鸣冤,结果被皇帝贬谪,被贬之后又挨整,家居三十年不得平反。万历死后还是靠拉关系当上工部主事(近似处长),恢复到被贬谪前的官职。此时刘志选年过七十,弥补损失之心极其强烈,于是一改前辙,帮助魏忠贤钳制言论,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恶棍同党。他也知道这些罪恶将遭到追究,但《明史》上说,刘志选认为自己年老,必定死在魏忠贤之前。那是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几乎比他小20岁,刘志选的利害计算透彻之极。奈何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天启皇帝23岁驾崩,魏忠贤败,刘志选被判死刑,自己先上了吊。假如天启不那么短命,假如崇祯不那么操切,刘志选就投资成功了。同样,假如万历冤案的平反更加彻底,让他的第一次投资得到合理回报,刘志选也就不必冒险改辙了。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大体不错,但要打个折扣。从数目上说,前一句大概七八折,后一句大概四五折。接下来的话是:“不报,时候未到。”何时才算时候到呢?一代权势淡出之后,时间越久,折旧越重。经过两次打折,尽管平反了,但是补救不足。尽管清算了,但是追究不足。这些不足部分,就是当事人的净损失和净收益。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下来,这些损益必将产生影响,类似自然选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就好像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将导致众多物种的兴亡及生态系统变迁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大好河山逐渐改变了模样。

2005年1月10日
(责任编辑 致中)

千古奇冤陈世美

● 陈远发

说到某男人抛弃结发妻子，人们往往抬出一人作比：陈世美。由于戏剧《铡美案》的家喻户晓，恶棍陈世美的形象已在人们心中定格。然而，宋代包公如何铡清代进士？2004年12月中旬，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编导人员来到湖北省丹江口市，准备将此公案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央视报道，引出旧案重提。

传统戏剧中的陈世美，自报家门是“湖广均州人氏”。据《均州志·进士篇》记载：“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史大成榜，陈年谷，官贵州思石道兼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参政。”又据《湖北历史人物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记载：陈世美，清代官员。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即湖北均县，现丹江口市）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清初游学北京。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进士。初任河北某地知县，后因得康熙赏识，升为贵州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参政。在贵州为官时，同乡同学来投，谋取官职，他多次接待，并劝以刻苦攻读以求仕进。后因来投者日多，难于应付，乃嘱总管家一律谢绝。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同窗胡梦蝶，昔日与他进京赴考时，曾以钱财相助，因遭总管家回绝，顿生报复之心，遂将社会上一些升官发财、忘恩负义而抛妻灭子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他身上，编成戏剧《秦香莲》，在陕西、河南等地演出。相传清末一河南剧团到均州演出此戏时，陈的一个后人看了，气得当场吐血，陈世美第八代孙还组织家族众人，当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死伤数人，演出被迫停止。

一般地方和一般人看此戏并不把它当真，可是在丹江口市（原均州），陈姓居民一向认真对待此事，说这个戏冤枉了好人，因而愤愤不平，不许在均县上演陈世美的戏。自1980年以来，湖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全面开展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当地民众为陈世美鸣冤叫屈，并逐渐用文字发表出来。当时李效时同志搜集整理写成的《陈世美真冤枉》一文发表在1981年出版的《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中，香港学者谭达先看到此文后，在香港《文汇报》副刊发表书评，突出地介绍了这篇为陈世美喊冤的作品。随后李征康同志也搜集到一组有关陈世美的传说，刊于1986年第1期《民间文学》上。1988年由原丹江口市豫剧团演员李现远业余创作的剧本《陈世美喊

冤》，被四川省广元市豫剧团搬上舞台，引起轰动。随后该剧又在成都市锦江剧场上演，成都市党政负责同志观看了演出。从此，关于陈世美的冤情便在海内外传播开来，引起越来越多的民间文艺学者和有关部门的研究和重视。

丹江口市的童德伦老人为解开陈世美之谜，花费了数十年心血，他认为：陈世美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当地民间传说和1992年在丹江口市发现的有关陈世美的碑文记载，陈世美都是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体察民情的清官。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所谓嫌贫爱富、杀妻灭子之事，乃系嫉贤妒能之辈所为。因此，均县有“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的俗语。

清代陈世美怎么会被宋朝的包公铡了呢？二百年来《铡美案》虽然在世上演唱，使陈世美臭名昭著，但从现在搜集的大量素材来看，《铡美案》确属戏剧舞台上的历史“冤案”。

据传，清朝某年正月十六，有一个戏班子演《秦香莲抱琵琶》，看戏的人格外多，他们嫌戏文太短了，唱不到半天，不肯散去。掌班的没办法，只好在正戏前头加个《陈州放粮》的短戏。

戏唱到中午，陈世美的家将韩琪受命追杀秦香莲，又放走秦香莲，韩琪自刎，秦香莲拉着儿女倒在血泊中……又是到此煞戏了。看戏的不肯走，大家齐声吼：“杀了陈世美！”砖头瓦块齐向戏台上打来。掌班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乱转，不敢在前台露头，赶紧溜到后台。这时，唱《陈州放粮》的“包公”还未下装，他问：“台下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掌班的一见“包公”，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推着他说：“快，快到前台接着往下唱。”

“包公”说：“你急糊涂啦！我在宋朝，陈世美在清朝，相隔几百年，咋能同台唱戏？”哎呀，事到这般时候，管他同朝不同朝呢！”掌班的说：“陈世美那么大的附马官，谁敢杀他？只有你‘包黑子’铁面无私可以把他铡了，给老百姓出出气，就算煞戏了。”

黑脸包公只得重新弹衣整冠，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班人马上场了。唱到他将陈世美一铡，台下欢呼起来。从那以后，小戏《秦香莲抱琵琶》就变成大戏《铡美案》了。

（责任编辑 吴思）

玩儿圣人

——精神现象零拾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对圣人应当规规矩矩，毕恭毕敬。但若不是诚惶诚恐佩服得五体投地，就会发现，所谓“圣人”，常常是被人玩儿弄的对象。

孔夫子是称过圣、封过王，被当作“万世师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读书读的孔夫子，考试考的孔夫子，文章写的孔夫子。只要你把孔夫子那几条“语录”记得滚瓜烂熟，而且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做成文章，多半可以闹个“师长旅长”干干。如果你敢发表同孔夫子不同的意见，那就是非圣侮法，不杀头就算便宜。

不过，任何一种思想，如果“伟大”到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就会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缰锁。这时，尽管倡之者可以禁止、焚毁别人的书籍，甚至以功名利禄相诱，以坐牢杀头相胁，人们还是可以找到发泄的途径，最简单的就是拿圣人或圣人的思想、语言开涮，在玩笑中，把它的神圣性瓦解。灌输得越起劲，吹捧得越离谱儿，开涮就越普遍，花样也越繁多。

以《西厢记》中“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为题，写一篇“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是一种玩笑，任意编排圣人的言论也是一种玩笑。

“非礼勿动”是圣人的明训。但一位制谜者，给这四个字作了十分香艳的谜面——“宫

娥行步怯冰寒”。谜底是“非礼勿动”谐音为“妃履恶冻”。这样编排圣人，已经有点不敬，然而还有更邪的：“一个孤鸿带箭来，罗罗唳唳过楼台。老翁病笃无多气，口中连念释消灾。”我视鱼儿活泼鲜，嘱妇勿把下油煎。听得厨中刀砧响，情愿长斋献佛前。”这两首不大高明的打油诗，前者是《论语》中“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谜面；后者则是打的《孟子》中“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一句。把那些庄严神圣的语录，变为滑稽突梯的谜语，这也是玩儿圣人之一法。玩儿圣人还有许多花样，故事、笑话、歇后语、顺口溜……中国本来就不乏文字游戏，在游戏中加入圣人和圣教，也叫做寓教于乐罢。

看来，思想的强制灌输，其效果适得其反。如果不是依靠思想或人格本身的力量，灌输力愈大，反拨力愈强。看似轻俏的调笑嘲弄，其实是心底的轻蔑。只可惜中国历史上掌握控制思想权力的人多是不懂这种反拨的。或许还以为他们的灌输已经使圣人的思想深入到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哪。所以旧中国历朝历代，禁这禁那，但没有禁谜语、禁笑话的。诗曰：

称圣封王用意长，是非功过欠评量。
圣贤语录成何用？笑话一堆梦一场。